



2022 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Beiji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22

背景文件
Background Guide

危机联动委员会
Joint Crisis Committee

议题：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战争（1992）

目录

欢迎词	1
委员会介绍	2
一、委员会基本介绍	2
二、席位设置介绍	3
三、时间轴与时间截点	3
第一辑	
积怨已久：纳卡地区争端由来	5
一、纳卡地区民族的形成	5
二、沙俄时期的扩张与统治	6
三、俄国革命时期的混乱..	7
四、苏联时期的管理	11
问题重现：纳卡地区冲突始末	12
一、冲突初现	12
二、矛盾激化	15
三、高潮与战争	16
四、短暂和平与战争升级	19
五、战争结束与停火谈判	20
缔造和平：国际社会的介入	21
一、欧安会的介入	21
二、联合国安理会的介入	23
第二辑	
大厦倾覆：苏东剧变和二十世纪末的国际局势	27
一、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	27
二、后苏联时代的权力真空和地缘政治乱象	30
沉渣泛起：苏东阵营的民族主义回潮	34
一、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34
二、苏联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及其后果	37
众说纷纭：相关国际法背景综述	41
一、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领土地位问题	41
二、国际冲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47

第三辑

会议平台介绍	50
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50
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明斯克小组	53
会议有关实体介绍	55
一、阿塞拜疆	55
二、亚美尼亚	64
三、土耳其	74
四、俄罗斯	81
其他主要国家及组织态度概览	84
一、美国	84
二、法国	84
三、北约	85
四、伊朗	85
五、中国	86
六、独联体	87

欢迎词

亲爱的各位代表：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 2022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危机联动委员会。

作为最早将模拟联合国这项活动引入中国的高校，外交学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始终致力于完善和创新模拟联合国的会议模式，为青年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参会体验，危机联动委员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危机联动委员会最早出现于耶鲁大学，而最先将其引入中国的正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在危机联动委员会中，参会代表将扮演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国际环境中，充分运用自己的才学与胆识来面对彼时的危机和挑战，力争在妥善处置危机事件的同时，维护本国利益和全人类的福祉。与模仿联合国机构设置的常规委员会不同，在危机联动委员会中，部分参会代表将扮演各国主要领导人，以决策层的视角面对国际局势，以战略眼光指出解决危机的正道，在头脑风暴的过程中感受外交与国际关系的魅力。

自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开设危机联动委员会以来，我们一直希望构建一个富有真实感、代入感和历史感的会议。为此，我们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会议设计框架与议事规则，以赋予参会代表较高的自由度，令其感受到区别于常规委员会的会议体验，并帮助他们从各国博弈的角度理解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本质。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正如我们在会场介绍中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彼时的亚欧大陆腹地，一个旧的世界已经轰然崩溃，另一幅新的画卷悄然展开。原本苏联地区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倏然而变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被压制了七十多年的民族主义在苏东剧变后喷涌而出、冲决一切，迅速充满了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该地区原有的社会架构骤然崩解，权力真空迅速坍塌而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无情地吞噬着社会的秩序和活力。毫无疑问，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

在高加索地区，积怨已久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以此为剖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地缘权力的伸张与收缩，可以研究周边大国的介入和干预，也可以管窥变局之下该地区政治与经济的诸多变化。纳卡地区的命运将向何处去，两国人民的命运将向何处去，这一切都将掌握在诸位手中。

为保证本次会议的顺利进行，我们在危机联动经典架构的基础上稍加损益、有所发扬。我们保留了以往会议“内阁 - 会议平台”的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在历次会议中被证明是可行的和高效的。我们设计了联合国安理会和欧安会议明斯克小组双会议平台的联动模式，以求最大程度地模拟当时复杂的体系，全面地展示各方的态度和努力。我们在危机联动中引入了主新闻中心（Main Press Center, MPC）的设置，使得各国的地缘博弈得以在舆论战场上更好地得到呈现。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北京议事规则（危机导向型）》，提高了会议平台的议事效率……我们期待着以上各项设计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你们的会议体验，帮助你们在会议中收获对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深邃见解。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期待我们今后共同合作，呈现出一场高质量的学术盛宴！

2022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危机联动委员会主席团

委员会介绍

一、委员会基本介绍

危机联动会场是时下模联活动中较为流行的一种会场模式，其不同于普通常规委员会之处归纳起来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是危机的设置，整个系统会由不断出现的危机推动运行。这些危机是由主席团抽取自一个对真实世界的模拟世界（或称之为危机次元）中的事件的具体化表现，并且根据事件的特点和代表席位的性质，通知给相关代表（部分代表或者全部代表），由相关代表进行决策和处理。

第二是反馈，代表在得到危机的消息之后，可以就危机进行思考、讨论、决策以及实施行动。这些行动将会影响危机次元，其中的事件将会因此进一步发展或停止发展，形成新的事件。主席团将会根据新的事件编纂成新的危机，按照前述的方式反馈给相关代表，从而使代表感受到自身和他人决策的后果。

第三是联动，不同子会场所做出的决策共同作用于同一个危机次元，因此一个子会场在危机次元中的行动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另一个子会场。与此同时，不同子会场也可以通过会场间磋商谈判的方式影响彼此的决策。

对于代表而言，在危机联动会场进行角色扮演相比于在常规委员会有两点不同。第一是代表运作会议的方式不同。在传统常规委员会中代表需要在规定的议事规则内进行角色扮演，在特定议题上实现国家利益。而在危机联动会场，议事规则并不是会议所需要考虑的重点，代表所处的环境将是对世界的真实模拟，危机联动会场也因此存在着国家与国家间更强的对抗性，代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具体决策上而不用拘泥于讨论的形式。第二是代表权限的不同。在危机联动会场中，各分会场作为一国拥有某一特定权限的决策团体，将有着现实中真实的权限来管理运作一个国家并和其他国家展开互动。但需要强调的是，从会议效率的角度出发，作为有议题的危机联动委员会，我们希望代表做出的决策将是和所涉及的议题有关的。

危机联动会场与其他常规会场的不同还有很多，例如代表之间的互动方式，代表获知危机、做出决策、得到反馈的方式。我们将会于会议召开前的适当时间进行专门的代表培训。

二、席位设置介绍

本委员会下设七个分会场，包括一个会议平台与五个非会议平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8席）、明斯克小组（12席）、亚美尼亚内阁（6席）、阿塞拜疆内阁（6席）、俄罗斯内阁（4席）、土耳其内阁（4席）。其中非会议平台席位设置将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涵盖阁首、外交、军事、内政、地区政治势力等方向，具体席位设置主席团将在会前的适当时间通知。会议平台具体席位设置如下：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奥地利	比利时
佛得角	中国
厄瓜多尔	法国
匈牙利	印度
日本	摩洛哥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亚美尼亚（列席）
阿塞拜疆（列席）	土耳其（列席）

明斯克小组

法国（主席国）	俄罗斯联邦（主席国）
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国）	捷克斯洛伐克（欧安会轮值主席）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芬兰
德国	意大利
瑞典	土耳其

三、时间轴与时间截点

时间轴是在危机联动会议中特有的概念，一般指的是现实次元中的时间流逝速度和模拟的会议次元中的时间流逝速度之间的一个明确的比例，时间轴的开启便代表着危机联动会议的开启。时间轴的设置有利于与会代表和主席团掌握明确的会议次元时间、避免争议，从而更好地实现“拟真”这一目的。

绝大部分的危机联动会议均会引入时间轴这一概念并设置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时间截点指的是时间轴的开始时间所对应的历史时间。

本次会议设置有固定的时间轴与时间截点，主席团将在会前的适当时间通知。

I

积怨已久：纳卡地区争端由来

纳卡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矛盾。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当地的争端从地区的民族形成开始产生，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最终在沙俄和苏联时期愈演愈烈，冲突复杂而又激烈。双方的民族矛盾在沙俄统治时期初现征兆，经受俄国种族政策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苏联时期达到顶峰，并最终从小规模冲突演变为惨无人道的战争与屠杀。要想深入理解这段历史，必须要先从地区民族的形成这一关键要素开始研究。

一、纳卡地区民族的形成

纳尔戈诺 - 卡拉巴赫地区是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人类聚居地。纳尔戈诺来自俄语，意思是“高山的”，卡拉巴赫来自土耳其语，意思是“黑色的花园”。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个国家对该地区的历史发展各有说辞。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艾斯米拉·加法洛娃称该地区为“被雕刻出来的领土”。¹ 根据考察，该地区文明历史最早能够追溯到公元前 3-4 世纪之间，由阿塞拜疆北部的 26 个部落联盟——内部包含阿尔巴尼亚人、乌金人等——组成的独立王国，名为“高加索阿尔巴尼亚”（Caucasian Albania）。不同于当今的阿尔巴尼亚，当时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为多个联盟的集合体，内部民族混杂，领土包含今日的阿塞拜疆与达吉斯坦共和国南部地区。阿尔巴尼亚人最早获得了这片地区的掌控权，但现代的亚阿两国对这段历史各执一词，阿塞拜疆人认为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是其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祖先，但亚美尼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人很早就皈依基督教并“亚美尼亚化”，所以其历史可以算为亚美尼亚历史的一部分。该地区最终在公元前 321 年强大的亚美尼亚王国建立后被并入其领土，亚美尼亚人称之为“阿尔察赫”（Artsakh）。

此后，亚美尼亚王国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4 世纪一直处于附庸国与臣属地位，但由于其宗主国并未过多干预地区政策，纳卡地区的民族构成并未明显改变。直至 7 世纪阿拉伯帝国入侵该地区才有了新的变化。亚美尼亚在罗马统治时期开始接触基督教并于公元 4 世纪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征服亚美尼亚后企图在地区推行伊斯兰教信仰，自 7 世纪末便开始了对该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残暴统治，不少亚美尼亚贵族与平民死于非命。821 年，亚美尼亚王子沙尔·孙巴提安带领当地人民在当地地区叛乱并建立卡臣王朝，自此之后，阿尔察赫地区在地理和政治上都属于半独立公国，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中期。在公元 11 世纪，阿尔察赫地区南部迪扎克也成立了一个王国，阿尔察赫曾经陷入短暂的分裂，但直到 1261 年两国采取联姻的方式合并，地区又重回统一。在此期间，由于王国统治者深耕与阿拉伯、突厥等国关系，为地区发展营造了较为良好的环境，亚美尼亚人又重新在阿尔察赫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而同时，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发展步入了缓步推进的进程。公元 11-12 世纪，突厥塞尔柱帝国入侵纳卡地区，带来大量突厥移民，成为日后阿塞拜疆人的雏形。这一变化使纳卡地区从阿拉伯帝国时期萌芽的伊斯兰教信仰产生了新的发展，促成了阿塞拜疆统一民族的形成，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² 此后，在 13-15 世纪蒙古人入侵和 16-18 世纪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期间，该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不断加强，其结果是阿塞拜疆人越来越多，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民族，而亚美尼亚人则越来越少，对该地区的称呼也由亚美尼亚语的“阿尔察赫”改为普遍使用的突厥语，即“卡拉巴赫”（Karabakh）。在 15 世纪，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采取了温和的民族政策，把该地区的领导权交给了当地的亚美尼亚贵族，允许以一位亚美尼亚贵族为领导，统领整合地区存在的五个亚美尼亚贵族家系。因而“从 15 世纪开

1 段琼：《纳尔戈诺 - 卡拉巴赫冲突研究》，硕士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8 年 6 月，第 12 页。

2 同上，第 14 页。

始在纳卡地区上形成了五个不大的封建领地，这些领地的统治者是亚美尼亚的几位王公。”³ 这些王国代表着早期卡臣王朝的延续。他们在 16 世纪的波斯 - 奥斯曼战争中依旧保持自治，并支持着萨法尔王朝抵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但在 1736 年萨法尔王朝结束后，新任国王纳迪尔沙对这几个支持前任王朝的王公们采取打压的政策，意图将该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管辖之下。并且随着五位王公的内部争斗，亚美尼亚人在当地的实力进一步减弱。最终在 1747 年，该地区建立了起了新的卡拉巴赫汗国，并一直维持统治直至 19 世纪被沙俄吞并。

二、沙俄时期的扩张与统治

俄罗斯帝国自从经历过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依靠自身的强大力量不断对外扩张。对俄罗斯来说，南高加索山区与里海不仅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联通着南北高加索与中亚的交通要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沙俄在此地区活动频繁，希望早日将该地区并入国内版图。为了实现自己的扩张大业，沙俄首先利用政治手段联合刚独立的卡拉巴赫汗国，在 1805 年 3 月签订《库拉克恰伊条约》，以提供其军事援助应对波斯的军事威胁为交换，使其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臣属国。之后波斯帝国在忧患与压力之下袭击卡拉巴赫汗国，被沙俄击败并在 1813 年 10 月签订《古利斯坦和约》，承认下列卡拉巴赫汗国属于俄罗斯帝国所有。⁴ 在此之后，双方还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争，直至 1822 年，俄罗斯帝国废除卡拉巴赫汗国并建立军事管制，最终于同年 2 月与波斯签订《土库曼彻和约》，将东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北部各个汗国全部并入沙俄领土。

获得该地区统治的沙俄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新的种族政策。它有意地在该地区引入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基督教徒，让其担任地区管理机构的重要职位，维持地区的政治与宗教平衡。在俄罗斯的统治下，亚美尼亚人享受到了难得的和平，例如：沙皇允许他们开办学校，鼓励他们出版亚美尼亚报纸。如此一来，亚美尼亚文化运动兴起，从而促进了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⁵ 1897 年的地区人口普查显示，卡拉巴赫地区的 415721 人口中，57% 是阿塞拜疆人，42% 是亚美尼亚人。⁶

沙俄的种族政策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为了在高加索地区制造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平衡地区的政治力量，在该地区迁入亚美尼亚人并发展基督教信仰以改变原本地区的民族、宗教形势，殊不知此举为日后地区纷争的埋好了引线。自此之后，沙俄在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威胁从邻国的伊朗与土耳其变成了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迁入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日俱增，重建大亚美尼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其与阿塞拜疆人的猜忌与仇恨越来越深。在 1827 年，学者发现了该地区的乌拉尔图王国遗迹，掀起了新一轮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浪潮，亚美尼亚人用它来强调自己的原著性。⁷ 而俄国统治者温和的统治策略又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发展推波助澜，以至于在十九世纪后期当地的亚美尼亚人提出了“回归祖国”的口号。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为阿博维扬的《亚美尼亚之殇》，它不仅大肆宣扬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精神，而且极力鼓吹亚美尼亚人的复国意识。⁸ 而由于在同一时期，泛突厥主义在阿塞拜疆知识分子中逐渐生根，认定亚美尼亚人是建立宏伟的“大突厥民族”的重要阻碍，双方在纳卡地区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演变为日后的纳卡问题。

3 苏联“联盟情报总编辑部”新闻社 1990 年 3 月报道，郭兆林译，转载自《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会刊）》，1990 年第 3-4 期，第 120 页。

4 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译：《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第 257 页。

5 元佩成：《纳卡冲突的缘起——民族主义和领土纠纷》，《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第 113 页。

6 数据来自 Arif Yunusov, *Karabakh*, Turan Information Agency, Baku, 2005, p. 33, 转引自段琼：《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冲突研究》，第 14 页。

7 Anne Elizabeth Redgate, *The Armenians*, Wiley, p. 276.

8 元佩成：《纳卡冲突的缘起——民族主义和领土纠纷》，第 113 页。

三、俄国革命时期的混乱

沙皇俄国的残暴统治、极度不合理的民族政策、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促使两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参与到了推翻沙俄统治的革命浪潮之中。革命并未能消除民族间根深蒂固的隔阂，双方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不断加深；随后苏联成立，采取制造民族矛盾的民族政策和行政区划，两方尤其是亚美尼亚族的不满在苏联时期持续不断地积累，终于在红色巨人倒下的一瞬间，全盘爆发出来。

由于国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动乱、政府改革不利、国内民族矛盾和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1905年的俄罗斯帝国，迎来了包括恐怖袭击、农民运动、城市暴动、工人罢工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动乱事件。这场被后世称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运动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这场革命尽管波及范围广泛、但其自身无组织和无目标性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其最后被沙俄政府无情镇压的结局。

在这恐怖血腥的旋涡中，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人民都积极地参与了推翻沙皇俄国残暴统治的反抗与斗争。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首先在阿塞拜疆展开。1905年10月，阿塞拜疆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11月，阿塞拜疆首府巴库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⁹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埃里温委员会在亚美尼亚成立；12月，政治罢工席卷亚美尼亚所有大型工业中心，以声援武装起义。¹⁰

对于沙俄统治的反抗激起了外高加索地区所有民众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进一步促进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旷日持久的民族争端的发展。由于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曾在1905年至1907年爆发战争。1905年2月，亚美尼亚革命党联盟党员杀害了一名穆斯林，两族在巴库发生了大规模互相攻击事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冲突又迅速蔓延到纳希切万、舒沙、占贾等地，最终演变为一场持续两年时间的民族间战争。一战期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约有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¹¹1919年4月，在纳卡亚美尼亚人第五次大会上，土耳其人被认定是这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而“阿塞拜疆人则是直接的帮凶，他们的手上沾满血污”。¹²尽管这一时期，两个民族都在各自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双方的矛盾仍旧在不断加深。



图 1：1917 年底至 1918 年初的外高加索地区形势¹³

9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10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11 咎涛：《帕慕克：政治尴尬与文化依恋》，《世界知识》，2006年11月第22期，第62页。

12 柏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恩怨从何说起》，《党员文摘》，2020年11月第11期，第40-41页。

13 图源：<https://www.pinterest.com/pin/15692298681091477/>，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7日。

一战战败与两次革命严重削弱了俄国对高加索地区的掌控力，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外高加索地区陷入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的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政党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力量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组建了外高加索委员会（Transcaucasian Commissariat），在俄国制宪会议召开前行使临时政府职能。1918年1月，俄国立宪会议解散，该委员会决定自行召开立宪会议，拒绝服从布尔什维克的管辖。2月，外高加索议会召开，外高加索政府成立。3月3日，苏俄政府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将在战争中从奥斯曼帝国夺取的大片领土“西亚美尼亚”割让给后者，但外高加索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条约的合法性。奥斯曼帝国随即向外高加索发动进攻。为应对奥斯曼的进攻，外高加索议会和政府于4月22日宣布成立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Transcaucasian Democratic Federative Republic），正式宣布脱离俄国。然而，由于三个民族之间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对土问题上的巨大分歧，5月联邦即告解体，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主义政权在成立之初就对纳希切万（Nakhichevan）、赞格祖尔（Zangezur）和卡拉巴赫这三个民族混杂地区的归属发生争执和冲突。阿塞拜疆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巩固了对最西端的纳希切万的控制，驱逐了数千名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则凭借凶猛的游击队掌握了最东部的赞格祖尔，烧毁当地阿塞拜疆人的村庄。卡拉巴赫山区的亚美尼亚人试图宣布独立，但基本没有与亚美尼亚共和国进行接触。¹⁴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向亚美尼亚首都方向推进，亚美尼亚节节败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也愈发激化，奥斯曼帝国军队也不断通过武力对亚美尼亚施压，以帮助同属穆斯林的阿塞拜疆在外高加索的领土划分中占据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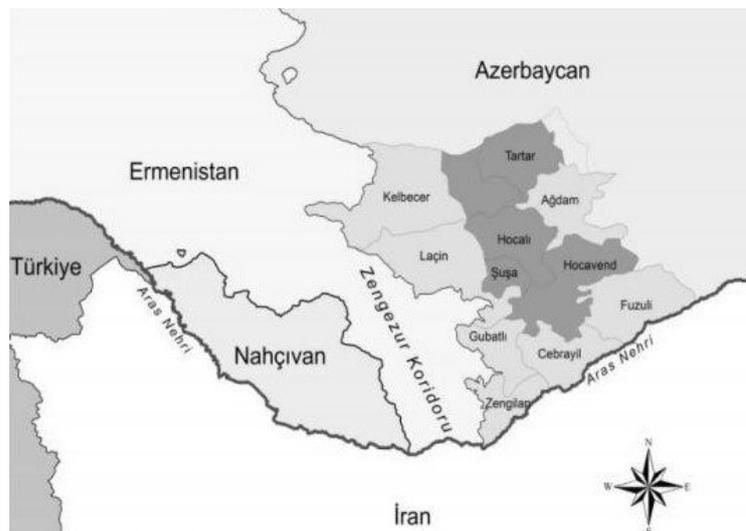


图 2: 纳希切万（Nahçıvan）、赞格祖尔（Zengezur）、卡拉巴赫（图右侧深色区域）位置图¹⁵

1918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外高加索三国签订《巴统条约》。该条约使得亚美尼亚丧失了其原先一半的领土，包括纳希切万、沙鲁尔（Sharur）、苏尔马鲁（Surmalu）全境和埃奇米阿津（Ejmiatsin）、亚历山德罗波尔（Alexandropol）等城市。¹⁶然而，该条约

¹⁴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7-128.

¹⁵ 图源: <https://www.aei.org/op-eds/how-turkey-may-sink-azerbaijan-in-washington/>,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1月27日。

¹⁶ George Bournoutian, "The Iran-Turkey-Armenia Borders as Depicted in Various Maps", *Iran & the Caucasus*, Vol. 19, No. 1, p. 100.

仅明确了外高加索三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并未对三国内部的领土划分作出规定。¹⁷ 7月，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在舒沙组建卡拉巴赫委员会（Karabakh Council），宣布卡拉巴赫独立，加剧了当地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尖锐冲突。¹⁸ 在此期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先后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控制的巴库、奥斯曼帝国、英国远征军、俄罗斯白军等多股势力在外高加索地区陷入混战。

1918年11月，一战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迫撤退至战前的边界，失去了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军事霸权，无法进一步促进阿塞拜疆在外高加索地区的领土利益。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也恢复了《巴统条约》丧失的领土。此时，三个争议地区中，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分别由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控制，纳希切万则由当地阿塞拜疆人控制，并于同年12月建立起阿拉斯共和国（Republic of Aras）。借助权力真空的机会，亚美尼亚重拾建立“大亚美尼亚”的目标，宣称对土耳其的东安纳托利亚（Eastern Anatolia，即“西亚美尼亚”）拥有主权，并开始试图通过武力夺取纳希切万和卡拉巴赫。次年1月，亚美尼亚军队占领卡拉巴赫首府舒沙。然而，英国军队于当年初重返外高加索地区，要求两国将冲突提交至巴黎和会解决，并将卡拉巴赫地区暂时交由阿塞拜疆管理。英军指挥部临时承认阿塞拜疆政府指派的霍斯洛夫·贝伊·苏尔坦诺夫为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总督。在英国的干涉下，亚美尼亚军队被迫撤退。在此期间，阿塞拜疆在该地区进行了种族清洗，仅在首府舒沙就屠杀了约2万名亚美尼亚族人。¹⁹ 在各方压力下，卡拉巴赫委员会最终同意将卡拉巴赫问题提交巴黎和会审议解决。

在卡拉巴赫地区受挫后，亚美尼亚军队随即将目光转向纳希切万。5月，亚美尼亚军队占领纳希切万，但仅两个月后即在阿塞拜疆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进攻下失守。8月，英军撤离阿塞拜疆。11月，阿塞拜疆乘胜向亚美尼亚控制的赞格祖尔发动全面进攻，但遭到亚美尼亚守军击退。1920年3月巴黎和会未能解决卡拉巴赫问题，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决定在发动起义。然而由于势单力薄和来自亚美尼亚的支援不力，起义不仅没有取得预想的战绩，反而招致阿塞拜疆的毁灭性报复。经此一役，纳卡地区的多个城镇被毁，数千亚美尼亚平民被杀害。

正在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对卡拉巴赫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苏俄红军第11军进入外高加索地区。4月28日，在苏俄的压力下，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宣告自行解散，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苏维埃政权迅速稳固对卡拉巴赫地区的控制。8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在最终达成解决方案前，承认苏维埃政权暂时控制卡拉巴赫地区。²⁰

然而，亚美尼亚与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关系则发生了严重的变故。一战战胜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规定，东安纳托利亚应割让给亚美尼亚。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拒绝承认《色佛尔条约》，于9月发动对亚美尼亚的战争，先后攻克东安纳托利亚城市卡尔斯、卡厄兹曼和亚美尼亚本土城市亚历山德罗波尔。11月18日，双方停战。据战后苏维埃政权的统计，约有6万亚美尼亚人在战争期间遭到土耳其军队屠杀。²¹

11月29日，苏俄红军第11军在当地布尔什维克的接应下进驻亚美尼亚，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12月2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正式向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移交权力。按照亚美尼亚方的陈述，11月30日，阿塞拜疆的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项宣言承认

¹⁷ Arsène Saparov, "Why Autonomy? The Making of 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Region 1918-1925",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4, No. 2, p.287.

¹⁸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75页。

¹⁹ Yoko Hirose, Grazvydas Jasutis, "Analyzing the Upsurge of Violence and Mediation in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 Development*, No.6, 2014, 转引自贾迎亮：《纳卡冲突的历史、症结与影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3页。

²⁰ Christopher J. Walker, *Armenia: Survival of a Nation*, Routledge, 1990, p.285-290.

²¹ Vahagn N. Dadrian, *The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Ethnic Conflict from the Balkans to Anatolia to the Caucasus*, Berghahn Books, 2003, p.360-361.

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是苏维埃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但不久后，阿塞拜疆就变更了主张，认为卡拉巴赫与纳希切万属于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地区应该实行自决原则。²²

1920年4月8日，俄共（布）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Caucasia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俄文简写 Kavbiuro，下文统称高加索局）。该机构旨在监督并稳固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并负责处理高加索相关事务。1921年6月12日，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民会议宣布纳卡地区是亚美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6月19日亚美尼亚通过法令宣布对纳卡地区是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1年7月4日，高加索局以4比3多数通过决议，将卡拉巴赫划归新成立的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²³ 随后，以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纳里曼·纳里曼诺夫为代表的阿塞拜疆领导人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发生反苏叛乱，亚美尼亚与苏俄关系迅速恶化。如此因素影响之下，该局于1921年收回了有关决议。在7月5日的非常全会上，以斯大林为首的高加索局重新将卡拉巴赫地区划归阿塞拜疆。1921年10月，《卡尔斯条约》签署，该条约的有关规定使得亚美尼亚国土面积缩小为3万平方公里。²⁴ 1921年高加索局将主要是阿塞拜疆族人居住的赞格祖尔地区划给了亚美尼亚。



图 3: 1918-1921 年期间历次条约造成的领土变化²⁵

1922年3月12日，矛盾冲突异常尖锐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苏俄军队的干涉下与格鲁吉亚一道在第比利斯宣布成立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Transcauca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共同组成一个国家并没能消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与争端。牵一发而动全身，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的争端之下，酝酿着的是新的风暴。

22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40页。

23 漠北：《外高加索的炮声——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的域外因素》，《坦克装甲车辆》，2020年第8期，第8页。

24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40-41页。

25 图源：<http://mountainous-karabakh.org/maps/235-Brest-Litovsk1918.gif>，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13日。注：橘红色区域为根据《布列斯特 - 立陶夫斯克条约》由苏俄割让给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橘黄色（含下方的紫色边框）区域为根据《巴统条约》由外高加索三国割让给土耳其的领土；紫色区域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联共（布）主持的领土划分中确定归属为阿塞拜疆的领土。

四、苏联时期的管理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外高加索联邦以加盟共和国形式正式加入苏联。苏联在外高加索地区“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和并不适宜的民族政策，人为增大发生矛盾与争端的可能性以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统治，使得两国矛盾愈演愈烈，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1923年7月7日，考虑到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同时也为了照顾土耳其的情绪，高加索局决定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NAKO），也即纳卡地区。该区内94%的人口是亚美尼亚族人。亚美尼亚一直拒绝接受这一决议，并且此后的几十年里，坚持不懈地对此向苏联中央提出抗议，要求实现自身的诉求。亚美尼亚人因此觉得，自己的民族权利受到了侵害，自己在纳卡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自由被剥夺了。斯大林及其后继领导人在纳卡问题上一直采取搁置争议的办法，使得纳卡州亚美尼亚人的脱离阿塞拜疆的诉求多次被忽视。²⁶

1929年，阿塞拜疆的梅格林区又被苏联中央划给亚美尼亚，这一划分使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边疆区永久性地成为了飞地，纳卡地区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居住在亚美尼亚境内的约50万阿塞拜疆居民无法享有文化上的自由，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间的不满。1936年12月，内部矛盾重重的外高加索联邦解散，三国各自作为独立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图 4：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行政区划图²⁷

整个苏联时期，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始终未能达成谅解与妥协。总体而言，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外高加索地区内部矛盾暂时被掩盖，地区局势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与此后的疾风骤雨相比，可以称得上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关于纳卡地区的矛盾并没有消弭，相反，在整个苏联时期，两国都在为领土和民族问题不断角力，纳卡地区也成为苏联的“定时炸弹”之一。

26 潘金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的恩怨情仇》，《军事文摘》，2021年1月第1期，第13页。

27 图源：<http://www.armenica.org/history/maps/240-Caucasia1952-91.gif>，最后登录时间2022年2月4日。

问题重现：纳卡地区冲突始末

一、冲突初现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推行“公开化”和“民主化”政策。公开化政策保证了苏联公民可有限表达对苏维埃制度本身及其领导人的意见和不满。在此背景之下，1986年，亚美尼亚发生了签名上书运动，首府埃里温的一批知识分子联名情愿，要求苏联领导人纠正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上的相关决断。自1987年起，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占纳卡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在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驱使下，主张将纳卡地区并入亚美尼亚，遭到阿塞拜疆政府断然拒绝。除了上书运动，在埃里温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运动；阿塞拜疆人针锋相对，在巴库进行了反示威。阿塞拜疆政府不断将阿塞拜疆族人迁入纳卡地区，增加该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数量，减少亚美尼亚族人，试图实现纳卡地区的全面阿塞拜疆化。²⁸

生活在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与不公正对待。1971年，亚美尼亚科学院的《通报》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从亚美尼亚人民间创作和民族利益角度论述了纳卡地区的情况。这种文章的观点使得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觉醒，他们要求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²⁹ 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族的领导人抱怨当地的学校没有亚美尼亚语撰写的课本，电视上也没有使用亚美尼亚语的节目。³⁰

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以前纳卡亚美尼亚人的秘密“卡拉巴赫委员会”及其分离主义组织“鹤”（Крунк）开始从事公开的活动，并且依靠亚美尼亚、纳卡当局和苏联军队的支持，进而形成“联合阵线”运动（Миатцум）。1986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一批知识分子呼吁苏联领导人纠正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并发起了一个签名上书运动。³¹ 1987年，纳卡地区当局发起了一次公投，用以决定纳卡地区的归属。根据公投结果，1988年2月20日，亚美尼亚人占据绝大多数席位的纳卡自治州苏维埃召开非常会议，呼吁将纳卡地区划归亚美尼亚，要求“重新划定苏联的国内政治边界”。³² 这引起了纳卡地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人的流血冲突。2月21日，苏共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后，拒绝了该州并入亚美尼亚的要求。

苏共中央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被亚美尼亚人认为是在偏袒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女诗人，功勋文化活动家卡普季基扬甚至直接在与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中谴责苏共中央的立场和行为。亚美尼亚人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有超过五十万人在街头聚集、游行和抗议，周边乡村的人也向首都聚集，加入游行的队伍。在最终呈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录像中，可以看到聚集起来的有数百万人。同时也可以看出，聚众游行的亚美尼亚人准备得很好，“简直都不用组织；轮流集会，准备好了食物，相互交换。”³³

事态正朝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纳卡地区很快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这些民族冲突很快就从和平的集会游行向暴力活动转变。2月22日，在纳卡自治州宣布独立仅两天后，该地区的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在阿斯凯兰市发生冲突，并最终演变为一场巷战。暴乱导致50名亚美尼亚人受伤，一名阿塞拜疆人身亡。

28 Regnum News Agency, "Who i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terests? The new reality of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Iran", April 4, 2006, p.11.

29 韩亚伟：《冷战后俄罗斯对阿塞拜疆政策研究》，硕士论文，兰州大学国际政治系，2014年4月，第37页。

30 Brown Archie,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62.

31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第76页。

32 Gilbert Martin,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cise Edition of the Acclaimed World History*, Harper Collins Press, 2001, p.594.

33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

随着亚美尼亚人的游行聚集不断发展，逃回阿塞拜疆的阿族人也越来越多，亚美尼亚和纳卡地区的形势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严重”起来。在同胞的渲染和夸大之下，阿塞拜疆人也集合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发起反抗，方法之一就是在阿塞拜疆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对少数亚美尼亚人施以暴力。2月27日，在巴库以北25公里的苏姆盖特市，一场针对亚美尼亚族军民的惨案开始了。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苏姆盖特惨案造成3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³⁴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收到的报告中写到，苏姆盖特大部分阿塞拜疆警察对暴力事件熟视无睹，而即便在阿塞拜疆驻扎的苏军驱散闹事的人群，他们仍然能够聚集成人数不等的小团体，分散进行暴力行动。对于这一事件，戈尔巴乔夫给出了准确的结论：“这是有预谋的报复亚美尼亚人的行动，他们是要给亚美尼亚人一点‘颜色看’。”³⁵惨案后，几乎所有的亚美尼亚族人都离开了当地。3月1日，苏联军队开进苏姆盖特，驱散示威者，并且实行了宵禁，情况得以改善。

6月，亚美尼亚政府同意接收纳卡自治州为该共和国的一部分。7月，纳卡自治州苏维埃再次作出将纳卡地区归并亚美尼亚的决定，并在此后切断了与阿塞拜疆的一切政治经济联系。阿塞拜疆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迅速成立了民族防御委员会以作为回应。

针对两个共和国不断升温的局势，苏共中央很快做出了反应：一方面，派出军队、警察，控制重点地区，并实行宵禁；另一方面，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稳定人民群众情绪、承诺将解决问题的公开信，并连夜发出。苏联中央以“重新划定纳卡边界将会创下危险的先例”为由，拒绝了亚美尼亚和纳卡自治州的要求，并在包括纳卡自治州的部分争议地区实行特别管理。³⁶7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开会，重申纳卡地区由阿塞拜疆管辖，并且要求两加盟共和国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局势。³⁷9月，戈尔巴乔夫决定派遣苏联内务部队进入亚美尼亚，以稳定局势。作为回应，在亚美尼亚人的主导下，纳卡地区成立了亚美尼亚人占绝对多数的卡拉巴赫委员会，与之前的秘密组织不同，这一委员会是公开的政治机构，意图接管卡拉巴赫地区的政权。12月7日，一场毁灭性地震袭击了亚美尼亚，约有25000人在地震中丧生，这使冲突得以暂时平息。³⁸在震后的混乱中，苏联中央试图通过逮捕卡拉巴赫委员会成员的方式，来缓和日渐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保证阿塞拜疆对纳卡地区的控制权。这一行为并没能带来预想中的效果，反而激起了当地亚美尼亚人更为激烈的反抗与暴动，使得纳卡地区的争端与冲突更加难以控制起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已经是苏共中央在民族敏感问题上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但这显然不够。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行政中心——斯捷潘纳克特，即便苏共中央公开信已经被宣读，广场上仍然有着1000多人聚集，用时任苏联内务部长弗拉索夫的话来说就是：“炭火还在烤，羊肉串还在烤”³⁹。在埃里温，读完公开信，喊完“乌拉”之后的人群也并没有退去，只是从上万人的大型聚集改为无数的小组。

随着局势的逐渐失控，1989年1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在保留纳卡作为阿塞拜疆所属的自治州地位的前提下，成立纳卡州特别管理委员会，直属苏联中央管辖。⁴⁰这一决定受到了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与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内部，亚美尼亚的地位实际上略高于阿塞拜疆，在领土与势力范围问题上继承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的联盟中央更青睐亚美尼亚。⁴¹此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学顾问阿甘别基扬也是亚美尼亚人。1989年12月，他在访问

34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59页。

35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3-594页。

36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第76页。

37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43页。

38 Melkonian Markar, *My Brother's Road, An American's Fateful Journey to Armenia*, I. B. Tauris, 2005, p.51.

39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3页。

40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43页。

41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第76页。

英国期间向 100 多名亚美尼亚裔人士透露说，苏联的一个秘密委员会正在研究有争议的纳卡问题，并暗示纳卡地区不久将同亚美尼亚合并。他的讲话立即传遍亚美尼亚，对于要求将纳卡重新划归亚美尼亚的运动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⁴² 阿塞拜疆在这一时期同样不甘示弱。凭借着名义上和制度上仍然存在的政治管辖关系，阿塞拜疆开始采取行动，想要将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驱离出境。从之后纳卡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行动收效甚微，但在阿塞拜疆国内，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了许多激进政治组织和团体，其中比较有影响力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of Azerbaijan）。它提出用武力解决纳卡问题，并在阿各地举行群众集会和开展宣传活动，鼓动阿塞拜疆民众的独立情绪，而后逐渐发展为脱离苏联、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⁴³

42 道明：《阿塞拜疆在欧亚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研究》，博士论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11 年，第 53 页。

43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 57 页。

二、矛盾激化

1989年8月，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鼓动下，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实施铁路和空中禁运。由于亚美尼亚85%的货柜和物资由铁路运送，此举有效地破坏了亚美尼亚经济，并将纳希切万与苏联其他地区隔绝开来。⁴⁴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反对苏联中央的决定，宣布纳卡州与亚美尼亚合并。⁴⁵在此期间，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1990年1月15日，苏联中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派出内务部队进入冲突地区维持秩序，实施宵禁。部队和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群众集会之间的冲突成为家常便饭。随后，1989年创立的人民阵线宣布夺取国家政权。阿共中央第一书记维奇罗夫请求联共中央紧急支援。1月20日，联共中央派苏军进入巴库城区。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在巴库与苏军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场悲剧被称为“黑色的一月”。在此事件后，大量阿共党员公开退党，而人民阵线在阿塞拜疆国内的影响则不断扩大。随着煽动民族情绪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两国不断发展，这一地区的局势也愈发紧张。7月25日，戈尔巴乔夫就外高加索地区的紧张局势发布《关于禁止建立苏联法律未予规定的武装部队和没收非法保存的武器》的指令，但这一指令遭到了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的拒绝。⁴⁶这段时间内，阿塞拜疆一客车车队遭到亚美尼亚人袭击，造成多人死亡。8月，阿亚边境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同年底，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分别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驱赶出来。⁴⁷

1991年2月15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提出，一切与纳卡州有关的问题都属于阿国内政，解决此类问题属阿塞拜疆本国事务。4月16日，亚美尼亚谴责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进行军事侵略。1991年春天，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名为“新联盟条约”的全民公决，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联盟以取代现有的共和国联盟。阿塞拜疆投票支持新联盟条约，亚美尼亚则抵制这场全民公决。苏联的摇摇欲坠使得政府对军备的管控能力大大下降，这极大地鼓舞了试图用武力争取民族利益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都开始从各地的军火库中获取武器，以建立武装来保护自己。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的反抗激励了全体亚美尼亚人，使其进一步确信，纳卡地区争端的唯一解决方式是全面的武装对抗。⁴⁸5月8日，苏联内务部和国防部开始在纳卡地区解散一些亚美尼亚的武装集团，收缴大量武器。7月，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武装人员开始大规模进攻亚美尼亚人居住区。⁴⁹

到了1991年秋季，冲突双方都更加积极地在纳卡地区的军火库中搜寻武器，以寻求未来武装冲突中的优势。同时，阿塞拜疆宣布对亚美尼亚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封锁。因为亚美尼亚是内陆国家，东面联系里海的通路十分重要，这一通路被阿塞拜疆封锁对亚美尼亚的影响极大。在同一时期，一架阿方的直升机在纳卡地区被击落。这一事件使得两国、两族间的冲突直接升级。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裔向亚美尼亚捐献了大量资金，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甚至推动美国国会通过自由支持法案第907条款草案，于1992年全面禁止美国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援助。而有证据显示，阿塞拜疆此时收到了来自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为数不少的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军火供应。9月20-23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扎纳尔巴耶夫进行了第一次调解努力，但最终没能获得成功，和平努力再次陷入僵局。

44 Michael Croissant, *The Armenia-Azerbaijan Conflict: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Praeger, 1998, p.5.

45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43页。

46 同上，第44-45页。

47 同上，第60页。

48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p.234.

49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60页。

三、高潮与战争

在 1991 年底，阿塞拜疆国民议会通过了 279-XII 号决议，废除了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的自治权，这一立法在当年 11 月 26 日经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签署并生效。⁵⁰ 这一法令是对当年 9 月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宣称将独立建立一个亚美尼亚民族共和国的回击，这一法令的颁布也进一步激化了纳卡及周边地区愈演愈烈的暴力摩擦。12 月 10 日，纳卡州举行全民公决，参与投票的 82.2% 的选民中有 99.9% 赞成独立，这次公决被阿塞拜疆宣布为非法。⁵¹ 随后，纳卡州宣布脱离阿塞拜疆，独立为“阿尔察赫共和国”。阿塞拜疆方面主张，至此，纳卡地区冲突的法律含义被彻底改变：“新成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为帮助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裔居民而进行军事干预，从而使冲突从非国际（国内）武装冲突变为国际（国家间）武装冲突”。⁵² 两国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备战状态。

1992 年 2 月，亚美尼亚率先发难，其自卫力量向阿塞拜疆居民点展开了大规模进攻，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武装在亚美尼亚的支援下继续推进，有组织的军事编队和装甲车也进入了阿塞拜疆境内。2 月 25 日至 26 日夜，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非正规武装团伙的支持下，并在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 366 号步兵警卫团（其中成员主要由亚美尼亚族人构成）的直接参与下，攻占了霍贾里镇。在攻击和占领镇子的过程中，有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数百名阿塞拜疆人丧生，数千平民受伤或被劫持为人质，其中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而该镇则被夷为平地。⁵³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两国也随即进入了战争

到 92 年早些时候，在纳卡地区发生的暴力冲突已经从先前的一场苏联内部的地区摩擦变成一场发生在两个地区政治实体、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影响力也不只局限于纳卡地区和亚阿两国边境，更是牵涉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形势，这使得周边的各方势力都将目光投向此处，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但是，这些周边的大国都采取了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在试图调节地区紧张局势的同时避免自身直接陷入这一麻烦中。

为了便于理解战争的发展过程，我们将 92 到 94 年的战争分为四个阶段，分别进行阐述。⁵⁴

（一）战争的第一阶段——1992 年 1 月到 5 月

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虽然宣称了将独立建国，并且取得了地区苏维埃的行政权，也通过收编原地方部队和建立准军事化组织的形式取得了地区防务能力。但是这一新诞生的国家却没能得到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承认，更别说是此时还在法理上享有对纳卡地区控制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了。正如前文所述，巴库方面认为这场独立是一场国家内部的叛乱。因此巴库政府确定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就是拿下纳卡地区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从而重新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直到 92 年的冬季，阿塞拜疆军队保持着对斯捷潘纳克特的围攻。

50 Government of Azerbaijan, AZƏRBAYCAN RESPUBLİKASININ DAĞLIQ QARABAĞ MUXTAR VILAYƏTİNİ LƏĞV ET-MƏK HAQQINDA.

51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4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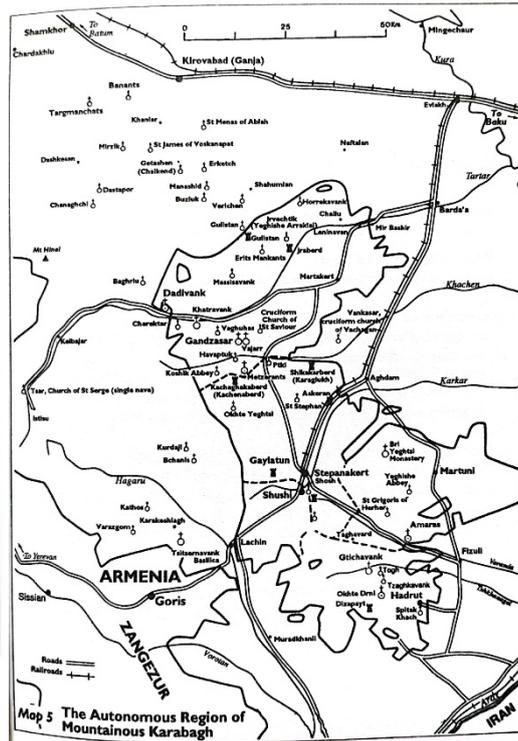
52 参见 2008 年 12 月 2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第 2 段，A/63/662-S/2008/812。

53 参见 2012 年 2 月 17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第 2 段，A/66/704-S/2012/105。

54 Ohannes Geukjian,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Nagorno-Karabakh and the Legacy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TJ International Ltd*, 2012, p.189.



Map 2 Nagorny Karabakh.



Map 5 The Autonomous Region of Mountainous Karabagh

图 5: 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图⁵⁵

图 6: 纳卡地区交通线和军事设施图⁵⁶

如地图所示，当阿塞拜疆开始发动攻势时，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军队实际无法对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武装给予直接支持。此时，如果亚美尼亚共和国希望向纳卡地区派出部队或物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空中运输，可在位于斯捷潘纳克特北部的机场进行降落；二是打通路上距离最近城镇，通过拉钦（Lachin）走廊抵达斯捷潘纳克特。但此时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受到了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两方的经济封锁和警告，并没有直接同阿塞拜疆军队开启正面战争的打算。

到了 2 月，阿塞拜疆军队的糟糕表现使得亚美尼亚共和国开始做战争打算。亚美尼亚自卫力量向阿塞拜疆居民点展开了大规模进攻，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武装在亚美尼亚的支援下继续推进，有组织的军事编队和装甲车也进入了阿塞拜疆境内。2 月 25 日至 26 日夜，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非正规武装团伙的支持下，并在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 366 号步兵警卫团（其中成员主要由亚美尼亚族人构成）的直接参与下，攻占了霍贾里镇（Khojaly）。在攻击和占领霍贾里的过程中，有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数百名阿塞拜疆人丧生，数千平民受伤或被劫持为人质，其中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而该镇则被夷为平地。⁵⁷3 月 28 日，阿塞拜疆在斯捷潘纳克特南部组织的进攻被扑灭，南方的部队人力受损，放弃了进攻企图，只在拉钦走廊和斯捷潘纳克特城之间的舒沙城（Shusha）进行封锁，试图继续用炮击迫使纳卡共和国投降。到 5 月 8 日，纳卡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部队突袭了舒沙城，并迫使阿塞拜疆军队在次日撤退。至此，横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和新生的亚美尼亚人国家之间的军事阻碍被全部拔除，阿塞拜疆军队遭遇了巨大的失败。5 月 18 日，亚美尼亚军队果然抓住机会，进军拉钦走廊，和纳卡共和国正式接壤。

55 Ohannes Geukjian,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Nagorno-Karabakh and the Legacy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p. 16.

56 *Ibid*, p. 18.

57 参见 2012 年 2 月 17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第 2 段，A/66/704-S/2012/105.

霍贾里和舒沙两地的失陷，以及失陷后发生的亚美尼亚人对阿塞拜疆人的屠杀，让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迅速倒台。先前对阿塞拜疆持支持态度的土耳其也开始重新思考其立场，伊朗、俄罗斯等国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场战争。此时起，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对整个高加索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战争的第二阶段——1992年6月到12月

92年的阿塞拜疆总统选举将阿塞拜疆人民政线（Azerbaijani popular front）带到了国家政治舞台的正中，这一民族主义政党立刻改变了先前相对保守的战略，许诺将在短时间内重夺整个纳卡地区。新总统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az Elchibey）将伊朗和俄罗斯视作可能干涉阿塞拜疆内政的外部地区性大国，他主张将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人地区和阿塞拜疆合并来建立一个阿塞拜疆。但伊朗并没有针对这一主张做出回应，只是希望维持纳卡地区的和平。同时，伊朗也在批判亚美尼亚共和国侵略行为的同时，通过维持双方的经济政治联系以增强自身的地区影响力。

到6月12日，埃利奇别伊重启了阿塞拜疆军队对纳卡地区的进攻，这次他将进攻方向放在了纳卡地区东部、北部的马尔塔克特（Martakert）和沙胡米安（Shaumyan）地区。这次进攻卓有成效，纳卡东北部的亚美尼亚人民兵无力抵抗进攻，这是自1988年以来这些地区第一次被阿塞拜疆方面真正控制。出于报复心态，阿塞拜疆人在占领区迫使亚美尼亚人离开，这一措施导致了数万亚美尼亚难民的产生。埃利奇别伊进一步扩大战争论调，声称至少“取得南部的亚美尼亚，至多取得北到萨文湖（Lake Saven）的大片土地”，同时，他还声称“要通过在纳卡地区的军事胜利来让俄罗斯和伊朗正视阿塞拜疆，从而采取一种亲阿塞拜疆立场”。⁵⁸

这场胜利让阿塞拜疆的国内政治也备受鼓舞，阿塞拜疆人认为自己已经没什么不能失去的了，他们将奋战到底去取得胜利；而另一边的亚美尼亚则备受打击，国内在担心输掉这场战争的同时，也在担心土耳其会不会趁火打劫和阿塞拜疆一同提出要求。

到了9月，阿塞拜疆军队继续进军，试图打开南部战线，向之前失去的拉钦和舒沙发起进攻。但这一次亚美尼亚和纳卡方面抵挡住了进攻，战局进入了僵持的局面。

在整个1992年，武装力量显然胜于外交谈判，不论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还是纳卡地区政府，他们都不愿接受俄罗斯和伊朗提出的和谈建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试图通过外交斡旋来调停地区争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和联合国（UN）都尝试通过多边外交方式处理纳卡问题，具体的细节将在下文讨论。

在这一阶段中，阿塞拜疆人与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都不愿退让，这种政治、军事上的针锋相对和僵持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58 Ohannes Geukjian,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Nagorno-Karabakh and the Legacy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p.196.

四、短暂和平与战争升级

(三) 战争的第三阶段——1993年4月到10月

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双方军事力量互相僵持的局面造成了短暂的停火，似乎让这场冲突出现了一个窗口期以供各方进行谈判。但实际上，停火的背后是交战双方的苦衷。对阿塞拜疆人来说，随着战事拖延，反攻的进度迟缓让本国战争热情下降；对纳卡的亚美尼亚武装来说，面对火力和装备均优于自己的阿军也难以取胜。另外，冬季的到来到两国的国际贸易减少，两国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休养生息，这才有了直到93年3月的短暂和平。

但是到了4月，亚美尼亚共和国方面决定全面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完全支持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的领土要求，并且试图直接控制纳卡地区。一场亚美尼亚人的春夏攻势就此展开，此次亚美尼亚人的战线很长，直接对整条战线发起进攻。这次攻势最先是对阿塞拜疆最西侧的卡尔巴贾尔（Kelbajar）进行攻击，期待打开从西北进入纳卡地区的路线，将阿塞拜疆的西侧飞地吞并。这一次进攻成功为亚美尼亚军队打开了局面。随后的6月里，亚美尼亚军队和纳卡的亚美尼亚人武装共同进攻，不只在北方重新夺得了92年阿塞拜疆取得的马尔塔克特地区的控制权，更是在西南方向取得了纳卡南部的原阿塞拜疆控制区域。到8月底，亚美尼亚军队已经取得了包括阿格达姆、富祖利、贾布拉伊和赞吉兰等西南方重镇，成功地在斯捷潘纳克特周边建立了一圈屏障，让阿塞拜疆人的火炮无法再进行炮击。

亚美尼亚军队更是在6月针对卡尔巴贾尔的进攻中提出了“向巴库进军”的口号，到9月初时，这一口号几乎已经成真，在亚美尼亚军队突破了阿军战线后，几乎可以直接通过铁路和公路畅通无阻地直抵巴库。这样的重大战争失败让埃利奇别伊也迅速倒台。政治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军队指挥和部署的混乱，阿塞拜疆军队几乎没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而亚美尼亚军队由于有着大量占领区需要消化，也放缓了进攻步伐。早在6月的卡尔巴贾尔攻势中，亚美尼亚军队就被发现在占领区存在屠杀、驱赶阿塞拜疆人的行为，到10月底，有45-50万阿塞拜疆居民被赶出家乡，成为难民。

同时，亚美尼亚悍然入侵的行为也引起了多方势力的响应。土耳其出于对与盟友阿塞拜疆人的担忧，9月在与亚美尼亚的边境上部署了数千名士兵，但这一行为被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驻军所阻止。俄罗斯方面担心阿塞拜疆也经由土耳其导向北约立场，希望通过维持和平乃至维持现状来保持自己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亚美尼亚军队在西南部的攻势逼近伊朗的边境，这也引起了伊朗的警觉，伊朗方面也警告了亚美尼亚，不准在边境附近进行军事行为。几个域内能够直接投送力量的地区性强国都开始认为这场战争的烈度开始有些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

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也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关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与亚美尼亚军队的反人道行为和公然违背国家边境的军事行为连续下达了数份决议草案，试图为地区局势降温。欧安会也通过明斯克小组机制试图推动停火谈判，但实际上国际组织都缺乏在这一地区实际投送力量的能力，包括维和部队等行动性条款都没能最终通过。

纳卡地区的战争已经全面扩大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并且时刻有恶化的风险，在此情形下，战争必须尽快停止才能避免局面进一步恶化。

五、战争结束与停火谈判

在战争烈度和局势紧张程度达到一个新的峰值时，93年10月，阿塞拜疆举行了有一次总统选举，前苏联副总理，克格勃出身的硬派军人盖达尔·阿利耶夫 (Heydar Aliyev) 取得民意，入主巴库。

这位前克格勃官员在91年苏联解体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纳切希万自治共和国 (Nakhchivan Autonomous Republic) ——一处位于纳卡地区西南部的属于阿塞拜疆的飞地，并且在这里实行了实际上独立于巴库的统治，在92年的战争中他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签订了和约，保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92年11月，他在纳切希万召开了新阿塞拜疆党制宪会议，组建了新阿塞拜疆党，并且赢得了93年10月的选举，成功入主巴库。至此，战争进入了第四阶段，双方都已经完全明确了战争的民族主义性质，也在考虑到底如何为这场战争收场了。

(四) 战争的第四阶段——1993年12月到1994年5月

阿利耶夫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一上台就迎合民意，将夺回纳卡地区和西南部失地作为目标，改变了93年7月以前的停火态度。12月，阿塞拜疆军队开始了全线反攻，这完全违背了欧安会明斯克小组和俄罗斯的停战要求。

阿塞拜疆军队不计代价的凌厉攻势成功取得了马特科斯特附近的铁路枢纽和一些村庄，避免了亚美尼亚进军巴库的可怕结果，但付出了6000-10000人的惨重代价，而亚美尼亚方面的损失可能只有1000人左右。⁵⁹ 另外，外国势力在这场战役中的干预是不可忽视的，来自阿富汗的雇佣兵站在了阿塞拜疆一方，而海外的亚美尼亚侨民则在尽可能帮助纳卡的亚美尼亚武装。

随着冬季的到来，各方也都进入了损耗期，战争交火减少，双方都期待通过国际社会取得一些帮助，或者取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战争结果。亚美尼亚总统出访了英国，希望他们能够对地区局势做更多努力，因为英国是阿塞拜疆的重要贸易伙伴，并且英国不在欧安会明斯克小组的名单中。阿塞拜疆方面则尽可能游说土耳其为之提供帮助，希望借助土耳其的力量避免俄罗斯主导的调停方案落实，因为阿塞拜疆担心俄罗斯是为了继续像70年代那样把控制本国丰富的油气能源。

到了94年4月，天气转暖后，亚美尼亚军队又开始了一轮攻势。这次攻势打破了阿塞拜疆军队在马特科斯特地区的防线，取得了一些村庄，并且成功将战线推到了阿塞拜疆的腹地省份，这让阿塞拜疆在5月12号同意签署俄罗斯搭桥订立的比什凯克停火协议。这背后或多或少也有着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强大军事能力的外交恫吓在，而已经饱受战争摧残的各方也都认可维持现状可能是这场战争最好的结果。

但是这份协议只是让战争停火，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安会都缺乏在这一地区维持一支常驻维和部队的的能力，也不能让冲突双方强制执行领土决议或是民族和解。真正的谈判在5月12号的停火后才正式开始。直到今天，欧安会的明斯克小组机制人在不断为纳卡地区的和平安定寻求解决方案，并且也是唯一可用的多边解决机制。

59 Ohannes Geukjian,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Caucasus: Nagorno-Karabakh and the Legacy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p.203.

缔造和平：国际社会的介入

一、欧安会的介入

（一）欧安会的安全与信任机制

欧安会全称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是一种国际会议机制和进程。欧安会的构想最早是由苏联和东欧国家提出的，他们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和西方世界进行互信、和平对话的窗口，目的在于从法律上确认二战后欧洲的边界，排挤美国在西欧的势力，同时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⁶⁰ 经过 1972 年美苏双方的裁军谈判，给欧安会的建立打下基础。到 1975 年，共计 35 个国家首脑一同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标志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正式建成，这是一个论坛性质的，不具备法律性质和强制力的文件。在《最终文件》中，欧安会确定了“主权平等”、“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边界不可侵犯”、“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国与国之间加强合作”、“各国忠实履行国际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共 10 条直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最终文件》中实际上体现了美苏两方乃至更多签署国之间的不同，既包括要求尊重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念，也包含苏联要求的边境不可侵犯的等概念，这使得《最终文件》不能终结争论，反而成为各国之间争论时有理可依的依据。

在欧安会最为关注的安全与信任问题上，欧安会在成立后的 20 年间不断做出努力。1984-86 年间，欧安会完善并签署了《斯德哥尔摩文件》，将欧安会建立的信任与安全措施范围扩大到包括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全部欧洲领土，并且明确了针对国家间军事演习的规模、程度和公开问题，也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与会国如何对军事行动进行监督。这份文件也成为了一份有政治约束力的文件。

到 1990 年，欧安会进一步完善安全与信任机制，签署了《维也纳文件》。文件中对《斯德哥尔摩文件》的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细化，首先明确了欧洲的武器削减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展了军事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流程；并且完善了各国间军事设施和部署的审查机制。《维也纳文件》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维也纳机制”，保证了出现冲突时两方需要邀请第三方调解来保证争端的和平解决。

总的来说，欧安会的安全与信任机制建立是成功的，在冷战中给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一个可以构建战略互信，交流有效信息的平台。但是当时间来到 1989 年后，世界一极开始摇摆时，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欧安会的交流与信任机制在解决尖锐的地区问题时显得有些不从心。

（二）欧安会在纳卡问题中的尝试

欧安会最早尝试参与解决纳卡问题是在 1992 年，在赫尔辛基欧的会议中，欧安会提议建立一个会议平台以讨论纳卡地区问题的解决。当时组要是为了应对纳卡地区暴力冲突中体现出的人权问题。一个包含白俄罗斯、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土耳其和美国的九国小组被建立起来，加上当时被认为是阿塞拜疆内战发生国的阿塞拜疆，共同解决纳卡问题。这一会议在明斯克举行，故而把这一会议暂时称为明斯克会议。

到了 1994 年，在欧安会布达佩斯首脑会议上，明斯克会议九国分别派出常驻代表组成了一个专门针对纳卡地区问题进行处理的小组，称之为明斯克小组。明斯克小组在随后至今

60 张吉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硕士论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06 年，第 3 页。

的近 30 年中，始终致力于对纳卡地区的人权问题和边境问题进行调查，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的方式来推动纳卡地区问题取得和平稳定的解决方案。但在第一次纳卡地区战争中，明斯克小组并没有执行能力和合法程序来干涉暴力冲突与人道主义危机，当时更多是以小组代表个人身份或国家身份来推动问题解决。例如 1994 年 5 月签订的《比什凯克停火协议》就是俄罗斯的明斯克小组代表推动在亚阿两国之间签订的。

1992 年 1 月 30 日，随着苏联解体而获得独立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加入了欧安会，这为欧安会以寻找和平方式解决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冲突创造了机会。1992 年 1 月 30 日至 31 日，欧安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在位于巴黎的会面中决定向卡拉巴赫冲突地区派出调查员。⁶¹ 调查任务完成后，在 2 月 28 日，欧安会高级官员委员会（Committee of Senior Officials, CSO）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要求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要求所有欧安会成员国实施对冲突各方的武器禁运，并委托组织内的冲突预防中心采取旨在“建立冲突各方 - 阿塞拜疆代表、亚美尼亚人民和纳卡地方政权之间的对话”的相应措施。⁶²

由于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上这些措施无法实施。3 月，阿塞拜疆向欧安会高级官员委员会申请召开另一次特别会议。在 3 月 13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后，CSO 向欧安会理事会寻求帮助，建议轮值主席尽快在欧安会主持下召开有关于纳卡问题的会议

1992 年 3 月 24 日，由各国外交部长组成的欧安会理事会在赫尔辛基召开了第二次特别会议，会议强调了在纳卡冲突解决进程中加强欧安会影响的必要性。时任欧安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吉里·丁斯特比尔受历史会委托前往相关地区进行调查，以此建立有效的停火协议并为双方确定制定和平协议的形式。同时，理事会决定“将提供一个常设论坛，以期在欧安会的原则、义务和规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危机”。⁶³ 同时，根据理事会《赫尔辛基决定》，白俄罗斯、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土耳其、美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 11 国代表以及“由选举产生的或其他的纳卡地区代表”应当参与到冲突解决进程中，理事会决定将于 1992 年 6 月 21 日在明斯克召开正式会议。

然而，由于本篇上文部分所叙述的，双方在 1992 年 4-5 月所产生的敌对冲突，正式会议未能召开。基于这种情况，明斯克小组应运而生，由计划参与会议的 11 国组成的工作组将进一步处理与纳卡冲突相关的问题。明斯克小组采取的第一项行动被称为“中期会晤”。⁶⁴ 明斯克小组的第一次中期会晤于 1992 年 6 月 1 日在罗马举行，中期会晤试图克服现有的分歧并勾勒出未来和平的蓝图。1992 年夏天，在罗马共组织了五次中期会晤，但没能取得显著成果。根据欧安会理事会《赫尔辛基决定》，“由选举产生的或其他的纳卡地区代表”有权参与到相关谈判中，但这一表述没能确定这些代表在谈判中的实质性地位，因此，在罗马的中期会晤基本都集中于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明斯克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原则，我们会在下文进行阐述。

1993 年年中，为了提高明斯克小组的工作效率，欧安会理事会确定了明斯克小组参与国家的参与形式，参与国中政治分量大的，影响力大的可以直接参与到谈判进程中，而调解人中政治分量小、影响力有限的国家只能间接参与明斯克小组的工作。基于这一改动，仍然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有重大影响的俄罗斯，成功促使冲突各方——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共和国——签署了停火协议。

61 Юнусов 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в начале 21 века: конфликты 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угрозы*, Баку, 2007, pp.19–32.

62 Карен Бекарян,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в карабах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Москва, 2016, p.145.

63 *Ibid.*

64 В.Н.Казимиров, *Незаконнорождённая Минская группа ОБСЕ*, <http://www.vn.kazimirov.ru/x004c.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2 月 13 日。

二、联合国安理会的介入

由于种种原因，联合国安理会对纳卡地区的介入相对迟滞。在 1992 年的安理会会议上，纳卡地区的局势才被纳入其讨论之中。1992 年 5 月 12 日，安理会第 3072 次决议第一次将纳卡冲突纳入了讨论议程。并同时发表了声明，表达了安理会对双方在德黑兰联合公报一致同意停火后，冲突再起，各方违反停火协定的关切。决议同时欢迎秘书长紧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当地，对当地冲突展开调查并协助安理会人道主义物资等援助。

1992 年 7 月 24 日，根据之前所派遣的代表团对秘书长的报告，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调查后，1992 年 8 月 26 日，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成员发表声明 (S/24493)：

安理会成员对最近关于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局势恶化，造成人命损失和物质破坏的各项报道，表示十分关切。

安理会成员强烈呼吁当事各方和其他有关方面立即停火，并支持在欧安会的范围内举行的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的明斯克会议以及在罗马举行的筹备谈判所作的各项努力。各成员敦促当事各方和其他有关方面与欧安会密切合作，并积极参与这些谈判，以期尽早使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各成员注意到，秘书长已派遣实况调查团前往该区域，并准备派观察员出席上述的欧安会谈判。安理会成员将在适当的时候，根据该区域局势的进展，进一步审议联合国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所能发挥的作用。⁶⁵

这一声明表明安理会开始持续对不断升级的纳卡冲突表示关切，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需要加强同欧安组织的合作，也表达了安理会内部有意愿开始着手对纳卡冲突进行干涉。

1992 年 10 月 27 日，在安理会第 3172 次会议上，安理会根据之前事先协商达成的共识，将“关于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局势”列入议程。并且在经过协商后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深切关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附近的严重局势仍在继续，导致物资和人命损失，尽管 1992 年 9 月 21 日曾在索契缔结停火协定。

安理会重申其 1992 年 8 月 26 日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的声明 (S/24493) 的内容，尤其是支持明斯克会议在欧洲安全和合作公议的范围内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所进行的各项努力。安理会强烈呼吁所有各方和其他有关各方立即执行停火，并解除所有的封锁。安理会呼吁立即重开明斯克会议，并依照主席的议事规则展开政治谈判。安理会促请所有各方和其他有关各方同欧安会密切合作，并积极参与明斯克会议，以期就各方的争端尽速达成全面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很高兴秘书长有意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该区域，研究联合国在支持欧安会的努力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能够做出的贡献。⁶⁶

6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2-1993 年度报告，A/48/2，第 362 页。

66 同上，第 363 页。

安理会在8月26日所再次发出的声明，进一步要求和强调有关各方立刻停火。同时继续加强与欧安组织的合作，呼吁有关各方参加明斯克会议。安理会还会进一步派遣代表前往纳卡地区，协助安理会后续的调查工作，与欧安组织的接触以及帮助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的展开。

1993年4月5日，在邀请阿塞拜疆代表参与讨论后，安理会再次就纳卡冲突发表声明：

安全理事会对于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中敌对行动的加剧，特别是亚美尼亚地方部队入侵阿塞拜疆共和国克尔巴贾尔区，表示严重关切。安理会要求立刻停止危害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这一切敌对行动，并要求撤出这些部队。“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重申该区域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并对欧安会和平进程表示支持。它希望继明斯克小组最近获致初步协定之后，能够很快地达成停火协定、确定部署监测人员的时间表、起草政治宣言和尽快召开明斯克会议。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同欧安会协商，斟酌情况调查真相，并将对现场局势的判断写成报告，急速提交安理会。⁶⁷

这一声明，表明了安理会开始着手与欧安组织合作共同完成对纳卡冲突的调查。安理会与欧安组织协商，委托欧安组织对当前冲突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联合国，以作为安理会下一步行动的重要依据。这实际上不仅是委托欧安组织暂时成为安理会的一个“调查团”，来针对纳卡地区的冲突进行调查，更是希望欧安组织在调查现状的同时能够尽力促成双方停火甚至是和平解决纳卡争端。同时，由于局势的变化，安理会谴责了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克尔巴贾尔地区入侵活动。

最终在1993年4月30日，在邀请亚美尼亚代表加入讨论之后，安理会达成了第822(1993)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冲突的1993年1月29日声明(S/5199)和1993年4月6日声明(S/25539)，

……

1. **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和敌对行为，以期建立持久的停火，以及将所有占领部队撤离克尔巴贾尔地区和最近被占领的其他阿塞拜疆地区；
2. **敦促**有关各方立刻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明斯克集团和平进程的框架内恢复谈判，以解决这个冲突，而不采取任何足以妨碍和平解决问题的行动；
3. **吁请**让国际人道主义救济工作顺利无阻地进入该区域，特别是所有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以便减轻平民的苦难，并重申所有各方均有义务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
4. **请**秘书长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当值主席和欧安会明斯克集团主席协商，评价该区域特别是阿塞拜疆克尔巴贾尔地区的局势，并向安理会提出进一步的报告；
5.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⁶⁸

6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2-1993年度报告，第367页。

68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2-1993年度报告，第369页。

同时，在 1993 年之后的安理会会议中，安理会对纳卡冲突相继通过了三份的决议草案。这些决议草案大都要求立刻停止双方的战争，加强对该地区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加强欧安华与安理会之间的合作，加强对纳卡地区的调查，尽快促进双方和谈和停火。

III

大厦倾覆：苏东剧变和二十世纪末的国际局势

前文中，我们对于纳卡冲突的来龙去脉作了叙述，但若想更全面地了解纳卡冲突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将纳卡冲突放在更宏观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而本章节则是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前苏联及东欧地区的局势做出整体的叙述，从而让代表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以促进会议准备。

本章的第一节以历史叙述的形式讲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大致过程，而这一历史事件正是纳卡冲突问题的导火索之一。如其他篇章所述，纳卡冲突的种子在沙俄时期就已经早早埋下，而苏联政府在纳卡地区实行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以强力手段对这一问题进行封冻；那么一旦有某种力量让这一强力手段难以为继，原有的问题就会彻底爆发。而本节所述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正相当于打开了那个封冻问题的盒子：戈尔巴乔夫政府奉行的“公开化”与“民主化”的政策成为了亚阿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催化剂，促使双方围绕纳卡地区的矛盾不断激化；而也正是因为苏东地区的剧变，让苏联政府深陷内部重重矛盾之中，政府在地方的权威也随着剧变的进程逐步下降，使得苏联政府既无心也无力解决纳卡问题。换言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与纳卡战争的准备进程是同步而又互相关联的。

本章的第二节则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对于后苏联时代，苏东地区的权力真空和地缘政治乱象做出叙述，从而表明，纳卡战争问题实际上只是苏联解体后，前苏东地区诸多政治乱象的一个小小缩影，问题的爆发是多方面因素的产物，代表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体悟纳卡冲突背后的实质。

诚然，中东欧地区对于俄罗斯的疏离与西方的渗透，反映出俄罗斯无法维持在前苏东地区原有的强权政治体系，对于纳卡等地缘政治问题已经不能完全掌握主动权。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绝非完全被动的，而是审时度势制定合理的政策：俄方在东欧地区战略相对保守，力求与西方减少摩擦；而在前苏联加盟国之间或加盟国内部的冲突中，则是坚守自身的利益底线，并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扩大自身影响力，维持自身在独联体内部的大国地位。本节即是以此为基调展开的，通过对于美俄欧三方新型关系的叙述，以及佩塔洛沃、阿布哈兹等与纳卡冲突有共同点的地区争端案例的分析，让代表更好地思考各方势力会如何围绕纳卡进行政治博弈。

一、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

从1989到199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东欧八国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了剧变。他们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由亲西方的右翼所掌握，有着相对类似的政治口号“与过去决裂”“回归欧洲”等等。东欧剧变始于波兰，终于南斯拉夫解体。虽然东欧的巨变在短时间内发生，但是导致其巨变的祸根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发生在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最早给剧变埋下了祸根。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波兹南事件”还是“十月事件”其背后都有西方势力的间接参与。

1980年初，波兰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其之前制定的经济高速增长计划相违背。1980年7月1日，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波兰政府决定大幅提高肉产品的价格。这一举措引发了民众的严重不满，群众纷纷上街游行，抗议这一举措的实施。到1980年8月14日，格但斯科和切什青两地的工人联合罢工，并成立了厂际联合罢工委员会，实行统一领导，推举瓦文萨为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从此以后，波兰的罢工开始由无组

织无领导成为有领导的阶段。虽然政府之后与罢工委员会达成了协议，9月1日，工人复工。但是在团结工会名义下形成的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却得以保存下来。1980年11月10日，华沙法院批准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团结工会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团结报》。在1981年9月，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其性质逐渐从一个工会开始向政党转变，同时，团结政府开始发出反对政府，希望夺权的信号。波兰政府迅速做出了措施，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取缔了团结工会，并逮捕了包括雅鲁泽尔斯基为首数千名团结工会的各级领导人和骨干分子。1983年7月，军事管制结束。但是从1983年到1986年的几次大赦，团结工会骨干和反对派人士得到了释放。他们使团结工会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波兰发生剧变做好了铺垫。

1986年，波兰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物价飞涨。团结工会在逐步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1988年，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已经使波兰内部民不聊生，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团结工会把握住了时机，鼓励和组织罢工，迫使波兰政府党于1989年1月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立场》的决议。并在2月5日到4月六日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团结工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相同的地位，即合法的党派。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双方反复磋商，签署了《有关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三个文件，达成了有关团结工会合法化、改行总统制和增设参议院、实行议会民主等协议。在之后6月的波兰大选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瓦文萨顺利成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也组建了联合政府。开始对波兰国内的苏联模式进行彻底的清除。

波兰发生的剧变很快影响到了与其处境相似的匈牙利。匈牙利政府于1989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即正式宣告实行多党制。同时仿照波兰举行圆桌会议。但是与波兰不同的是，其反对组织直接来源于党派自身。在党内某些高层的默许，鼓励，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下，形成了反对派组织。同时受到西方和平演变和苏联的影响，在执政党内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局面。这就使得匈牙利内部发生剧变是不可避免了。

与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剧变所不同，东德发生的剧变有其内部的特殊原因。由于两德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拉大等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导致东德的年轻人对西德非常向往，并纷纷外逃，且人数不断增多。为了阻止这一现象继续恶化，1989年10月，东德政府封锁了边界。不少青年人私闯边界，被边防军打死打伤的事件不断出现。这直接点燃了东德民众的怒火，从10月开始，群众纷纷开始上街游行，他们要求获得新闻、选举、旅行等自由，还要求严惩腐败。与此同时，东德内部领导层就改革和人权等方面发生了分歧。且1989年10月上来的克伦茨政府难有作为，只能坐视局势进一步的恶化。1990年3月，东德进行大选，原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败北，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

此时，连锁反应已经发生，即使是相对保守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无法幸免。经过1968年初的布拉格之春，胡萨克带领捷克斯洛伐克走向了保守国家的行列。而保加利亚也是相对更加保守的国家，政局也相对更加稳定。1989年初，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日夫科夫还非常自信的强调保加利亚除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之外，不会有别的政党。然而在1989年下半年在东德政局的影响下，这两个国家的反对派就向执政党发起了新的攻势。1989年11月24日，捷共党书记辞职。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提出政治多元化，企图以退为进。然而为时已晚，其最后被逼下台。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最后三个发生剧变的国家。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下台以后，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罗马尼亚。在1989年12月16日，蒂米什瓦事件爆发。其总统齐奥塞斯库走投无路，最后被逮捕并枪决。此时一个巨大的浪潮已经形成，其余苏联东欧的卫星国根本无法独善其身。最终，南斯拉夫分裂，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剧变。

戈尔巴乔夫以及当时的苏共中央对当时的东欧剧变反应迟滞，甚至可以说是漠不关心。其改变了苏联将东欧国家视为外交优先事项的惯例，不愿意发挥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作用。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在华沙条约组织上表态说“我们是平等关系，苏联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承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意味着各方需承担对本国局势的全部责任。”“从现在开始，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生活。”⁶⁹这一表态直接摒弃了之前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

东欧剧变的恶果很快就反噬给了苏联，苏联势必要为其自身“一厢情愿”的为其东欧的卫星国解绑付出代价。在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日趋系统，并受到了这些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士的赞扬。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民主化”、“公开性”、“思想意识多元化”，为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泛滥，打开了思想牢笼。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经济原因造成了大量民族矛盾长期被掩盖着、压制着，得不到及时解决，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实际上问题成堆。这几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各民族倾吐积怨提供了机会，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⁷⁰

在苏东剧变的同时，苏联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表现为苏共整体在国内政治地位快速下降，并开始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借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在1989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包括叶利钦在内一大批激进民主派代表当选。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几乎一致同意，通过了取消宪法第6条，即“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此条款的决定。3月，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宣布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同年5月，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主席。7月，由于认为苏共二十八大辜负了党内和社会对民主力量的渴望，叶利钦和54名俄罗斯联邦代表宣布退出了苏共。

在地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加盟共和国分别发表“主权宣言”或者“独立宣言”，称自身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要求独立。1991年3月，在对新联盟条约的投票中，虽然支持保留联盟的占比达到了76.4%。但是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国反对全民投票。

7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9个加盟共和国表示愿意签署。⁷¹但是“八一九事件”的爆发，则使形势急转直下。8月23日，叶利钦宣布暂停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解散苏共中央，各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自己决定。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解散苏共中央的建议，叶利钦下令将苏共和俄共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收归俄罗斯国家所有。29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到1991年12月中旬，除俄罗斯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都已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宣布建立独联体。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⁷²。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终结。

69 波利诺夫.М.Ф, “Этапы и фигуранты разрушения СССР”,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No.2, 2011.

70 王正泉著：《苏联东欧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

71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73页。

72 高歌：《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3期，第16-20页。

二、后苏联时代的权力真空和地缘政治乱象

大国的兴衰更替是促进国际权力结构重组的关键因素，而苏联作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也必然对于后冷战时期世界地缘格局的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典型的“两极格局”，海权势力的代表美国和陆权势力的代表苏联二者实力相当，其余与它们实力相差较大的国家，或依附于二者其一，或实际受其影响从而间接受其支配。苏联解体后，两极中的一极崩溃，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主”，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初期，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存在极大的优势，具备向全球范围推行其安全战略与国家意志的能力。而后冷战时代初期世界权力真空与地缘政治的乱象，正是建立在这种“单极倾向”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上的。

权力真空与地缘政治乱象，最突出体现在“心脏地带”（Heartland）⁷³。自16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沙俄及苏联的势力范围，然而苏联的解体，使得俄苏在这一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几乎化为乌有。欧亚大陆出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真空，心脏地带陷入了一种“破碎状态”，不仅内部陷入深刻的分裂，又夹在地缘战略大国的竞争之中，面临严重的外部压力。⁷⁴

（一）中东欧对俄罗斯的疏离及西方的渗透

后冷战时期权力真空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东欧地区的重新定位。在二战后，东欧地区被划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先后通过调整东欧国家边界、扶植亲苏政党、入境驻扎军队、运用国家组织等形式将东欧地区置于自身的强力统治之下，在东欧地区建立了1000余公里的战略纵深，将东欧国家变成自身的“卫星国”。⁷⁵然而，依靠强力手段建立的强权体系终究是不稳定的。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和欧洲格局面临着重新组合。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欧国家在与苏联（俄罗斯）解除同盟关系后，纷纷“重心西移”，表现出对俄罗斯的疏离和对于欧洲-大西洋体系的靠拢。

中东欧国家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想倾向，与其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历史恩怨以及冷战时期苏联对于中东欧的高压政策，让中东欧国家普遍有着强烈的恐俄、防俄情绪；而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对于“欧洲”的归属感更坚定而明确，它们希望通过“回归欧洲”——即向欧洲靠拢，疏离俄国——来向国内外昭示它们“意欲摆脱苏联的政治、经济 and 军事控制及其影响，并认同西方现行的政治价值取向和经济制度”⁷⁶。受这样的身份认同影响，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个矛盾期。矛盾期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东欧国家迫切希望与俄罗斯重构平等的关系。如上一篇所说，东欧剧变后，苏联曾希望通过改革延续华约和经互会的存在，进而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苏联在东欧国家之上的“超然地位”；但东欧国家对维持这种尴尬的关系毫无兴趣。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纷纷表示退出华约，拒绝改组经互会，并且要求苏军尽快撤离出境，进而彻底废除原有的俄苏-东欧关系，代之以新的睦邻友好关系。自1991年始，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陆续签署了新的双边友好合作条约，新双边条约中不再有限制中东欧国家主权，侵犯中东欧国家利益的条款，与武力和政治干预无涉，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的国家关系得以确立。

其二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较为淡漠，而积极向西方靠拢。因为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为避免重新受到俄罗斯的控制，积极寻求西方势力范围的保护。这样的态度给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进行渗透的机会，渗透的主要手段是北约与欧盟的东扩。20世纪90年代

73 注：心脏地带这一概念，是哈尔福德·麦金德在1919年发表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首先提出的。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应当包括东起西伯利亚森林地区，西至包括黑海的东欧地带，北起北极圈的边缘，南至中亚的草原。

74 Saul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9, p. 49.

75 金新、宋瑞鲁：《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第14-17页。

76 王一诺：《冷战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2012年4月，第20页。

初，捷克斯洛伐克（1990年9月）和波兰（1991年4月）就曾流露出要加入北约的意向。1993年9月，波兰首先提交了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随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纷纷提出入约请求。而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与北约的东扩近乎同步推进。由于冷战结束，美国的战略前沿重点由西欧逐渐向东欧转移，西欧国家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减轻，战略自主性显著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欧国家高举欧洲联合的旗帜，标榜自己的“欧洲”、“自由”标签，借“欢迎东欧国家回家”这样的口号吸引东欧国家靠拢。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欧共体国家就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了欧洲联盟，并且不断向“心脏地带”进行扩展，将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不断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努力消弭东西欧之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差异。中东欧国家“入约加盟”的举动很明显会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但由于国力的差距，俄罗斯对此无力干涉，只能默认北约不断接近俄罗斯的边界，在俄罗斯边境打下几颗坚实的“钉子”。

其三是俄罗斯对中东欧地区的缺乏重视。冷战结束初期，中东欧国家并不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相比中东欧地区，俄罗斯重视与美国及西欧大国的关系。俄罗斯奉行亲美的“浪漫主义”外交政策，对中东欧国家没有制定长远的政策目标，更多地是急于甩掉中东欧这个“包袱”。虽然1993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曾指出，“现阶段战略任务是要防止东欧地区成为导致俄罗斯隔离于西方的某种缓冲带，同时阻止西方大国将俄罗斯排挤出东欧地区的企图”⁷⁷。但俄罗斯并未制定具体的战略政策以促进这一任务的落实。相反，俄罗斯对于中东欧国家“西向”的战略采取默许的态度，对于原北约国家争取加入北约及欧盟等举措没有第一时间作出积极的应对措施。直到北约逐步推进至俄罗斯边界时，俄罗斯才试图谋求中东欧国家保持中立和非核武装，提议中东欧国家的中立和安全，可从西欧、美国和俄罗斯那里获得共同保障等手段维系自身的安全空间。但这一策略没有达到预期，反而一定意义上加快了把中东欧国家推向西方怀抱的进程。

东欧国家逐渐疏离俄罗斯而向西欧地区靠拢，极大程度的增强了西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实力，而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欧洲对于美国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欧洲国家不愿再一味地被美国主导，更不希望沦为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海权体系下的附庸，而是希望通过增强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从而增强自身地缘政治独立性，并且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地发挥更大作用。欧洲或者说欧盟的崛起与变革让美俄欧三方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平衡，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让俄罗斯进一步丧失了对于欧洲的地缘政治优势，增大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重新崛起为苏联式的地缘政治超级大国的难度；但另一方面，欧盟的东扩与欧洲一体化推进，让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联系更加紧密，为俄罗斯在新时代融入欧洲创造了机遇。在90年代后期，俄罗斯逐步进行了外交调整，从“亲西方”外交转向“全方位”和“多极化”外交，开始重新审视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自1992年起，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通过签订政治条约，经济和清算协议，建立专业银行等措施共同改善双边经贸关系。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渐现复苏迹象，中东欧国家逐渐成为俄罗斯拥抱、融入欧洲一体化浪潮的桥梁。

⁷⁷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январь, 1993, 转引自王一诺：《冷战中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研究》，第28页。

（二）前苏联地区内部的分裂

后苏联时代的另一大政治乱象就是前苏联地区内部的分裂。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原有东欧，波罗的海，中亚地区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大量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得这一地区在冷战期间保持的“统一状态”被打破。事实上，与其说“统一状态”，不如说“冰冻状态”：在苏联政府建构的超民族统一体系下，东欧原本复杂纠缠的民族仇怨与领土纠纷被暂时地封存，但事实上并未有效解决。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有的等级状态向无政府状态转变，压制矛盾的苏联政府不复存在。争端解决机制的消失，也让原本封存的矛盾迅速激化。

这种内部分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其代表即为本会场的核心议题纳卡冲突，而除此之外，俄罗斯与拉脱维亚在佩塔洛沃地区 (Pytalovo) 的争端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一问题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拉脱维亚在沙俄扩张潮流兴起后一直被沙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脱维亚于 1918 年 11 月 18 日摆脱俄国宣布独立；1920 年 8 月 11 日，当时的苏俄政权和拉脱维亚共和国签署了《里加和约》，和约规定，佩塔洛沃地区划归拉脱维亚，1938 年拉脱维亚将佩塔洛沃改名为阿布列涅；1940 年拉脱维亚成为原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后，阿布列涅划归俄罗斯普斯科夫州并恢复其历史名称佩塔洛沃。自拉脱维亚 1991 年 8 月 22 日恢复独立后，拉俄两国一直对佩塔洛沃地区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休。拉脱维亚方面声称，拉脱维亚的现行宪法是以 1922 年 2 月 15 日通过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为蓝本并在恢复独立后重新颁布的，宪法规定拉脱维亚边界根据《里加和约》来划定，以此表明对佩塔洛沃主权的声索。而俄方则持有不同态度，俄罗斯主张《里加和约》随着拉脱维亚 1940 年 8 月 5 日并入苏联已失去法律意义，而根据 1975 年 8 月 1 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定，欧洲各国的边界根据“二战”结束时的边界状况自然划分，因而佩塔洛沃主权理应归属俄罗斯。与之类似的问题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关于佩兹里地区 (Petseri) 的领土争端。根据 1920 年签订的《塔尔图和约》，该地区划归爱沙尼亚，而随着二战初期爱沙尼亚成为苏联成员国，苏联将该地区划归俄罗斯，1991 年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以《塔尔图和约》为依据，向俄罗斯提出了“官方领土争议诉求”⁷⁸。这些问题和本会场所探讨的纳卡冲突问题有相通之处，问题的肇始都可以追溯到沙皇俄国的扩张，而领土争端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都是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与苏联制定的领土政策之间的冲突，即二者谁的法律效力更高。苏联加盟国之间的这种领土争端，使得国与国之间边界的划定难以落实，也导致许多经济贸易、社会保障类的条约一直无法签署，对于前苏联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失。

第二个方面是独立的前苏联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民族分离的波澜。典型代表是阿布哈兹 (Abkhazia) 问题。阿布哈兹 19 世纪成为俄国保护国，进而被俄国吞并。苏联成立后，阿布哈兹成为格鲁吉亚境内的自治共和国。但是，与格鲁吉亚存在诸多宗教、文化差异。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政局动荡，阿布哈兹地区也出现分离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政权，要求脱离格鲁吉亚。苏联政府及其之后的俄罗斯对此表示支持，以牵制格鲁吉亚。1991 年格鲁吉亚宣布独立，不久之后首任总统就对于阿布哈兹进行了进攻，但被阿布哈兹分离武装打败。而后格鲁吉亚更换领导人，对阿布哈兹展开新一轮攻势，一度攻入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占据主动⁷⁹。但阿布哈兹武装得到了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支持，并且受到西方暗中的武器与经济援助，这使得战局迅速反转，不仅将格鲁吉亚军队赶出阿布哈兹，而且让格鲁吉亚政权面临内部的分裂。格鲁吉亚政府见此局面只得与俄罗斯方面调整外交关系，同意加入独联体，由此才获得了俄罗斯方面的维和部队支持，制止了阿布哈兹武装的进攻。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阿布哈兹问题都成为俄格斗法的棋子。这一事件以及类似的南奥塞梯等事件反映出，原苏联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事件往往伴随着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样的事

78 徐刚：《爱沙尼亚与俄罗斯关系变迁：基于国家建构的初步考察》，《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6 期，第 21 页。

79 梁长坤：《阿布哈兹问题的由来和影响因素》，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09 年 4 月，第 10 页。

件往往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与沙俄及苏联的“一刀切”政策密切相关；其二，俄罗斯在事件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俄方的态度往往是在中央政府和分裂势力之间进行制衡，以维系自身在原苏联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前苏联地区内部的分裂也少不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美国在前苏联地区积极扶植与俄罗斯存在利益冲突或对立的国家，让俄罗斯进一步陷入被孤立、包围的境地。在美国支持下，两个潜在的战略轴心——一是由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在俄南部建立的战略轴心，二是由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等在俄西部建立的“波罗的海 - 黑海轴心”⁸⁰——在冷战后的几年内逐渐形成。这两个战略轴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束缚在俄罗斯家门口的锁链，对俄罗斯起到了极大的钳制作用。

那么，这一时期俄罗斯对于前苏联地区或独联体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如前文曾说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奉行了亲美外交政策，对于自身传统的势力范围相对忽视。但俄罗斯对于中东欧国家（即传统意义的“苏联卫星国”）和前苏联加盟国（独联体）的政策有着微妙的差异。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内，俄罗斯对于中东欧的疏离采取了相对平静接受的态度，但对于独联体地区的政策则发生了迅速的转变。在苏联解体，叶利钦上台的初期，民主派掌握政权，其奉行的“大西洋 - 欧洲主义”占据了独立后俄罗斯外交思想的主流⁸¹。该派认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最优先的应该是尽快与西方成为伙伴、盟友，而对于前苏联的加盟国，尽可能地实行“甩包袱”的政策，将前苏联加盟国视为经济上的负担，文化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异类疆域⁸²。受这种思潮影响，俄罗斯在解体初期与前苏联加盟国关系冷淡。对于独联体，俄罗斯更多地只是将其视作一个确保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平分家”的机构，并未想借助其维持对新兴独立加盟国的控制。不过，当1992年底至1993年初，民主派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对于独联体政策也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发生了转变。

在1993和1995年两次选举中，奉行强烈民族主义的新斯拉夫主义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该派强调俄罗斯要走独立发展道路，重拾大国意识，重新整合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国家与前苏联加盟国。议会是选民选举产生的，故而该派的胜利事实上体现出民众政治心态的变化，即多数民众已经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盲目倾向西方的幻梦中醒来，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意识重新崛起。议会下联政党与民众，上接政府与总统，议会的格局变化也影响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而另一方面，叶利钦本人也逐渐意识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生存与发展的根据地，开始逐渐谋求继承、甚至说是捍卫苏联乃至沙俄的“帝国遗产”。

1993年4月30日叶利钦批准了由外交部拟定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这份文件首次系统阐述了独联体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以及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基本目标。1995年9月14日，叶利钦总统又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文件将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置于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优先地位。除此之外，该文件还指出，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领导地位；并明确提出要增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建立新的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加快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这份文件表明，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方针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俄罗斯开始以独联体地区为基本盘，谋求重新建构政治强国。

80 金新、宋瑞鲁：《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第14-17页。

81 张英姣、孙启军：《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变化之内因》，《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3期，207页。

82 E.B.Rume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fter the Soviet Collaps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9.

沉渣泛起：苏东阵营的民族主义回潮

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当代世界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国际思潮。本节系统梳理了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介绍了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一方面，在模拟联合国危机联动委员会的实践之中，民族主义动员有着被滥用的趋向，许多非会议平台代表选择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在本国内发起民族主义动员。但是，由于对民族主义认识的不足，这种动员很多时候是无效的甚至负面的。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在苏联的解体进程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其研究有利于厘清纳卡冲突乃至苏东剧变的社会根源，更好地理解纳卡问题的生成、发展和解决。

一、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论及近现代的全球政治，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绕不开的重要概念。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迅速在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扩展开来。⁸³时至今日，民族主义的影响是如此普遍、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许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民族主义一词流行开来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情。18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赫德第一次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词，在英文语境中其出现还要晚至19世纪中叶。⁸⁴

民族一词在当代语境下往往是作为英文中“nation”的对译出现的，要理解其含义，就不得不追溯“nation”一词的源头。按照通行的词源学解释，“nation”一词源出拉丁语的“natio”，本义为出生，引申为依血缘聚居的区域共同体⁸⁵其后，在基督教文化的语境之下，“natio”渐渐被赋予了上帝拣选的神圣色彩，渐渐成为了各民族的普遍自称。值得一提的是，直至12世纪，“natio”都只指称特定的民族共同体，而不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有必然联系，彼时欧洲多使用“patria”一词指称国家（该词也是英语中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的词源）。⁸⁶此时，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间的界限并不明晰。文艺复兴前后，各封建领主的注意力从宗教热情中抽离开来而逐渐关注欧洲本土的领土争夺，“有边陲而无国界”⁸⁷的王朝国家逐渐转变现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nation”一词的词义也逐渐被政治化。若仅作为血缘或地缘维系的共同体，民族并不承担政治职能，而只有当它同领土国家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在这一过程中，领土国家赋予了民族以确定的边界和切实的意义，民族赋予了领土国家以高度的组织性和先验的正当性。可以说，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它实际上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市民社会的出现而出现。⁸⁸

至今为止，民族一词并没有世所公认的确切定义，但其所有经典定义都同其词源密切相关。法国历史学家勒南指出：“同甘共苦和共同希望——这些就是造就民族的东西”；⁸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上限的，但是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⁹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给出确切的民族定义，但斯大林提出了一种定义并被列宁所承认：“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

83 高媛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博士论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2013年5月，第20页。

84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6页。

85 张凤阳：《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一项基于西方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30页。

86 同上，第34页。

87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60页。

88 王志立：《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第160页。

89 高媛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第15页。

9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⁹¹ 这一定义也被共同接受为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无论采用何种定义，“民族”乃是一具有共同特征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成为不刊之论。同样地，“民族主义”一词也长期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也没有对其做具体阐述。但总的来讲，民族主义体现为“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归属、忠诚的一种强烈感情和持久意识”。⁹² 而现代的、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奠基于是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哲学。这种民族主义是社群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康德已经将理性和个体自决提到了如此高的地位，那么这种自决何以完成呢？在费希特看来，单独的个体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个体如要实现其价值，就只能通过融入一个共同体。⁹³ 从而，在国家的道德地位上，它声称民族国家对于国际实践具有鲜明的道德意义，正因为共同体赋予了个人以道德价值，故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能存在道德责任和道德判断，个人只有在对社会全体的责任承担和身份认同之中才能实现完全自由和自我实现。在这样的逻辑诠释之中，作为世界主义高峰的康德哲学同社群主义被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统合起来，为国族建构赋予了正当性和必要性。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迅速扩张，作为一种现代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迅速拓展开来，在此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之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这是由于其所展现出的极为惊人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如前文所述，个人只有在民族国家之中才能实现其自我价值，则人权和主权、民族是密不可分的。民族国家的观念通过追求“政治单元和民族单元的重合”，第一次使得主权、人权和民族的观念被融为一炉，赋予了大型想象共同体（即民族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使得国家内部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完善的动员系统。

但是，值得所有代表警醒的是，当代的大众政治是善变的，无论民族主义动员的力量是来自于民众的狂热情绪还是理性的未来预期，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都有可能迅速衰退下去。⁹⁴ 这种磅礴的动员力量一旦失控，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会迅速转变成自下而上的政治裹挟，狂热民族主义下的对外政策选择已经不是任何决策者个人所能掌控的了。对外而言，不加控制的民族主义极易转化为民族沙文主义⁹⁵、民族利己主义⁹⁶，使得国家陷入战略透支、过度扩张的深渊之中；对内而言，民族主义的狂潮可能造成专制统治而加速国家机器同社会的异化，成为阶级压迫的幌子，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对民族主义持相当谨慎的批判态度。马克思曾经批判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他说：“事实说明，马志尼……用他那套民族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军事专制。他在自己想象中建立的国家，对他来说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来说来毫无意义。人民越快摆脱这种人就越好。”⁹⁷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所谓的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性归根到底是民族利己主义。⁹⁸ 民族主义的动员也是不牢靠的，大众的热情极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而随意地起伏。比如，美西战争前的西班牙社会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民众极热衷于捍卫西班牙国家利益，甚至声称不惜为之流尽最后一滴血；但随着战局的推进，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民族主义热情很快消退，这成为了西班牙政府迅速选择同美国媾和的政治背景。⁹⁹

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的动员并不总是成功的。失败的民族主义动员可能引起国内的反对声浪，造成罢工等群体性事件的增长，可能破坏国内的经济基础、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还可能使得社会动员效率下降、军队军纪涣散、战斗意志薄弱。在模拟联合国的危

91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92 程人乾：《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93 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8页。

94 查雯：《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国内制度与大众参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137页。

95 注：沙文主义（Chauvinism）是一种认为本民族优于或高贵于其他民族的非理性情感。沙文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因崇拜拿破仑而狂热地支持法国的扩张政策，沙文主义由此得名。

96 注：民族利己主义也叫国家利己主义，它是拼命追求本民族利益、抛弃国际关系准则的政策取向。

97 马克思：《卡尔·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污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附录》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80页。

98 高媛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第27页。

99 查雯：《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国内制度与大众参与》，第137页。

机联动中，每一个有意进行该项动员的代表都应思考一个问题：怎样的动员是有效且可控的？这样的动员至少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国内良性的社会制度。民族主义动员一大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使得社会成员愿意为共同体的特定目标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而社会个体成员的奉献必然也追求利益回报。一个良性的社会制度能够有效地分配所获得的资源，给予成员的奉献以正向的回馈。如在一战期间，英国的国内制度较为民主可靠，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比较合理；德国则始终奉行高压态势，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退化。最终，英国在军工、经济、社会稳定、动员比率等各方面的表现都远超德国。以钢铁产量为例，1913-1920年间，英国的钢铁产量增加了150万吨，而德国的钢铁产量减少了整整1000万吨。¹⁰⁰

良好的战略预期。如前所述，社会个体成员的奉献也追求利益的回报，他们短期利益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未来更大收益的预期。所以，良好的动员效果要以良好的战略预期为前提，也即决策者向民众许诺的未来回报是合乎实际的和易于实现的。历史上，发动群众以用于军事冒险或政治投机的决策者常常遭受民族主义的反噬，使得国家和其本人都蒙受极大的损失。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岛战争中的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在马岛的军事冒险失败后，阿根廷面临着西方集团的经济制裁，汇率政策难以为继、货币贬值不可避免，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各地抗议行动此起彼伏，加尔铁里和他的军政府最终黯然下台。¹⁰¹

有效的动员机制。这里的动员机制包括国内的法规体系、行政体系、外交体系、战时组织体系、教育体系、大众传媒动员体系等诸多方面。仍以马岛战争为例，马岛战争时的英国完善成熟的法律体系，包含《紧急全权国防法案》《紧急状态权力法》《防务法》《后备军组织法》《预备役动员法》等；有清晰明确

的战时职能划分，对于战时动员人员的福利待遇保障比较完善。在战争中，英国的战争动员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直接体现在民船的动员效果上：在战争期间，皇家海军特混舰队的保障船只占船只总数的60%，其中2/3来自民船；民船总载重能力达66万吨，共运送了96架飞机、42万余吨油料和10余万吨其他物资。¹⁰²作为对比，阿方在战争初期仅征用了6艘船，载重能力仅4万吨；当战争初期部分民船被击沉后，阿根廷再未发动有效的民船支援，致使其海上运输线完全被切断。¹⁰³

危机联动之中，争端当事方代表常选择民族主义作为战争动员工具，而毫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不考虑军事冒险行为的极大风险。决策者不能因战前的民族主义狂潮就决定发动战争，因为这样的社会意识是极为易变的。¹⁰⁴一旦这种民族主义动员失败或失控，政府或将顷刻崩塌，民族国家的命运也或将遽然改变。所以，每一位代表在决定发起动员和进行战争准备之前都应仔细考虑战争动员的效能和未来发展，慎之又慎，以防出现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100 查雯：《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国内制度与大众参与》，第147页。

101 谭杨：《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0）》，博士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4年5月，第76页。

102 徐东波：《马岛战争中英国战争动员的维度与启示》，《深圳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111页。

103 贾恒阔：《马岛战争中英阿双方战争动员的经验教训》，《军事历史》，1994年第1期，第12页。

104 查雯：《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国内制度与大众参与》，第153页。

二、苏联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及其后果

苏联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苏联近七十年的历史之中，民族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解决之困难、危害之突出，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国家建构。如前所述，在西方的传统理论之中，理想的民族国家组织形式应当实现“政治单元和民族单元的重合”，即一个民族拥有一个国家。苏联的国家形态是开创性的，它以意识形态的共同体超越了民族的原生共同体，构建起了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兴国家。这就使得苏联的国家建构天生就要受到境内各民族独立意识和分离主义的挑战。因此，苏联在建立初期就选择了联邦制作为其过渡形式，甚至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双重主权”制，这也为其后来民族主义的回潮埋下了隐患。

历史因素。在苏联成立之前，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沙皇俄国国家疆域的确是帝国扩张和民族征服的产物，没有经历一个民族交往融合的长期过程。在沙俄时期，沙皇对民族施以残暴的压迫、疯狂的迫害和无情的掠夺，使得沙俄被列宁形象地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¹⁰⁵，这使得沙俄时期的民族矛盾本已十分尖锐。这样的民族矛盾也延续到了苏联时期。十月革命之前，族群差异实际上并不凸显，族际通婚非常普遍；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政府刻意划分甚至“创造”民族，人为地制造了民族认同和民族隔阂。¹⁰⁶苏联时期，随着加盟共和国的增多，民族问题也不断凸显；如波罗的海三国是被苏联强行兼并的，在兼并过程中，三国据说有几十万民族主义者受到处决。¹⁰⁷

民族现状。作为一个疆域极为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苏联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民族工作十分困难。198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苏联共有129个以上的民族，其中俄罗斯族占人口总数的50.8%，乌克兰族占16.2%，乌兹别克族占4.8%。¹⁰⁸而这些少数民族很多都是其所属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之相对应的是各民族人口所占空间的不均：408万人口的摩尔达维亚民族占据领土面积为3.3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1.1人；而俄罗斯民族占据了全苏领土的76.2%，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8.4人。¹⁰⁹除此之外，苏联民族问题还表现出各民族语言差异大、宗教信仰差异大等文化上的特点。各民族的经济状况也极不平衡，俄罗斯的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占全苏的2/3与1/2以上，¹¹⁰这为贯穿整个苏联历史始终的俄罗斯沙文主义埋下了隐患。

鉴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工作十分困难的现状，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科学认识了民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他强调一切民族政策最终都应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坚持任何民族主义都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¹¹¹他极力反对崩得分子¹¹²提出的联邦制建党学说，认为这种按照民族特征建党的说法是“民族主义可悲地渗入崩得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结果”，¹¹³维护了执政党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他提出了联邦制的建国构想，认为通过联邦制国家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单一制国家过渡是可行的和必要的。他坚决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民族自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之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民族平等的主张，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4页。转引自姜冬阳：《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研究》，第9页。

106 马风书：《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基本制度架构》，《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第31页。

107 彭萍萍：《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第93页。

108 姜冬阳：《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研究》，硕士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7年3月，第8页。

109 王立双：《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硕士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年4月，第7页。

110 同上，第9页。

111 马风书：《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基本制度架构》，第28页。

112 注：1897年，在俄国西部的州和区成立了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崩得是俄文译文，意为联盟。

113 列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3页。

有任何特权！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丝毫的不公平！——这就是工人阶级民主的原则。”¹¹⁴他认为大民族应以对自己的不平等来弥补小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特定时期给予小民族以适当的“特权”，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¹¹⁵这表现出他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特别警惕。他还指出，解决民族主义的根本之策是实现各民族在自愿基础上的融合，不同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在其中据有重要地位。实践证明，列宁的民族政策充满了预见性与进步性，对于整个苏联的民族政策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建立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配套措施，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苏联的民族矛盾。这些措施包括：

（一）在政治体制上，保证弱小民族的平等权利。苏联建立了以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的国家行政区划，强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在最高苏维埃，苏联设立了两个完全平等的院，为联盟院与民族院，后者由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选举而来，完全反映民族要求。

（二）在国家干部培养上，注重培养一大批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干部，作为实现民族团结的坚实力量。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前夕，苏联在全各国各地开设了数十所培养民族干部的共产主义大学及其分校，其他各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大量招收民族学生。¹¹⁶非俄罗斯民族的干部占比得到提高，历代苏共中央政治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非俄罗斯族成员。¹¹⁷

（三）在经济上，计划经济政策向民族地方倾斜。“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各少数民族地方的补贴预算增长了2.6倍，中央政府负担了乌兹别克工业建设投资的57.7%和塔吉克建设投资的78%。¹¹⁸后续的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的工业投资比重继续增加。同时，一大批技术人员、专家、学者被派往各民族地方，仅1933-1935年间派往乌兹别克的专家就有9652人。至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向中亚地区输送了70万建设人才。¹¹⁹

（四）在文化上，提倡民族文化平等，重视教育事业发展。1922年，建立了由人民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会等机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北方民族的语言问题。1932年，出版了相当多的一批民族语言书籍，包括楚科奇语、鄂温克语等。各民族共和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27-1940年间，俄罗斯联邦大学生增加5倍，而乌克兰增加7倍、乌兹别克增加38倍、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增加30倍。¹²⁰

在斯大林执政前期，准确地说是二战之前，苏联比较好地贯彻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妥善地处理了民族问题。但是，斯大林本身在民族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比较粗暴，这集中体现在20年代初期他对外高加索三国的处理上。他对格鲁吉亚等地一直持反民族分离主义的坚决立场，¹²¹1922年，他曾提出一个“自治化”方案，即将外高加索三国合并为高加索联邦，三国以自治共和国而非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加入苏联，这招致了以姆季瓦尼等为代表的格鲁吉亚地方领导集团的强烈反对，酿成著名的“格鲁吉亚事件”，这一政策也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¹²²随着苏联国防压力和经济建设压力的不断增大，他的这一政策缺陷日益凸显出来。政治上，他从坚持联邦制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制。他不顾少数民族地方的特殊情况，执意推行

114 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卷，第261页。

115 马风书：《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基本制度架构》，第29页。

116 同上，第30页。

117 张祥云：《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118 马风书，刘玉：《斯大林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再思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4期，第87页。

119 赵龙庚：《苏联民族政策：经验、教训和看法》，《苏联问题参考资料》，1988年第5期。转引自马风书，刘玉：《斯大林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再思考》，第87页。

120 张建华：《民族文化与族际文化：冲突抑或协调——对苏联民族文化政策的历史考察》，《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4期，第63页。

121 卢俊达：《自主与他主：格鲁吉亚事件反思与启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5期，第50页。

122 彭萍萍：《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第93页。

集体农庄，过火地推行反宗教政策；他以民族主义为阶级敌人，对民族地方的领导人发动清洗，仅在1937-1938的两年内，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全部被处死，哈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全部被杀；¹²³他以行政命令强行推行俄语，实行全国范围的俄罗斯化。理论上，他从原先的集中力量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向反对民族分离主义转变。30年代初期，他强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居于优先地位；30年代中期，他开始强调二者并重；此后，他则更加强调反对民族分离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张目。¹²⁴最后，在战争危机日益迫近的背景下，斯大林还大搞民族迁移，将他认为“不可靠”的民族迁移至非关键地区，制造了许多起悲剧，造成了民族情绪的抬头。¹²⁵在民族迁徙政策的后期，斯大林本人和苏联政府将少数民族中的个别败类同整个民族等量齐观，出现了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¹²⁶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历代领导人对民族主义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对于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严重不足，甚至认为苏联的民族矛盾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赫鲁晓夫时期，他采用各种手段美化沙皇侵略政策的本质，大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962年，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苏联领导集团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说明“各民族人民归并于俄国的进步意义”。¹²⁷1963年，赫鲁晓夫竟然直言，若俄罗斯族灭亡，其他所有斯拉夫人都将灭亡。¹²⁸虽然赫鲁晓夫强调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权，但其改革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其经济政策依然是高度集中的。赫鲁晓夫打着适合各加盟共和国特点的旗号，迫使加盟共和国发展单一产业经济，增强各加盟共和国对苏联经济的依附性。为此，当时的苏联领导集体多次随意变革共和国边界，如1956年苏联政府就将哈萨克一万平方公里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地划归乌兹别克。¹²⁹着一系列政策都激起了苏联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相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于民族问题的评判更加随意、估计更加不足，表现出了严重的“左”的倾向。在1967年，勃列日涅夫公然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¹³⁰勃列日涅夫针对赫鲁晓夫时期向加盟共和国放权导致政治涣散的问题，强调削弱加盟共和国自主权，加强中央集权。1966年和1970年，苏联重新建立了中央内务部和司法部。¹³¹这一时期，苏联还大规模地摧毁少数民族文化，强制性推广俄语。1966年，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语学校占比已从1932年的86%降低到了4.1%左右。¹³²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其所谓的“民主化”政策，大搞“新思维”，一批民族主义者和投机分子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行民族分离主义之实。他上台后对民族问题麻痹大意，甚至陶醉在迷梦之中；在80年代中后期苏联民族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的背景之下，戈氏还声称：“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¹³³他所推行的舆论自由政策使得社会舆论界进入了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民众无所适从，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完全崩塌，意识形态领域陷入混乱。在这一状况之下，酝酿已久的民族主义思潮骤然喷发，决堤而出，迅速地填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随着民族主义的回潮，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谋求独立，民族分离主义大行其道，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迅速行动，工人罢工等活动严重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秩序。¹³⁴

123 崔剑：《论民族问题和苏联解体》，《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68页。

124 马风书，刘玉：《斯大林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再思考》，第88页。

125 同上，第89页。

126 潘广辉：《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世界民族》2006年第1期，第1页。

127 阮西湖：《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年，第116页。

128 姜冬阳：《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研究》，第29页。

129 同上，第30页。

130 崔剑：《论民族问题和苏联解体》，第167页。

131 姜冬阳：《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研究》，第32页。

132 同上，第33页。

133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和苏联解体》，《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第85页。

134 程人乾：《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第231页。

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形势，戈尔巴乔夫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向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妥协，甚至为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推波助澜。1989年，当政治局会议讨论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竟然公然声称：“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¹³⁵ 当各共和国要求独立时，他非但没有采取霹雳手段，反而奢望通过向加盟共和国让渡权力拉住对方，实际上使得各国的独立分裂运动更加顺利。在纳卡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坚持运用“法律和政治的手段”解决问题，而当这些手段全部失败后，戈尔巴乔夫就再没有后续措施了。¹³⁶ 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葬送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一次机会，苏联终于在民族主义的思潮盲动之中轰然解体了。

可见，纳卡冲突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趋向并不是孤立的，其背景是戈尔巴乔夫错误民族政策下以苏东为中心的20世纪第三波民族主义思潮。¹³⁷ 对其考察应当结合整个苏联末期的社会背景，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宏观层面去做总体把握。

135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和苏联解体》，第87页。

136 同上，第88页。

137 程人乾：《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第134页。

众说纷纭：相关国际法背景综述

国际法是主要在国家之间形成并主要靠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力量来加以实施的，调整以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¹³⁸ 其主要渊源包括：条约、习惯与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与国内法、国际关系既有密切关系，也有根本不同。它的绝大部分规则作为法律得到各国严格遵守，但个别规则却受到国际关系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遭到严重践踏。本章将分两个方面在法律层面上分析纳卡问题：即纳卡地区在法律上的归属问题，以及纳卡战争期间亚阿双方理论上应当遵守的法律规范。

一、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领土地位问题

(一) 古典国际法下的法律地位

20 世纪初的世界各地都充斥着大国之间、各民族之间激烈的领土争端，其早期的几十年历史对现代的国家边界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对于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这种长期民族混杂的地区而言，人口定居历史并不能从法律的角度为领土要求提供坚实的基础，但根据古典国际法主权治理原则 (the Right to Sovereign Governance)，各国之间的领土兼并与条约关系是我们今天讨论纳卡地区法律地位的基础。

从古典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某一地区的归属与生活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族群无关，而是任凭统治者的强权政治摆布，他们通过割让、交换或继承合法地获得土地，或者随意分割土地。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被认为是合法的，通过战争征服或兼并也是获取领土的合法手段。1928 年《非战公约》一定程度上禁止侵略战争，但尚未形成习惯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止侵略战争才普遍地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因此，19 世纪沙俄对外高加索地区的征服和 20 世纪前 20 年内外高加索地区诸多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及其造成的后果仍适用于古典国际法的原则，不能依照现代国际法的和平原则断言其非法。

下面对 1918 至 1920 年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的争夺所涉及的法律事实作简要梳理。1918 年 5 月，外高加索联邦解体，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均主张纳卡地区属于本国领土，并开始展开武力争夺。6 月，包括两国在内的外高加索三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巴统条约》第三条规定，当两国对边界问题达成一致时，关于这一边界的规定将纳入该条约。奥斯曼帝国政府曾邀请双方到伊斯坦布尔讨论边界问题，但会谈最终并未召开。¹³⁹ 截至条约签署时，奥斯曼军队已实际控制纳卡地区。7 月，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组建议会宣布独立，奥斯曼军队随即进行镇压。11 月，奥斯曼帝国因一战战败撤出外高加索，将纳卡地区交由阿塞拜疆管辖。亚美尼亚随即展开进攻。1919 年 1 月，亚美尼亚军队占领卡拉巴赫首府舒沙。不久，英国军队抵达外高加索，要求双方将纳卡问题提交巴黎和会，迫使亚美尼亚撤出纳卡地区，并指派了一名阿塞拜疆人担任当地总督。阿塞拜疆随即对纳卡地区实际控制。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将关于纳卡地区的领土争端交由巴黎和会最终决定，但巴黎和会没有做出任何相关裁决。1919 年 8 月，英军撤离阿塞拜疆，此后亚美尼亚试图用武力控制纳卡地区未遂。1920 年初，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但仅夺取个别城镇，引发阿塞拜疆严厉镇压。有证据表明，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在实际控制纳卡地区期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4 月，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保持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后双方有零星武装冲突。8 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在最终达成解决方案前，承认苏维埃政权暂时控制卡拉巴赫地区。11 月 29 日，

138 白桂梅：《国际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 页。

139 Arsène Saparov, "Why Autonomy? The Making of 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Region 1918-1925",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4, No. 2, p.287.

苏俄红军第 11 军进驻亚美尼亚。12 月 2 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正式向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移交权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18 年宣布成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民主和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是否已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仍然存疑。虽然它们已经开始实施主权国家的行为，如建立外交关系、签订条约等，但国际社会并没有完全认可其地位。1920 年 12 月，国联最终拒绝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加入申请，理由是参照《国际联盟盟约》第一条，它们缺乏明确的、被承认的边界与宪法以及稳定的政府。¹⁴⁰

(二) 苏联法律之下的法律地位

苏联时期的纳卡地区的法律地位讨论需要分为两个部分讨论：苏联初期对于纳卡地区归属的决定，以及末期纳卡地区的独立自决行为是否有效。

按照亚美尼亚方的陈述，1920 年 11 月 30 日，阿塞拜疆的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项宣言承认纳戈尔尼 - 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是苏维埃亚美尼亚的一部分。虽然后日更改措辞，在 12 月 2 日的《关于苏维埃在亚美尼亚建立政权的宣言》(Declaration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iet Power in Armenia) 只承认纳卡地区享有自决权，但鉴于当时该地区的占主导地位亚美尼亚人民已经表示出对加入亚美尼亚国家的愿望，该宣言等同于承认纳卡地区归属于亚美尼亚。¹⁴¹ 1921 年 6 月 12 日，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民会议基于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两国之间的协定，宣布纳卡地区是亚美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6 月 19 日亚美尼亚通过法令宣布对纳卡地区是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这些声明多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反方观点认为，无论是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纳里马诺夫、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自身或者斯大林都未完全拥有国际法意义上的能够割让、转移领土的权力，只有莫斯科中央政府作为新的主权者或者高加索局作为获得中央全部管理授权的权力机构才享有这个权力。¹⁴² 因此上述宣言并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应当被视作莫斯科的政治宣传，其目的是利用民族主义促进亚美尼亚国内的共产党运动，帮助其建立苏维埃政权。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是高加索局做出的关于纳卡地区地位的决定。

高加索局 1921 年 7 月 4 日至 5 日在第比利斯举行了全体会议讨论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7 月 4 日的会议决定：“认为纳戈尔尼 - 卡拉巴赫地区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在纳戈尔尼 - 卡拉巴赫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同时“由于卡拉巴赫问题引发了严重分歧，高加索局认为有必要将该问题移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最后决定”¹⁴³。7 月 5 日的会议决定则推翻了前一天的决议，对阿塞拜疆与纳卡地区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的考量，以及维护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决定将纳卡地区保留一定自治地位留在阿塞拜疆境内。

亚美尼亚方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亚美尼亚认为，高加索局 7 月 5 日的决定既未通过讨论也未经过投票，不符合程序规定，因而无效。即使按照阿塞拜疆方面提供的、经过修正的会议记录中所载的四票支持三票弃权的情况，在九人的全体会议中决议也不能生效。只有 7 月 4 日的决定是关于高加索局所通过的关于纳卡地区的最后一份合法合规的文件。另一方面，无论是否存在法律违规行为，高加索局决定的合法性也应当被严重质疑。¹⁴⁴ 因为国际法历史

140 Heiko Krüger,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Springer Heidelberg, 2010, p.14.

141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he 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eoples under Colonial or Alien Domination or Foreign Occupation", E/CN.4/2005/G/23, 2005, p.4.

142 Heiko Krüger,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p.15.

143 *Ibid*, p.16.

144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he 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eoples under Colonial or Alien Domination or Foreign Occupation", p.4.

上从未有过并无法律权力或管辖权的第三国政党，决定他国领土归属一事。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无法合法地获取纳卡地区。

无论如何，苏联领导层的后续行为最终确认了这一决定，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最终于 1923 成为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自治州。但寻求与亚美尼亚统一的地下运动在卡拉巴赫地区从未消失。每当苏联出现政治解冻或重大转变时，例如在 1945 年、1965 年和 1977 年，亚美尼亚民众就会向莫斯科发出信件和请愿书，要求纳戈尔尼 - 卡拉巴赫成为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强化的民族主义思潮，纳卡地区的冲突再度激化。1988 年纳戈尔尼 - 卡拉巴赫自治州地方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将卡拉巴赫从阿塞拜疆转移到亚美尼亚。但该决议遭到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的否决。苏联最高苏维埃援引 1977 年《苏联宪法》第 78 条（禁止未经联邦共和国同意改变领土），决定将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为了稳定局势，莫斯科当局在纳卡地区成立了直接受中央管辖的特殊当局管理当地事务，直到 1989 年底将其归还于阿塞拜疆的治理之下。但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不服该决定，旋即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统一。

1991 年 8 月阿塞拜疆宣布独立。9 月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人民代表大会（Councils of People's Deputies of the 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根据苏联的《苏联分离法》（Law on Secession of the USSR）通过了《纳戈尔尼 - 卡拉巴赫共和国独立宣言》。11 月 23 日，已经宣布独立的阿塞拜疆政府决定撤销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自治州地位。28 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宣布该撤销该决定以及 1989 年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统一决定。12 月 10 日纳卡地区在国际观察员和媒体代表的陪同下举行了自己的独立全民公投。在当地阿塞拜疆人抵制公投的情况下，82% 的当地登记选民参加投票，99% 的参与者选择支持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独立。¹⁴⁵

有待审查的问题是，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作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治州是否有权根据苏联法律独立，如果存在这种权利，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是否在苏联法律仍对阿塞拜疆生效之时——也即阿塞拜疆独立之前——有效行使了这一权利。

1977 年《苏联宪法》在两处规定了加盟共和国领土的分离或变更问题。第 72 条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¹⁴⁶ 但此处的权利主体为加盟共和国而非自治州，即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此条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自治州则无法行使这一权利。第 78 条规定了加盟共和国领土地位改变的其他情况：加盟共和国领土未经其同意不得变更；加盟共和国间的疆界，需经相关共和国彼此协商并经中央批准始可予以变更。此条第 1 款说明，可以设想对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进行更改的情形，但首先应当征得加盟共和国的同意，否则不得变更。在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于 1988 年通过的决议遭到阿塞拜疆当局的强烈反对，情形与宪法规定的禁止性条例相符，同时也违反了《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阿塞拜疆自治法》，因而不发生法律效力。虽然苏联当局对此事的后续处理方式让卡拉巴赫一度在行政上脱离了阿塞拜疆，但在法律上，参照宪法第 87 条，纳卡地区仍是属于阿塞拜疆的自治州。1989 年，亚美尼亚所通过的统一法令在内容上虽然与纳卡自治州你情我愿，但在法律上一未与阿塞拜疆协商、二未征得苏联中央同意，显然也违反宪法规定，不生效力。

除宪法之外，还有 1990 年出台规制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程序的《苏联分离法》规定了相关条款。第 3 条规定：“在其领土构成中包括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自治州的加盟共和国中，

¹⁴⁵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The 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eoples under Colonial or Alien Domination or Foreign Occupation", p.8.

¹⁴⁶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http://www.departments.bucknell.edu/russian/const/1977toc.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7 日。下文中的苏联宪法同样参考此处。

每个自治组织应反复进行公民投票。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团体的人民保有权决定是留在苏联还是留在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有权提出有关他们的国家或州的法律地位的问题。”¹⁴⁷ 根据该款规定亚美尼亚认为当阿塞拜疆推出苏联时，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也相应地也获得了脱离阿塞拜疆的权利。而阿塞拜疆对此则持反对态度。

反对的观点认为，《苏联分离法》第3条明显违宪。首先，该条违反了宪法第72条所保证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实际上设立了严重的不利益情形以阻碍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虽然1989年之前实施这一权利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法律上应当是享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也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自由权利。其次，该条也与宪法第78条中未经加盟共和国许可不得变更其领土的条款相冲突，实际上制造了一种可以绕开加盟共和国许可而变更其领土的法律情形。另外，在解释该法律的过程之中也应当结合法律的制定目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制定一部如此繁杂的关于退出苏联的程序法，其真正的目的阻碍共和国退出，避免苏联解体，而非为了提供一种脱离苏联的途径。¹⁴⁸

但需要注意的是，违宪的法律并不自然而然地等同于失效的法律，虽然在理论上应当是这样。但在实践中，当时的苏联设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以纠正违反宪法的法律或决议，撤销违反宪法的行为，而《苏联分离法》并没有被宪法监督委员会裁定为违宪法律。

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按照《苏联分离法》脱离苏联并不是行使自由退出苏联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当各国未遵守分离法程序纷纷宣布独立时，苏联的最高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终还是接受了他们的独立宣言。¹⁴⁹ 在没有实施苏联分离法公投程序的情况下，自然也无法触发各自治团体的公投程序。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所举行的公投因而无法产生分离法所规定的法律效力。即便分离法作为唯一合法退出苏联的方式，阿塞拜疆对该法律的违反也不会导致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享有其规定的自决权，而只能导致阿塞拜疆退出苏联的行为在法律上无效。而等到苏联宣布解体之后，纳卡地区仍是作为主权国家的阿塞拜疆的组成部分。退一步说，纳卡地区举行的公投的程序合法性也存在怀疑，例如按照分离法第5条规定，公投需要莫斯科的观察员出席，但当时的公投并非按照分离法的程序启动，自然也不存在莫斯科的观察员。

1990年8月23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亚美尼亚独立宣言》（Armen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在《独立宣言》中亚美尼亚一方面表明自己继承了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统（正文第一条第1款：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同时也暗示自己也是1918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序言第7条：发展1918年5月28日成立的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民主传统）。¹⁵⁰ 在宣言的序言部分还表示其建立在1989年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和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方苏维埃关于“关于双方重新统一的联合决定”之上，即意在表明纳卡地区是亚美尼亚的合法领土。

阿塞拜疆方面的情况则与亚美尼亚不同。1991年10月18日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独立》的宪法性条款（The Constitutional Act on the State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第二条明确指出：“阿塞拜疆共和国是1928年5月28日至1920年4月28日存在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继承人。”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视为“（第一条）苏俄第11军占领阿塞拜疆的领土，推翻作为国际法主

147 "Law on Secession from the USSR", <http://soviethistory.msu.edu/1991-2/shevarnadze-resigns/shevarnadze-resigns-texts/law-on-secession-from-the-ussr/>,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6日。

148 Heiko Krüger,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p.31-33.

149 *Ibid*, p.37.

150 "Armeni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parliament.am/legislation.php?sel=show&ID=2602&lang=en>,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7日。

体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是俄罗斯对独立的阿塞拜疆的占领”，是苏联对“阿塞拜疆共和国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因而第三条进一步规定：“1922年12月30日关于成立苏联的协议中与阿塞拜疆相关的部分自签署时无效。在曾经构成苏联的主权国家之间建立多边关系时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合同和协议来解决。”第四条规定：“1978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与本宪法性条款不相抵触，仍然有效。所有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恢复国家独立之前有效的、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相抵触的、不以改变国家结构为目的法令在阿塞拜疆共和国仍然有效。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相关法律通过之前，苏联法律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继续有效；这些法律的名单由阿塞拜疆共和国议会确定。”¹⁵¹在此情况下，苏联时期对于纳卡地区领土地位的决定是否有效对当今阿塞拜疆政府进一步遭到了亚美尼亚方面的质疑。

（三）现代国际法下的法律地位

占有地保护原则（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 juris*）是现代国际法解决领土问题的核心支柱之一。其内容为：在国家地位改变的情况下，以前存在的国界继续生效；或者在国家转型或分裂的情况下，以前的内部行政边界升级成为国家间的边界。占有地保护原则最初是确立于去殖民化的背景之下，到20世纪末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不仅被非洲联盟的成立法案采用，而且在建立独联体的协定以及欧洲共同体关于承认东欧新国家的指令中也被采纳。其为后续讨论的领土完整原则（Principle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与民族自决权（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提供了讨论的基础框架。因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否在阿塞拜疆的疆界之内，即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否合法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具体法律细节已经在上一部分展开，在此不再赘述。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占有地保护原则并不基于某一法律事件，而是实际占有效力：纳卡地区作为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自治州近70年，已经稳定成为阿塞拜疆领土的一部分，进而意味着苏联时期的边界仍然有效，纳卡地区仍然属于阿塞拜疆。该原则的适用性在1991年独联体成立以及美阿双方加入的情况下进一步得到确立。

领土完整原则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存在，其目的不是为任何特定国家奠定基础，而是为了保护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无论某一领土在宗教或者种族上的构成如何变化，其主权归属都应保持一定稳定性，依照合法程序进行变更。联大一致通过的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其第1项原则的第10段宣布：“国家领土不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所造成之军事占领之对象。国家领土不得成为他国以使用威胁或武力而取得之对象。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¹⁵²根据领土完整原则，通过武力所施加的边界变动是侵略行为。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侵略定义》第1条将侵略的一般定义界定为：“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使用武力。”¹⁵³主流观点认为纳卡地区属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受到领土完整原则的保护。但领土完整原则并非没有例外，主要包括：联合国组织或授权的合法武力行动；领土变更不因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依照民族自决原则，以公投或其他方式表达愿望；非殖民化运动中行使民族自决权独立；国家间领土争端关涉不确定的边界划分。

民族自决原则分为两个方面：内部自决权与外部自决权。内部自决权指人民持续性地享有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的权利；外部自决权指人民可自由决定其外部政治地位，包括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或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的权利。纳卡地区宣布独立时所引用

151 “Azərbaycan Respublikasının dövlət müstəqilliyi haqqında Konstitusiyə Aktı (18 oktyabr 1991)”, https://republic.preslib.az/az_d2.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7日。

152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第2625号决议，1970年10月24日，A/RES/2625(XXV)。

153 《侵略定义》，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第3314号决议，1974年12月14日，A/RES/3314(XXIX)。

的权利属于后者，因而只对后者进行展开。显而易见，纳卡地区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与阿塞拜疆所主张的领土完整原则相互冲突。鉴于法律以维持秩序稳定为基本价值取向，国际法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也依旧遵循主权至上的原则，国际法解释一般对于可能引发分离主义运动的外部自决权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将领土完整原则的效力置于外部自决权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自决权就此成为空壳。传统解释倾向于效仿内部自决权，将外部自决权赋予一国的全体国民，这样意味着如果某国的某一地区向脱离该国，需要举行的全国公投而非该地区的公投。虽然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根据国际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但主流观点依旧反对他们作为一个单独群体拥有外部自决权。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某一群体才可以单独行使外部自决：第一，人民受到了殖民统治；第二，人民受到了外国军事占领或非法吞并；第三，作为种族团体（racial group）而非族群团体（ethnic group）的人民被拒绝平等参政。另一种饱受争议的理论，救济性分离（remedial secession）认为，当某一群体的权利受到极其严重且广泛的侵害时——国家对他们犯下国际法规定的罪行、存在系统性或暴力性歧视以及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外部自决权将成为反抗压迫的最后手段。还有一种行使外部自决权的方式是事实上的分裂，当分裂出去的地区实际上满足了建国的要求：明确的领土、定居人口以及有效的政府，可能会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承认。但这种独立方式往往伴随着暴力与军事冲突，有违联合国的和平原则，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此类国家的独立地位。

二、国际冲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当世界上某一地区发生冲突，想对其适用国际法首先第一步需要分辨其性质：究竟是两国之间或更多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性武装冲突，还是发生在政府军和非政府武装团体之间，或仅在非政府武装团体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再根据当事国的法律性质所加入的条约，适用不同的法律方案。但截止至 1992 年末，除双方在加入联合国时皆声明遵守的宪章外，亚美尼亚尚未继承或签订任何关于国际冲突或人权保障方面的条约，阿塞拜疆则仅签订了有关人权保障的三份条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不包括关于儿童卷入国际冲突的议定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因此在 92 年发生的冲突中，对双方主要只能适用一些国际法原则和习惯法。

（一）国际法原则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Prohibition on use of force）是各国维护和平的一般义务之体现。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 4 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主流观点认为其具体包括：禁止发动或宣传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战争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武装力量；禁止使用武力非法占领或取得他国领土；禁止间接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包括组织、支持（为其提供武装或训练）和派遣非正规战斗部队或包括雇佣军在内的武装团伙入侵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在国际法理论中，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进行武装干涉被认为是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但在实践中此理论的援引往往容易引发很大的争议。

禁止干预他国事务原则（Prohibition on intervention）以习惯法为基础和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干涉指一个国家干预另一个国家的内部或外部事务。国际法禁止两类干涉：干涉对象属于专属国家责任且并非根据国际法分担或转让，或者干涉是在受到威胁或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发生的。暴力干涉他国事务是最严重的一类表现形式：不仅包括一国军队在其他国家内部冲突中的军事介入和对他国领土的军事占领，还包括对他国叛军和武装组织提供军事、财政和后勤支持，或有计划地煽动类似内战的行为等。然而，禁止干预远远超出了禁止使用武力，尽管它以习惯法为基础，意味着它的边界没有禁止使用武力的边界那么明确。然而，国际法院、《友好关系宣言》和有关国际法的文献使禁止干预的规定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它被认为适用于对叛军的财政支助、武器供应、训练援助和后勤支助。

（二）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法

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规则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是对战斗人员的法律地位的定义。战斗人员在战争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暴力行为，在不违反战争法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得因此受到审判。并且交战国应当至少参照《日内瓦第三公约》为战俘提供最低待遇，不得故意杀害、虐待战俘或对其施加不人道待遇，对其身体或健康造成巨大痛苦或严重损害等。战俘包括“落入地方手中”的武装部队成员、民兵或志愿军成员。而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交战双方人员，比如叛军，则不适用上述两点习惯法规定。此外，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占领区的平民应当参照《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详细规定得到保护。

（三）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法

禁止攻击平民。联合国大会于 1969 年 12 月 19 日表决通过的第 2444 号决议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武装冲突，呼吁各国政府遵守以下原则：（a）冲突各方采取方法伤害敌人的权利并非没有限制；（b）对于平民以其为平民而施以攻击之行为应予禁止；（c）必须始可将参与敌对行为之人与平民两者区分，俾使后者尽量免受伤害。¹⁵⁴ 一般而言，平民指不属于冲突

154 《对武装冲突中的人权之尊重》，第二十三届联合国大会第 2444 号决议，1968 年 12 月 19 日，A/RES/2444(XXIII)。

任意一方有组织的武装团体的任何人。平民人口包括所有不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人。敌对行动除直接交战外还包括例如破坏通讯、交通设施、向战斗单位直接提供弹药、释放战俘等，但只向武装部队提供间接支持的行为并不作数，如生产分发军事物资等。因为平民无法对敌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也不应当成为故意针对性攻击目标。

对在押人员的非歧视原则。要求冲突各方不加歧视地给予所有“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以人道待遇。这些人是落入敌手的没有积极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员，包括放下武器的人或者因伤、病、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不论其来自政府武装部队还是其他武装团体

区分原则要求武装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都要将战斗人员和军事目标与平民和民用物体区分开来，并且只能袭击合法攻击目标。就人员而言，敌军战斗员是指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成员（医务人员和随军牧师除外）。非武装部队成员就是平民，因此他们不能成为攻击目标。但这也有例外，当平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他们就成为合法攻击目标，但是这只适用于他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期间。就物体而言，军事目标要从两方面来界定：就其性质、位置、用途和使用而言，要袭击的物体必须有效促进敌方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其予以部分或全部摧毁、占领或中立化必然会带来明确的军事利益。所有不符合军事目标定义的物体都是民用物体，不得对其进行攻击。住宅、学校、村庄、教堂等专门用于民用目的的建筑推定为民用目标。

即使是对合法军事目标的攻击也受到相称性原则的限制。这一原则要求战斗人员选择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平民造成损害的攻击手段。特别是，当预期的平民伤亡超过军事目标对攻击者的重要性时，攻击者应避免发动攻击。例如，攻击整个城镇或村庄以摧毁一些可以单独摧毁、明显独立的军事目标。

III

会议平台介绍

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一) 基本介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下属的六个机关之一，占有首要的政治地位。¹⁵⁵也是唯一具有采取包括实施经济制裁、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措施以防止或制止侵略和采取军事行动的联合国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要求，联合国有四项宗旨，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合作解决国际问题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构成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而联合国其他机构只具有向其会员国建议的权利，安全理事会才有权做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必须执行的决定。《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可在和平受到威胁时随时举行会议。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29 条之规定，安理会具有创建附属机构之权利来帮助其维持正常运转。¹⁵⁶附属机构包括各制裁委员会和工作组、以及各法庭或部队人数上千人的维持和平特派团。

同时，安理会成员的区域性也是被有所考虑的。每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成员都会根据区域集团进行划分。这种代表性制度实际上在国联时代就已经存在。联合国建立后，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区域集团的划分方式为：拉丁美洲 2 席，中近东地区 1 席，英联邦国家 1 席，西欧国家 1 席，东欧国家 1 席。安理会理事国席位扩大后，划分方式变为：非洲国家 3 席，亚洲国家 2 席，东欧国家 1 席，拉丁美洲国家 2 席，西欧及其他国家 2 席。¹⁵⁷安理会席位分配，以及其后所代表的地区代表性以及该地区和派系的声音能否在安理会有所体现一直是安理会改革的一大重要议题，而安理会较少的理事国数量也直接导致了每一个安理会之上的国家，尤其是非常任理事国所代表的往往都不仅是自身，而更多需要考虑自身的区域集团以及其他与自己利益相关联的国家的声音。

在投票制度方面，有关对安理会的表决程序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存在。这些呼声包括要求限制常任理事国手中否决权的使用；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提高安理会的表决效率等等。安理会的投票制度的确导致了安理会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作为，从而有时会在表面上辜负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也正是安理会谨慎的一种体现。这一投票制度直接导致了安理会所有通过的文件、决定以及其中的用词都经过了诸多辩论与考量，而任何可能引起大国之间，或对于世界局势有消极影响的决议都无法通过；就如同一票否决权避免了大国之间因一份安理会决议而直接兵戎相见或将安理会决议置之不理的情况一样，超过一般多数的同意票数规定也使其他世界国家的声音得以被关注。

在投票方面，另一点需要我们在投票制度方面着重关注的是双重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27 条第 3 款和 1945 年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就安理会投票程序的声明：对于非程序事项，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享有否决权，即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出反对票，涉及此类事项的决议就不能通过。同时，安理会在决定某一问题是否属于程序事项时，常任理事国仍可行使否决权。这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问题从属性的表决极少出现，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常由安理会主席进行裁定。¹⁵⁸

155 张学森、刘光本主编：《联合国》，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0 页。

156 联合国，<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2 月 9 日。

157 张学森、刘光本主编：《联合国》，第 31 页。

158 同上，第 34 页。

安理会的另一大特点是其公开性，除了一些闭门会议外，安理会的所有文件，包括通过和未通过的决议，会议记录，投票等等都有所记录，并向公众公开。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的每次发言或者投票都是其国家或者其国家所属阵营的表态。这就对各国安理会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予其更大的责任。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世界和平的首要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全人类的共同安全是安理会的目标。如何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下实现全世界各国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是各国代表在安理会无时无刻不在讨论和交锋的命题。

（二）职能与权力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被赋有以下的职能和权力：

- 依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 调查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任何争端或局势；
- 建议调解这些争端的方法或解决条件；
- 制定计划以处理对和平的威胁或侵略行为，并建议应采取的行动；
- 促请各会员国实施经济制裁和除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措施以防止或制止侵略；
- 对侵略者采取军事行动；
- 就接纳新会员国以及各国加入《国际法院规约》的条件提出建议；
- 在“战略地区”行使联合国的托管职能；
- 就秘书长的任命向大会提出建议，并与大会共同选举国际法院的法官。¹⁵⁹

当地区热点或者危机出现时，安理会首先会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裁定，来判断是否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与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对于任何争端，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争端，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情势进行判定，并通过会议或文件等形式来对这一情势进行定性或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在进行裁定之后，安理会一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处理。最普遍也是最先的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建议当事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随后，安理会可以通过派遣特使，访问团；请秘书长进行帮助等方式来进行斡旋和调解。

而当这些措施被证明无用或者冲突升级后，安理会则需要采取更多有助于停止冲突升级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发出有助于制止冲突升级的停火指示；派遣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而对那些对安理会进一步关切置之不理的国家，安理会则会进一步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军火禁运、经济惩罚及旅行禁令；断绝外交关系；封锁；集体军事行动等措施。这些制裁措施种类相对繁多，但是不涉及强制使用武力的举措。同时安理会会根据制裁对象的行为来判断需要使用制裁措施的程度。但是制裁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帮助制裁对象做出改变，从而维护和平。这里以安理会第 918 (1994) 号决议为例，帮助大家更好理解和使用：

¹⁵⁹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functions-powers>，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6 日。

确定卢旺达局势对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3，**决定**所有国家应防止其国民或从其境内或使用悬挂其旗帜的船只或飞机向卢旺达出售或供应任何种类的军火和有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警察准军事装备；

14，**还决定**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28 条，设立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由安理会全体成员组成，从事下列工作，向安理会报告其工作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a) 向所有国家索取资料，说明它们采取何种行动有效执行上面第 13 段规定的禁运；

(b) 审议各国提请安理会注意的关于违反禁运情况的资料，并在这方面向安理会建议提高禁运实效的方法；

(c) 建议适当的措施，以对付违反上面第 13 段规定的禁运的情事，并定期向秘书长提供资料，以便分发给会员国；¹⁶⁰

其他方面。安理会除上述职权外，还负责拟订军备管制方案在战略性地区行使联合国的托管职能，建议或决定应采取的措施以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选举国际法院的法官，向大会推荐新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向大会建议中止会员国的权利或开除会员国。¹⁶¹

16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S/RES/918(1994)号决议。

161 张学森，刘光本：《联合国》，第 33 页。

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明斯克小组

正如前文所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明斯克小组的雏形形成于1992年。明斯克小组也被称为“明斯克进程”，其本质是一个由冲突双方和欧安会相关国家组成的，用于解决纳卡冲突的谈判平台。

1994年12月，欧安会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布达佩斯正式确定了明斯克小组的任务。根据首脑会议的决定，为加强将明斯克小组解决冲突的努力，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将建立一个无限期的高级计划小组（OSCE High-level planning group），并呼吁该小组向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提出建议，为欧安会在纳卡地区建立维和部队的结构、活动制定计划，并对维和部队的规模、指挥架构、后勤、资源配置、行动规则以及参与维和部队国家间的合作提出建议。¹⁶²

在明斯克小组建立初期，小组派遣专员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以及纳卡地区，这些专员与冲突方各级政治和军事人员保持联系。获得的信息将被发送给明斯克小组参与国，让各方随时了解与冲突有关的相关事态发展。明斯克小组及其专员充当各方之间的中介，并充当各方相应活动的协调者。小组定期监测双方承诺的执行情况，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国际组织保持基本联系。而在1995年，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任命了其个人代表安杰伊·卡斯普日克（Andrzej Kasprzyk）大使，这些任务得以正式明确。¹⁶³

根据1995年明斯克小组发表的《明斯克进程共同主席的任务》¹⁶⁴，轮值主席授权明斯克小组的联合主席为解决冲突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以确保谈判进程；使各方就停止武装冲突，达成协议；并通过部署欧安组织多国维和部队来促进和平进程。如果完全满足这些目标，则可以认为明斯克进程已成功结束。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了这一会谈机制的作用机制、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和解决纳卡问题的原则。其中规定：

1. 共同努力，加强停火；
2. 建立与冲突各方谈判的共同基础；
3. 利用以往调解活动取得的进展，与冲突各方进行谈判，以缔结关于停止武装冲突的政治协议；
4. 酌情促进直接接触，包括冲突各方间的实质性会谈；
5. 继续与冲突各方就建立信任措施开展合作，特别是在人道主义领域，使其与政治进程同步；
6. 协助轮值主席制定欧安组织多国维和部队的建立、组成和运作计划；
7. 将冲突各方收到的关于欧安组织维和行动的批准和正式请求转交轮值主席；
8. 向轮值主席报告与冲突各方就授权草案、谅解备忘录和有关人员在任何时候的安全保障条款进行谈判的过程；
9. 共同主持明斯克小组的定期磋商，联合向明斯克小组成员发送文件、信息和提案，包括对明斯克小组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以及拟讨论的议题的建议；

162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ГПВУ ОБСЕ примут участие в мониторинге Карабаха, <https://yerkramas.org/article/92752/v-monitoringe-obse-v-karabaxe-primet-uchastie-predstavitel-turcii>,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10日。

163 Ежегодный доклад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СЕ. 1.10. Лич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Действующег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о конфликту, являющемуся предмет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на Ми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164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Mandate for the Co-Chairs of the Minsk Process*, 23 March 1995.

10. 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共同持续不断地向欧安组织轮值主席通报和协商，并定期向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通报其工作进展；

11. 在与首席信息官协商后，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通报明斯克进程的进展情况以及当地局势的各个方面，以及其相关执行情况的情况。决议以及欧安组织与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当前和未来合作；必要时，在与首席信息官进行适当协商后，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和平解决冲突可能通过的新决议向联合国提出考虑和建议；

12. 在商定的基础上共同或在适当时单独访问冲突地区，就上述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与冲突各方保持联系；

13. 在与首席信息官协商后，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难民署和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和机构保持必要的联系。其余执行原则包括坚持停火、促进当事方直接谈判、促进维持维和部队的运作、积极配合联合国工作等等具体原则。

明斯克小组在后续的纳卡地区冲突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例如在 2006 年 12 月 10 日的纳卡地区全民公投中，明斯克小组就针对全民公投的有效性、真实性等做出调查、提出质疑，并且发表了如下声明：

莫斯科，巴黎，华盛顿特区，2006 年 11 月 12 日

明斯克集团联合主席关于 12 月 10 日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举行的全民公投的声明

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团注意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局于 12 月 10 日就所谓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举行了全民公决。该国没有被任何国际组织成员——包括联合主席国——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主席团不相信这样的“公投”将有助于协商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未来的任何法律地位都应在不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确定，并且仅作为明斯克进程框架内各方之间政治谈判的结果。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调解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谈判似乎走在建设性道路上的时候，现在进行这样的全民投票，从而抢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最终法律地位，而不是做出妥协，尤其没有帮助。联合主席预计，本次公投的结果未获得国际认可，不会对双方就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的持续前景产生负面影响。¹⁶⁵

可见明斯克小组在纳卡地区问题的处理中实际上相对灵活，一般以维护欧安会框架下的有序解决作为终极目标，可以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发表声明、进行调查、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合作、要求召开欧安会首脑会议等诸多方式来推动和促进纳卡问题的解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斯克小组的本质是一个谈判平台，其实际权力依赖与各参与国的行为能力和欧安组织的整体框架，无法直接进行维和部队的调度，只能提出相应建议。各国代表也无法代表在明斯克小组内本国签署经济、政治条约，明斯克小组的联合主席实际上只是国家外交人员的权限级别。

165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Statement by the OSCE Minsk Group Co-chairs on the December 10 Referendum in Nagorno Karabakh*, 11 December 2006.

会议有关实体介绍

一、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外高加索东南部，位于 44°~52°E，38°~42°N，面积约为 8.66 万平方千米。东濒里海，南接伊朗和土耳其，北部与俄罗斯相邻，西傍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其飞地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被亚美尼亚、伊朗、土耳其三国环绕。阿塞拜疆陆地边境线总长度为 2657 千米，海岸线长度为 456 千米。¹⁶⁶ 全境 50% 以上为山地，大、小高加索山自西向东穿越全境，余脉最终没入里海，除西南部为中阿拉克辛盆地外，其余三面均为山地地形。主要河流有库拉克和阿拉斯河。

阿塞拜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阿普歇伦半岛和里海大陆架，具有埋藏浅、杂质少等特征。此外，境内还有铁、钨、铜、黄金等金属矿藏以及丰富的非金属和矿泉水资源，并且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¹⁶⁷

（一）政治概况

1. 政治制度

1990 年 5 月，随着苏联总统制的实行，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正式改行总统制。1991 年 8 月 30 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成立阿塞拜疆共和国。9 月 14 日，阿塞拜疆共产党宣布自行解散。11 月 26 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成立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国民会议，作为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代行最高立法机关职权。最高苏维埃国民会议包含成员 50 人，其中半数为原共产党执政集团（称为“共产集团”），半数为反对派集团（称为“民主集团”）。12 月 29 日，阿塞拜疆通过全民公决，从法律上确定了国家的独立地位。

独立初期，阿塞拜疆宣布该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半总统制¹⁶⁸以及多党制的国家权力体制。但实际上，三权划分并不明晰：司法权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独立，总统和议会间的权限划分和权衡机制尚不完善。最高苏维埃与最高苏维埃国民会议的职权划分不清，虽然后者以成为立法的核心机构，但前者仍保留了通过宪法、任免总统、批准内阁等权力。同时，前者仍由“共产集团”控制，后者则逐渐被“民主集团”控制。这些也是导致阿塞拜疆政局在独立后十分动荡的原因之一。

在地方行政区划上，阿塞拜疆划分为 1 个自治州（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自治州）、1 个自治共和国（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65 个城市、61 个区，1123 个村。¹⁶⁹

166 高郁：《新编俄语通用国家概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67 页。

167 同上，第 167 页。

168 注：一种总统由直选产生且掌握一定实际权力，同时与之相对应的内阁及其总理也享有一定实权的政体。此时的阿塞拜疆符合半总统制的特征。

169 《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知识年鉴 1992-1993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569 页。



图 7：阿塞拜疆行政区划图（1991 年）¹⁷⁰

2. 政治形势

独立初期，阿塞拜疆经历了一段政治上极不稳定的时期。1991-1993 年，国家政权多次更迭，先后有 5 人担任过共和国的总统或代总统。¹⁷¹1993 年后，阿塞拜疆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1990 年 5 月至 1992 年 6 月间，时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阿亚兹·尼亚佐维奇·穆塔利博夫 (Ayaz Mutallibov) 担任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主张前苏联加盟国之间签署经济共同体条约，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充分考虑各国自身特殊性；同时，他认为阿塞拜疆应该组建自己的军队以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1992 年 3 月，由于军队在纳卡战场上的失利，最高苏维埃主席、原共产党人埃尔迈拉·卡法罗娃 (Elmira Qafarova) 和总统穆塔利博夫被迫先后辞职，新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无党派人士亚古布·马马多夫 (Yagub Mammadov) 接任代理总统。5 月 14 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新恢复了穆塔利博夫的职务。5 月 15 日，穆塔利博夫下令在全国实行为期两个月的紧急状态，禁止集会、示威、罢工等活动。反对党人民阵线支持者冲击议会大厦，占领总统府，迫使最高苏维埃取消复职决议，穆塔利博夫被迫逃亡莫斯科。随后，人民阵线副主席甘巴洛夫 (Gambarov) 继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代行国家元首权力，人民阵线开始掌握国家权力。

1992 年 6 月人民阵线主席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 (Abulfaz Elchibey) 当选总统，组建新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由拉吉姆·阿里·侯赛因·侯赛因诺夫 (Rahim Huseynov, 1992.5-1993.1) 担任总理。随后，人民阵线于 1993 年 1-6 月更换了两届政府，总理分别由阿里·马西莫夫 (Ali Masimov, 1993.1-1993.4) 和帕纳赫·侯赛因诺夫 (Panah Huseynov, 1993.4-1993.6) 担任。人民阵线在政治上排挤其他党派，实行高压统治。

由于人民阵线极端的内外政策使得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国际环境日益孤立，加之纳卡战场的节节失利，人民对其不满日益加重。1993 年 6 月，埃利奇别伊总统被罢免，人民阵线

170 图源：https://www.azerbaijans.com/content_358_en.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2 月 4 日。

171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 71 页。

政府解散。前苏联第一副总理、时任纳希切万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盖达尔·阿里勒扎·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出任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代行总统权力。10月3日，在重新进行的总统选举上，阿利耶夫以98.8%的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在阿利耶夫执政后，阿塞拜疆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3. 国内政党

1991年10月18日，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独立》的宪法性条款，宣布阿塞拜疆实行多党制。1995年，多党制被明确写入国家新宪法。本时期主要政党和政治集团如下：

阿塞拜疆共产党（Azerbaijan Communist Party）：1920年成立，苏联共产党在阿塞拜疆的分支存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爆发后，阿塞拜疆共产党于同年9月召开第三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自行解散。1993年12月14日，阿共召开恢复成立大会，又重新作为一个政党出现在阿塞拜疆政坛。该党主张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并声明将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目标。在经济上，该党主张国家对价格的控制。在社会治理层面，该党主张恢复福利制度，加强社会保障。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党（Azerbaijani Popular Front Party）：该党作为政治组织于1989年成立，1992建党并执政到1993年。该党主张建立土耳其式的议会制度，希望在阿塞拜疆建立世俗的法制社会，自称有三个原则：民主、突厥主义和伊斯兰，要使人民成为真正的突厥人，真正的穆斯林。¹⁷²经济上，该党主张在私有制和市场关系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经济结构。对外关系上，重视发展与伊朗、土耳其以及西方国家关系，反对加入独联体，主张脱离与俄罗斯的联系。

穆萨瓦特党（Musavat party）：1911年成立，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被禁止活动。1992年12月，随着多党制在阿塞拜疆的确立，该党正式恢复活动。政治上，该党主张全民平等、依法治国、三权分立，以民主方式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经济上，该党主张实行市场经济。¹⁷³该党主张自由独立，极力主张建立和发展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摆脱集权主义和俄罗斯控制，坚决反对加入独联体。¹⁷⁴

阿塞拜疆民族独立党（Azerbaijan 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1992年9月成立，自人民阵线中分裂而来，党员主要为工人、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政治上，该党反对人民阵线的亲土耳其路线，拒绝伊斯兰模式，主张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经济上，赞成市场化、私有化，保护财产所有者权益。在民族关系上，该党赞成国内各民族享有平等的、充分的发展权利，主张发展各民族语言。

新阿塞拜疆党（New Azerbaijan Party）：1992年11月21日成立。1993年政治危机后，该党逐渐取代人民阵线成为该国最大的政治组织。该党以建设文明公正、经济高效、社会齐心的国家为宗旨，政治上主张民主原则，明确权力划分，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民族军队；经济上，反对在经济危机中急剧降低居民生活水平，主张经济多元化、市场化、私有化；对外关系上，该党主张与伊朗、土耳其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要注意加强与俄罗斯联系。

172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97-98页。

173 高郁：《新编俄语通用国家概况》，第168页。

174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00页。

（二）经济概况

独立后，阿塞拜疆的综合国力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八国中居于第三位，仅次于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¹⁷⁵ 其经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1-1995年，由于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经济转轨等原因，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生产严重下滑，绝大多数生产部门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到1995年GDP比苏联解体前实际下降了58%；工业总产值下降70%；农业总产值下降47%；最高通胀率达到1800%（1994年），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¹⁷⁶ 第二阶段为1996年至今，阿塞拜疆开始实行稳健的、分阶段的私有化政策，当年经济开始止跌回升，国内生产开始恢复性增长，GDP比上年增长1.3%。¹⁷⁷

	1992	1993	1994	1995
GDP (亿美元)	1.19	1.31	2.26	2.42
实际 GDP 增长率 (%)		-23.1	-19.7	-13
通货膨胀率 (%)		1130	1160	411.8

表 1：阿塞拜疆主要经济数据¹⁷⁸

1. 经济政策

1991年12月，阿塞拜疆颁布了《所有制法》《农业法》。1992年2月和5月，又先后颁布《土地法典》和《租赁法》。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政府鼓励转变所有制关系，在工农业中推进私有化。阿塞拜疆政府的改革方向是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调节，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对所有经济部门都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991-1994年，一些经济领域，如贸易、运输、服务、银行等自发出现一些市场经济成分，但并未促进经济状况的好转，反而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阿塞拜疆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1994年纳卡地区停火以后才起步的。

财政规划方面，阿塞拜疆在独立后即开始编制本国的年度预算，于1992年修订了税务体系，改善国家收入状况。独立初期，财政状况极度恶化，财政赤字率极高，财政收支缺口主要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和向中央银行透支弥补。

2. 经济部门

阿塞拜疆国民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前苏联严格的专业化分工使得阿塞拜疆的经济结构中石油生产有关的重工业占比极大，轻工业尤其是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农业中棉花生产比重较大。阿塞拜疆独立后，大量工业和企业停工、倒闭，1995年工业生产比1990年下降了70%；¹⁷⁹ 农业生产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在苏联时期，阿塞拜疆石油开采量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位；在此期间，阿塞拜疆石油加工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有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尤其是食品工业有很大发展。阿塞拜疆的经济支柱是与石油相关的能源生产行业，包括石油开采和加工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是阿塞拜疆的经济命脉，工业总产值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国家出口总额的90%以上均来源于这一产业。¹⁸⁰ 独立初期，因为经济困难、设备老化、对外交通受限、

175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02页。

176 同上，第102页。

177 同上，第103页。

178 图表由笔者自制。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By Country,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AZE>,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1日。

179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10页。

180 同上，第116页。

技术落后，阿塞拜疆石油产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于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不足，里海上很多油田伴生气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阿塞拜疆每年都需要从俄罗斯等国进口天然气成品。

其次是农业，农业是阿塞拜疆仅次于石油工业的重要经济部门。独立初期，由于农业私有化水平低，灌溉设备和其他农业设备过于陈旧，农业总产值不高，且1992年-1995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12%。农业中，种植业约占农业总产值的65%。植棉业是农业的主要部门，此外还种植有大量的优质烟草、茶叶、谷物、水果（主要是葡萄、柑橘、石榴）等作物。畜牧业以饲养肉毛两用、肉奶两用的牛羊为主。¹⁸¹

3. 对外经贸

1991年，阿塞拜疆外贸额达到40余亿美元，1993年-1995年外贸陷入低谷，并于1994年开始出现逆差。¹⁸²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力求维持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贸往来，同时发展与美、英、土、以等国的贸易关系。阿塞拜疆出口产品以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为主，最主要商品为石油及其产品、天然气；日用品和食品在进口中占比很大，独立初期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65%。¹⁸³受到前苏联高度专业化分工体系影响、加上自身经济缺陷和将石油开发作为经济支柱，阿塞拜疆迫切需要来自国外的技术、资金以及各种产品。

(三) 社会概况

1. 社会结构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阿塞拜疆现有民族43个，民族构成非常复杂。主体民族为阿塞拜疆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此外还有列茨根族、俄罗斯族、亚美尼亚族等民族。亚美尼亚族主要集中在纳卡地区。

1991年-1995年阿塞拜疆人口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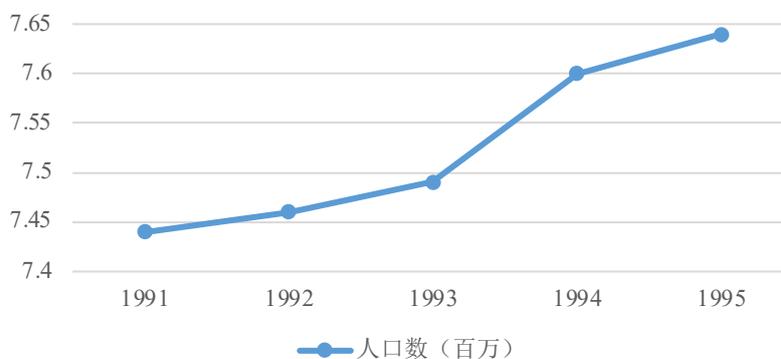


图 8：阿塞拜疆人口变化图¹⁸⁴

1991年，阿塞拜疆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0.3%，为历史最高；1992-1996年，由于长期战乱，阿塞拜疆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五年平均年自然增长率为8.2%。¹⁸⁵阿塞拜疆人口结构属于年轻型和增长型。

181 《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知识年鉴1993-1994年》，1994年，第54页。

182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46页。

183 同上，第149页。

184 图表由笔者自制。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By Country,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AZE>,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1日。

185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4页。

独立初期，阿塞拜疆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明显的苏联经济体系特征。以1991年为例，阿塞拜疆农、林、渔业就人口为94.2万，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口为70.4万，服务行业就业人数为14.1万；在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组织中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数的67.5%，在合资和合作企业中就业占0.1%，在私人经济中就业的占29.2%。¹⁸⁶

2. 生活水平

独立前夕，阿塞拜疆居民生活状况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就处于较落后位置。独立初期，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使得居民生活受到不利影响。纳卡冲突直接导致100万阿塞拜疆人沦为难民，这些难民给国家造成沉重的负担。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几乎一半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工作。¹⁸⁷ 获得独立后，由于经济困难和财政困窘，社会保障体系名存实亡，居民很难享受社会福利。1993年，政府估计约有8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¹⁸⁸ 难民、贫困、失业、腐败、犯罪问题，始终困扰着阿塞拜疆政府和人民。

3. 语言文化

阿塞拜疆历史文化悠久，以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的成就举世闻名。独立后，阿塞拜疆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但由于财政困难，文化建设一直力不从心。阿塞拜疆的官方语言为阿塞拜疆语，居民大多通晓俄语。¹⁸⁹ 自1991年独立后，政府不断提高民族语言的地位。

公元前7-10世纪阿拉伯统治时期，阿塞拜疆居民被强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阿塞拜疆国教，境内80%以上的居民为什叶派穆斯林。少数居民信仰东正教，主要是俄语民族以及格鲁吉亚人。

（四）外交概况

1. 基本方针

在对外交往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自身地缘优势，扩大与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奉行在东西方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和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方针。在全方位外交的同时，阿塞拜疆出于维护国家独立，恢复经济的需要，重视发展与大国、邻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199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纳阿塞拜疆为成员国。截至1992年9月，刚独立不久的阿塞拜疆就得到了120个国家的承认，其中50个国家与阿正式建交。1901991年至1993年上半年，混乱的国内政局使得对外政策经常发生变化。人民阵线执政期间，奉行亲土耳其、疏远俄罗斯政策，拒不加入独联体，和邻国亚美尼亚长期处于战争状态。1993年下半年以后，阿塞拜疆政府调整了对俄政策，加入独联体，与亚美尼亚停火。

2. 对外关系

与亚美尼亚关系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是邻国关系，但由于一系列原因，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由于领土争议，两国始终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纳卡问题始终是两国冲突的核心点，这场自1986年开始的争端从民族仇怨一路演变为地区对立，始终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纳卡冲突使得两国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战争可能性的存在影响着两国政府的外交选择。1992年2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阿、亚两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在纳卡地区实行停火。¹⁹¹

186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4-15页。

187 同上，第164页。

188 同上，第166页。

189 阿塞拜疆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84/1206x0_676286/，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1日。

190 《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知识年鉴1993-1994年》，1994年，第54页。

191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第77页。

公报引发了阿国内一系列的政局动荡，最终未能实现停火。5月，两国又在伊朗调解下，签署和平解决纳卡冲突的声明。尽管阿亚两国以及国际社会都在努力寻求和平，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始终未能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除了领土纠纷外，由于历史恩怨和苏联错误民族政策造成了极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差异，俄罗斯、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影响，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外交关系始终难以正常化。¹⁹²

与俄罗斯关系

阿塞拜疆独立初期，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联系一度被削弱。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政治势力执政，阿塞拜疆采取反俄政策，拒绝加入独联体，并且要求俄罗斯撤军，袭击俄罗斯军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到1992年底，驻阿俄军基本撤离。1993年，总统阿利耶夫访俄后，阿塞拜疆加入独联体，与俄罗斯关系获得全面改善。

尽管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旧存在不少问题。两国在里海地位问题上迟迟没能达成协定，阿塞拜疆在多个外交场合都提出要彻底划分，不同意俄罗斯提出的“共同开发”的主张。此外，俄罗斯对待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民族冲突的态度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既主张维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又赞成给纳卡以与独立无异的“自治”地位¹⁹³。在纳卡争端中，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支持，是阻碍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总因素。

与土耳其关系

阿塞拜疆独立后，土耳其方面迅速予以承认，双方很快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92年1月，时任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访问土耳其，与土耳其总统厄扎尔会谈，双方签署了两国友好、合作与睦邻条约，土耳其方面答应向阿塞拜疆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1月，阿第二任总统埃利奇别伊访问土耳其，双方签署了关于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6项协议，其中包括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提供2.5亿美元贷款。¹⁹⁴

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激烈中，土耳其站在阿塞拜疆一边。时任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明确表示：“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有血缘联系，对纳卡冲突不能袖手旁观。”土耳其主张解除纳卡地区的军事武装，承认纳卡属于阿塞拜疆。为此，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土耳其特意在亚土边境举行“冬季-92”军事演习，以对亚美尼亚施加压力。1993年初，土耳其参与了对亚美尼亚的封锁，决定对亚美尼亚的所有飞机关闭领空，并停止从陆路向亚美尼亚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¹⁹⁵

与伊朗关系

阿塞拜疆与伊朗是近邻，且居民同属什叶派穆斯林。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关系并不十分和睦。阿塞拜疆独立后，两国关系明显改善，签署了《友好、和平和安全条约》，人员往来频繁。1992年5月7日，阿塞拜疆与伊朗签署了《友好睦邻宣言》以及一系列合作协议，伊朗同意向阿塞拜疆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每年向阿塞拜疆出口10亿立方米天然气，并在邮电通讯现代化等方面给予援助。¹⁹⁶1993年10月，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阿，双方签署了政治、经贸等领域的一系列政府间合作文件。

192 张晓玲，梁英超：《浅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的阻碍性因素》，《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12月第6期，第44页-第49页。

193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227页。

194 同上，第239页-第240页。

195 同上，第240页。

196 《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知识年鉴1993-199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由于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国都接壤，伊朗曾力图调解纳卡冲突。自1992年2月起，伊朗开始介入纳卡冲突的调解，提出停火方案，建议向纳卡地区派遣包括伊朗军队在内的多国维和部队。3月15日和5月8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曾两度在伊朗调解下达成停火协议。5月，伊朗总统与阿、亚两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晤，签署了和平解决冲突的声明。

与美国关系

在阿塞拜疆独立初期，美国对阿政局变化持批评态度。1992年2月28日，阿美正式建交。此后，由于美国认为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实行经济、政治、军事层面的封锁，美阿关系一度较为冷淡。除此之外，美国还将阿塞拜疆列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对阿塞拜疆议会选举等民主化进程和人权状况不断提出批评。¹⁹⁷1992年，美国国会颁布针对前苏联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自由支持法案》，其中的第907条限制了美国国内对阿的一切援助，规定“在总统确定并向国会报告阿塞拜疆政府正在采取明显步骤，停止对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切封锁和其他攻击性使用武力之前，美国不得向阿塞拜疆政府提供援助。”¹⁹⁸

(五) 军事概况

1. 军队建设

1991年10月，阿塞拜疆宣布独立组建军队。1991年底，阿塞拜疆建立国防部和国防委员会。1992年4月6日，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签署关于划分里海舰队的协定，阿塞拜疆得到里海舰队25%的财产。¹⁹⁹国家武装力量在建立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新建立的军事力量只能购买前苏联时期的武器装备。1992年，因为俄罗斯支持亚美尼亚军队，阿塞拜疆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阿塞拜疆领土。1992-1993年，阿塞拜疆军队只能依靠国外军事援助。在此期间，该国得到了伊朗、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的援助。总体来说，纳卡战争期间，阿塞拜疆军队建设始终没能走上正轨。

1993年，阿利耶夫总统试图通过独联体以及独联体多边维护军事安全协议，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来维护本国安全。²⁰⁰1993年11月，阿塞拜疆最高权力机关国民议会通过国防法，准军事力量被削减，军事力量逐步正规化。

长期的战争和军备使得国防支出成为了阿塞拜疆国家预算的沉重负担。1992年，阿塞拜疆国防预算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10.5%。纳卡冲突后很长一段时间，阿塞拜疆国防安全支出所占比例仍旧居高不下。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军费开支 (亿美元)	3.21	3.05	1.32	1.09
GDP占比 (%)	6.55	8.03	4.89	4.95

表 2: 1992年 - 1993年阿塞拜疆军费支出²⁰¹

197 道明：《阿塞拜疆在欧亚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研究》，第23页。

198 Svante E. Cornell,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Report no. 46, Department of East European Studies, Uppsala University, 1999, p. 26.

199 《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知识年鉴 1993-1994年》，第54页。

200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74页。

201 表格由笔者自制，数据来源：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175页。

2. 武装力量

冷战期间，根据苏联保卫高加索的战略，在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从西面入侵情况下，亚美尼亚将成为前线战场，而东侧的阿塞拜疆则相对安全，可以作为军事储备基地以随时反攻北约军队。因此苏联总共在阿塞拜疆部署有五个师，五个军用机场。此外，阿塞拜疆总共有10000节车厢的弹药。²⁰² 苏联解体前夕，苏联中央内务部队开始撤离，大量武器弹药和库存的装甲车辆被转交给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阿塞拜疆购买了其中一大部分车辆，据阿塞拜疆外交部1993年的报道，阿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权力真空时期，总共获得了286辆坦克，842装甲车和386门火炮。²⁰³ 在战争的第一年，阿塞拜疆政府也进行了征兵，很多阿塞拜疆人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月热情高昂地参军作战。阿塞拜疆国民军有大约30000人，另有将近10000人的准军事部队——特警（OMON）和人民阵线的几千名志愿者。²⁰⁴ 除了组建和扩充国家军队外，阿塞拜疆政府还用里海地区的油田利润雇佣国外雇佣兵。²⁰⁵

202 Petrosian David,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Armenians' Success in the Military Phase of the Karabakh Conflict*, *Noyan Tapan Highlights*, June 1st, 2000, p.65.

203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p.33.

204 *Ibid*, p.34.

205 Gurdelik Rasit, *Azerbaijanis Rebuild Army with Foreign Help*, *The Seattle Times*, January 30, 1994, p.45.

二、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原名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91年独立之前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自身有符合苏联宪法并有本共和国特色的成文宪法，政治体制为一党制与苏维埃制。1990年8月23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将国名变更为“亚美尼亚共和国”，并于1991年9月23日正式宣布独立，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南部，所处地理位置对欧洲和亚洲都十分重要，同时它也是独联体国家中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1992年全国人口为364.9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居多，为251.6万²⁰⁶。时任国家总统兼最高苏维埃主席为捷尔-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yan)。独立后的亚美尼亚由于国内出现诸多问题：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导致国内出现了诸多新生的政治党派，派系斗争前所未有的激烈；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纳卡冲突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导致亚美尼亚于1995年7月5日才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宪法，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

(一) 政治概况

1. 独立前的政治体制

亚美尼亚独立前实行一党制，亚美尼亚共产党为国家执政党，按照1978年宪法规定，它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亚美尼亚政治体制、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核心”²⁰⁷。

宪法同时规定“人民代表苏维埃是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人民通过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各级行政机构接受苏维埃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²⁰⁸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与立法机关，实行一院制，从属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要工作包括制定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批准国家发展计划等，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是共和国内的执行机关，承担国家政府的职能，负责管理国家，领导各方面工作，有权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其直接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并需要向其汇报工作。

法院与检察院作为共和国内的司法机构，行使司法权。

2. 独立后的政治体制

20世纪后期，民族主义的兴起给政局带来了新的变化，在1990年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势力走上了舞台，并逐渐成为了政局中的主要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政治上主张民族主义的政党——泛亚美尼亚民族运动(Pan-Armenian National Movement)主席彼得罗相在1990年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由于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立场，该党在1990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议会中的最大政党。²⁰⁹之后，彼得罗相以建立多党制为开端大力推进“民主化”。同年8月23日通过的《亚美尼亚独立宣言》明确了以建立各党派平等的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在1991年6月，亚美尼亚决定设立总统职务。同年10月，彼得罗相以83.4%的得票率当选共和国首任总统。

在独立之后，亚美尼亚的制宪进程因为多方面因素而放缓。在长达4年的过渡时间内，亚美尼亚整体上依旧延续着前苏联时期的各项法律规定，国家性质并未改变，但这样的政治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面对着纳卡地区战争冲突与国内政局混乱的局面，彼得罗相依靠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策动，几乎掌控了国家大部分的权力。这一点在1995年的

206 独联体统计局2002年编：《2001年独联体统计年鉴》，第209页。

207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53页。

208 同上。

209 张弘：《民族主义与政治转型的相互影响——以亚美尼亚为案例的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3期，第69页。

亚美尼亚宪法中也有体现。制宪委员会在制宪过程中倾向于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最终在宪法中呈现出“共和国的总统保证遵守宪法，并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正常行使职能”²¹⁰ 这样的表述。这部超级总统制宪法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总统。²¹¹ 这样的制度安排赋予了总统过多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帮助亚美尼亚处理了建国初期的内忧外患，提高了行政效率与执行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无可避免的会产生对于总统彼得罗相本人的各种质疑，并阻碍民主建设的进程。

3. 议会与政府

在 1991 年亚美尼亚独立后，尽管国家性质发生改变，但原国家最高苏维埃依然被视为亚美尼亚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继续发挥作用。最高苏维埃每届任期为 5 年，主要负责国内法律的颁布与修订，批准国家的发展计划、预算报告等。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在最高苏维埃休会期间的日常工作。

同时，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也就是国家政府，负责国内的一切主要事宜。部长会议由最高苏维埃组建，其中包括主席、副主席与各部领导。部长会议是管理国家各领域工作，领导国家经济、文化、国防等的重要机构，并向最高苏维埃负责，需要定期向其汇报工作。

在 1990 年，亚美尼亚选举产生了第 12 届最高苏维埃，并于 1991 年国家独立后继续运作。该届最高苏维埃在 1990 年 7 月到 1995 年 5 月间的任期内，通过了 1169 项决定与 185 项法律，其中大部分为基本法律，由此可体现该届最高苏维埃所承载的使命。²¹² 同时，由于总统的出现，最高苏维埃又承担起了议会限制总统权力的责任。

但在 1992 年，最高苏维埃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制衡作用，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刚刚独立，多党制才刚开始推行，政党政治还没有得到发展，许多政党还处在发展阶段。例如原来国内的最大党共产党因 1991 年 9 月 7 日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其活动，原第一书记阿拉姆·萨尔基相重新开始筹建民主党的工作。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总统急剧膨胀的权力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与政府内部的政见不合，二是最高苏维埃中的党团力量逐渐成熟，对总统权力产生了明显的限制效果。在 1993 年初，彼得罗相以总理“严重地违反了政治道德标准”为由，宣布解除阿鲁秋尼扬的职务。在政府全体辞职后，彼得罗相任命巴格拉强为新总理。在经济改革等问题上态度激进的巴格拉强竭力摆脱议会的干扰，采取新的政策措施。但议会在新宪法问题上却不断制造障碍，几个主要反对党的联合使彼得罗相扩大总统和行政机关权力的努力一再受挫。²¹³ 内部不合与左右掣肘使亚美尼亚的国家行政效率大大降低。最终，1995 年宪法通过后，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被转移至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作为立法机构登上政治舞台。

4. 主要政党与政治组织

亚美尼亚共和国承认多党制，可以自由组建政党。截至 2003 年 1 月国内登记在册的政党共有 115 个。²¹⁴ 在建国初期政党林立的环境与民族主义情绪混杂在一起，给原本就处在变革关头的国内政治生态带来了更多的变数。下文介绍一些主要政党：

210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58 页。

211 张弘：《民族主义与政治转型的相互影响——以亚美尼亚为案例的研究》，第 70 页。

212 数据援引自 <http://www.parliament.am/parliament.php?id=parliament&lang=eng>，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1 月 28 日。

213 孙壮志：《外高加索三国 1993 年政治形势浅析》，《东欧中亚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45 页。

214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81 页。

泛亚美尼亚民族运动 (Pan-Armenian National Movement) 成立于 1988 年，脱胎于之前由一些知识分子组建的“卡拉巴赫运动”。该党以自由、民主、和平与实用主义作为其根本原则，旨在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在政治上，该党推崇公务人员的非政治化，提高公务员地位并保障其生活。在经济上，该党倡导发展市场经济，主张由资本家担任国家领导层。在纳卡问题上，该党主张和平解决纳卡问题，与包括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在内的国家睦邻友好。

亚美尼亚共产党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rmenian) 成立于 1902 年，在独立之前为国家执政党。该党在基层根基深厚，党内成员多位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该党在政治上主张选择社会精英与专家担任政府成员，推行多党民主制，提高政府与议会的地位，增强他们的职能。在经济上，主张以国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反对私有化，推行贸易保护，建立灵活的可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并建立土地公有制。在外交上，该党主张亚俄联盟，加强与俄罗斯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联系，恢复并扩大与俄罗斯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交流，同时争取在独联体内取得多边合作成果。在纳卡问题上，该党主张通过民族自决的原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 (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 简称达什纳克楚琼党，成立于 1890 年，党内成员主要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党内俄民粹思想浓厚，曾在苏联时期流转国外活动，并于 1988 年重返亚美尼亚，一时之间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反对党。该党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民主自由的亚美尼亚，实现三权分立与互相制衡，强调要限制总统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在经济上该党倡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纳卡问题上该党主张纳卡地区与西亚美尼亚同亚美尼亚合并，持激进态度。

民主党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Armenia) 成立于 1991 年 9 月，由亚美尼亚共产党内部分裂而来，党内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该党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依据，主张利用法制实现民族团结，形成以普世价值和民族为基础的多党制社会。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与民族团结。在经济上支持经济改革，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并要求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以外，国内还有部分带有鲜明特色的政党与政治组织如基督教民主同盟、亚美尼亚妇女委员会等也在独立初期在政坛内发挥作用。总而言之，独立初期的亚美尼亚由于面临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新一轮浮现，国内政治呈现党派林立互相争斗的情况，这对于其无论是解决纳卡地区问题还是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而言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本文列出 1990 年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情况与 1991 年的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的党派分布情况，通过两次情况的对比可以很直观的呈现亚美尼亚政治的重大变化。

党派	席位
亚美尼亚共产党	136
独立人士	59
空席	64
总计	259

表 3: 1990 年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选举情况²¹⁵

215 数据来源: Dieter Nohlen et al., *Elec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35.

1990年，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影响，该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投票率仅有60%，1990年7月议会仍有64席空缺。由于政治改革并未开始，共产党最初依旧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但独立人士却大多为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党成员，这为彼得罗相后来的上台打下了基础。在1990年，陆续有多个政党在最高苏维埃中出现，例如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共和党、国家进步党等。同时在1990年独立宣言通过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而此届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则被视为亚美尼亚共和国的第一届最高苏维埃。在1990年到1991年间，最高苏维埃内陆续出现多个党团，政局出现显著变化。以下列出1991年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内席位分布情况：

党派	席位
共和国党 (Hanrapetutyun Party)	59
阿尔察赫党 (Artsakh)	11
自由民主党 (Liberal Democrats)	10
民族进步党 (National Progress)	10
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 (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	12
阿尔察赫呼唤 (Call of Artsakh)	26
民族主义者 (Azgaynakan)	31
共产党 (Communist)	25
国家民主党 (National Democrats)	10
泛亚美尼亚民族运动 (Pan-Armenian National Movement)	59
空席	7
总计	260

表 4：1991 年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内党派分布²¹⁶

根据表格可以看出，独立之初的亚美尼亚政局变化巨大，由于多党制的推行，最高苏维埃内出现了多个新兴的党团，这些党团给彼得罗相后期推行各项政策与扩大总统权力形成了很大的阻碍。在1991年-1995年制定新宪法期间，总统与最高苏维埃矛盾尖锐，尤其是在于限制总统权力方面，最高苏维埃内的多个党团联合给彼得罗相制造了不小的阻碍，国家行政议事效率低下。因此彼得罗相将部分工作重心放在处理党派政治的问题上，并最终在1995年形成了下表所示的选举结果：

216 数据来源：<http://www.parliament.am/parliament.php?id=parliament&lang=eng>，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8日。

党派	席位
共和国集团 (Republic Bloc)	88
亚美尼亚共产党 (Communist)	10
沙弥拉姆党 (Shamiram)	8
民族民主联盟 (National Democratic Union)	5
民族自决联盟 (Union for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3
民主自由党 (Ramgavar)	1
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 (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	1
独立人士	72
空席	2
总计	190

表 5：1995 年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情况²¹⁷

在 1995 年，共和国集团（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党、民主自由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亚美尼亚共和党组成的联盟）²¹⁸ 占据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这主要是由于该国超级总统制的制度导致政党政治发育不全导致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延续了前几年的政治结果。彼得罗相总统的专权必然会导致议会内的其余党派联合起来，为了制衡总统权力扩张而不断向其施压。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是国内最大的反对党的革命联合会在本次选举中仅占据一席。由于彼得罗相总统于 1994 年采取多项政治行动遏制了革命联合会的影响力，加之同年国内报道其意图对政府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导致大批党内主要人员被逮捕，其影响力在 1995 年迅速下降。但在 1992-1993 年间，革命联合会在议会内联合其他政党的行为为彼得罗相总统推行政策和扩张权力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经济概况

1. 独立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苏联时期，亚美尼亚曾是加盟共和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遵循着苏共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亚美尼亚在二十世纪中期迅速由原本的落后农业国步入现代化轨道，工业产值连年攀升。但就在独立前夕，亚美尼亚的经济却遭受了近乎腰斩的重大打击。20 世纪 80 年代，亚美尼亚的整个进出口贸易以及能源供应通过过境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来实现，其中过境阿塞拜疆占了绝大部分。²¹⁹ 自纳卡冲突爆发以来，阿塞拜疆封锁了阿亚边境，所有由阿塞拜疆运往亚美尼亚的原材料与能源全部不同程度受限，这直接导致亚美尼亚境内 80% 企业被迫停产，30 万难民流离失所，同时战争本身也给国家带来大量负担。除此之外，1988 年 12 月 7 日突然到来的大地震让本就进退两难的亚美尼亚雪上加霜。该国公布，全国 40% 的领土包括 21 个城市和 342 个乡村遭受灾难，受灾人口超过 100 万，有 2.5 万人在地震中丧生，使国民经济损失达 85 亿卢布，国家财产损失 1/3 以上。²²⁰ 即使政府在 1989 与 1990 年采取多项措施提振国家经济，但社会矛盾依旧尖锐，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217 数据来源：Dieter Nohlen et al., *Elec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I*, p335.

218 注：其中泛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党赢得 82 席，民主自由党赢得 4 席，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 1 席，亚美尼亚共和党赢得 1 席。

219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第 79 页。

220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90 页。

亚美尼亚经济继续呈现下降趋势，面临衰退风险，衡量国家经济的多项数据指标均不同程度下降；国家生产遭受沉重打击，消费品、食品生产均遭受严重影响，消费品短缺带来物价飞涨，1990年国内非食品价格上涨10.5%，同时食品生产锐减使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滑。工业方面，1990年工业产值下滑7.3%，地震灾区经过两年时间工业生产能力仅仅恢复至原来的68%。农牧业方面均因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倒退，其中1989年农业产值较去年下降15.4%，肉蛋奶产量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²²¹

但尽管如此，由于亚美尼亚具有较为良好的经济基础，整体来看亚美尼亚在苏联时期经济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具有如下的显著特点：

自然资源，尤其是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丰富，但燃料能源严重匮乏。²²² 该国具有较为丰富的铜矿储量，硫磺、大理石等工业资源储量也较为充足。但该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长期依赖外部进口，主要的进口国家有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国家。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运输将不可避免的选择过境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自纳卡冲突爆发以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亚美尼亚输送天然气的唯一管道为自俄罗斯出发途径格鲁吉亚领土的管道路线。

经济结构失调。由于按照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亚美尼亚无可避免的出现了重工轻农的问题，冶金业、有机化工等工业发展突出，但粮食生产不足，存在一定风险。

2. 独立后的经济发展状况

独立后，亚美尼亚经济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彼得罗相在1991年11月11日总统就职演说的讲话中提到，亚美尼亚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所有制多样性并建立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配套体制，力求亚美尼亚经济与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彼得罗相提出了一套恢弘的经济改革计划，从基本经济制度到税收、银行与金融，力求短期内实现私有化改革，步入经济复兴的轨道上。但未曾想该国经济从1991年起便步入了长达三年的严重衰退阶段，前期遭受打击而元气大伤的国家经济在苏联解体后的两年内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各方面改革陷入不同程度停滞，国家濒临崩溃边缘

纳卡局势的日益升级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导致1992年是亚美尼亚经济发展最为严峻的一年：该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1.8%，经济降幅处独联体内最大国家之列。同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200%。由于严重的能源危机与严峻的经济形势，彼得罗相不得不在该年宣布全国实行经济紧急状态。²²³ 在1993年国内经济并未好转反而继续大幅度下滑。该年国内生产总值较去年下滑8.6%，实际仅仅相当于1989年的1/3，而通货膨胀率飙升至3732%。²²⁴ 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企，人民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同年邻国格鲁吉亚爆发叛乱，直接导致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能源运输线路被切断，在一段时间内彻底阻断了亚美尼亚的能源进口通道，直至亚美尼亚打通了与伊朗间能源运输的“生命之线”，情况才有所好转。但该线路运输量十分有限，纳卡冲突为亚美尼亚国内带来的消极影响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政府在国内依然在推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包括分阶段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与非国有化，在农业领域推行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与农业集体经济的体制改革，推行货币改革发行本国货币德拉姆，推行税制改革、银行与金融体制改革等举措。终于在1994年，亚美尼亚经济首次止降复增，国家财政首次扭亏为盈，实现“转折性变化”。自此之后，亚美尼亚经济步入复苏恢复增长阶段。总体来看，经济出现好转主要有以下原因：

221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107-119页。

222 同上，第93页。

223 同上，第104页。

224 同上，第104页。

首先，纳卡冲突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使国家政府能够将更多的精力转移至国内的经济建设中，主要冲突的解决为国内经济带来了转机。其次，邻国格鲁吉亚结束内战使从俄罗斯经格鲁吉亚运输至亚美尼亚的路线得到改善，尤其是天然气能源方面的供应得到了显著改善。第三，亚美尼亚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伊朗的关系，减弱了阿塞拜疆边境封锁的消极影响。最后，1994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援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亚美尼亚的燃眉之急。多方努力之下，最终亚美尼亚经济实现了脱离深渊，缓慢恢复。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国内生产总值 (亿拉德姆)	160 亿卢布	625 亿卢布	8531 亿卢布	1871	5233	6612	8403
按可比价为上年的 %	88.3	58.2	91.4	105.5	106.9	105.8	103.1
国内生产总值 (以 1990 年为 100)	88.3	51.4	47.0	49.6	53.1	56.1	57.8

表 6: 1991 ~ 2003 年亚美尼亚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变化²²⁵

从社会层面来看，亚美尼亚独立后糟糕的经济状况同样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先便是严重的贫困与社会两极分化，根据官方数据统计，1991年亚美尼亚 10% 的富裕人口与 10% 的贫穷人口的平均收入差距对比为 5:1，但到 1992 年却陡增至 11:1，1993 年为 13:1。直至 1997 年该国仍有 1/4 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各种改革的推进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人员失业，据政府统计数据，1992 年国家失业人数为 3.5 万人，失业率为 3.4%，而到 1993 年则变为 6.2%，1995 年为 8.4%。逐年递增的失业率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更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92 年全国各类犯罪案件为 1.6 万件，相较于独立前不到 1 万件出现了极大的增长。²²⁶ 民众将不满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以及政府，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会当中蔓延迅速，人们一边要求政府早日收回纳卡地区，一边又要求政府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这一切都是彼得罗相政府在开国之初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 外交概况

外交方面，独立以前的亚美尼亚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与国防政策。但在 1991 年独立之后，作为一个新兴的主权国家，亚美尼亚确定其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贯彻政治上巩固独立、经济上谋求发展和繁荣、军事上确保本国安全的基本国策和战略服务。²²⁷

1. 独立之初的外交任务

独立之后的亚美尼亚，在外交领域面临着诸多任务：

首先，亚美尼亚急需组建新的外交、外贸部门，这是该国在外交方面的首要任务。为此，亚美尼亚独立后随即成立了外交部与贸易和经济发展部，指导本国的外交、外贸方面工作。

其次，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亚美尼亚急需获得世界上更多国家的承认。为此，独立后亚美尼亚迅速与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等取得广泛联系。截至 1992 年 3 月底，亚美尼亚共获得了全世界 64 个国家的承认，并同其中的 24 个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亚美尼亚于 1992 年 1 月 31 日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于同年 3 月 2 日加入联合国。

225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106 页。

226 数据来源：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174-179 页。

227 李向阳等：《“一带一路”国别概览·亚美尼亚》，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29 页。

再次，为了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推进本国的经济制度改革，亚美尼亚急需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根据世界银行与亚美尼亚政府统计的数据，截至1992年底，亚美尼亚共向世界银行贷款2.35亿美元用于国家发展与应对经济困难。截止至1993年，亚美尼亚共吸引外国投资总计约3.13亿美元。²²⁸但从后续的事件可以看出，短暂的经济援助并没能扭转亚美尼亚的经济颓势，亚美尼亚在独立后的三年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

最后，纳卡问题是该国独立后在地缘政治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亚美尼亚急需寻找国际社会介入并调停、解决该问题，以全身心投入国家建设之中。亚美尼亚独立后积极与伊朗等周边邻国联系，发展友好关系，并在1992年3月15日在该国外长调停下阿亚双方签订临时停火协议，并在1994年5月16日在俄罗斯介入下，同阿塞拜疆、俄罗斯、纳卡四方共同签订了全面停火协议。

2. 对外关系

同俄罗斯的关系

独立后的亚美尼亚将同俄罗斯发展平等的战略盟友关系作为自己的外交重点工作开展，双方在1991年12月29日在莫斯科友好合作和相互安全条约，由于这是近300年来两国首次以平等姿态签署条约，该事件被《亚美尼亚共和国报》报道为“真正的历史事件”。²²⁹双方在1992年4月3日正式建交后，亚美尼亚始终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首位，高层频繁互访，合作进一步加深。在1992年8月21日，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与总统阿鲁秋尼扬访问俄国，同年9月，俄罗斯代总理盖达尔回访亚美尼亚。鉴于阿塞拜疆久未加入独联体，在纳卡问题上，俄罗斯一直支持亚美尼亚，使亚对纳卡的进攻再一次升级，助长了亚美尼亚企图建立从黑海到里海的“大亚美尼亚”的欲望。²³⁰这种情况直到1993年6月阿利耶夫当选阿塞拜疆总统，同年10月重返独联体后才有所改变。在此之后，俄罗斯加强了在纳卡地区的介入程度，并促成双方最后在1994年达成最终停火协定。

同阿塞拜疆的关系

由于纳卡问题的存在，阿塞拜疆自1988年长期与亚美尼亚处于敌对状态，几乎没有外交往来，并在1991年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双方关系长期无法改善，是独联体内部一个棘手的外交与政治问题。在1992年前期，双方在纳卡地区战争升级，展开了大规模军事交火。2月19日，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两国就该问题进行和平谈判，并试图寻求国际干预与国际调解。双方曾在3月在伊朗与俄罗斯的调停下短暂达成停火协议，并在5月双方总统在伊朗总统的斡旋下达成了第一次首脑级别的会谈并初步拟定了和平解决方案。

1993年，阿亚两国战火再起，此次亚美尼亚由于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在战争初期拒绝了由俄罗斯、美国与土耳其三国提出的停火协议，但最终在多方面斡旋与压力下改变态度。同年9月，亚美尼亚表示将停止进攻，逐步从阿塞拜疆领土内撤军。最终阿、亚、纳卡共和国与俄罗斯四方于1994年签订停火协议，第一次纳卡冲突结束。

阿塞拜疆作为亚美尼亚的邻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苏联时期其曾是亚美尼亚对外联络的重要窗口。天然气管道与原材料、燃料运

228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212页。

229 同上，第217页。

230 金挥主编：《东欧中亚列国志》，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第519页。

输轨道大部分都途径阿塞拜疆进入亚美尼亚。双方自从 1988 年爆发冲突以来，阿塞拜疆封锁了与亚美尼亚的边境，对亚美尼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使亚美尼亚被迫改道格鲁吉亚运输能源，并在独立后谋求与周边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缓解国家能源危机的窘境。

同伊朗的关系

独立后亚美尼亚将伊朗视为自己的友好国家，双方在 1992 年建交并迅速在经济、外交、文化等多领域展开广泛合作。1992 年 5 月 6 日，彼得罗相总统在德黑兰与阿塞拜疆和伊朗首脑举行会晤期间，同伊朗总统拉扶桑贾尼举行单独会谈并签署了两国友好与睦邻宣言，²³¹双方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方面达成了协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亚美尼亚的能源危机。

由于伊朗与阿塞拜疆同为穆斯林国家，纳卡冲突为亚美尼亚与伊朗发展关系营造了不小的阻碍，但两国关系总体向好，在纳卡问题上伊朗多次应两国邀请进行调停，但是伊朗认为亚美尼亚占占据阿塞拜疆部分领土属于非法行径，在该问题上强调亚美尼亚应该从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撤军并归还领土给阿。亚美尼亚乐见伊朗能够参与该问题的调停之中，尽管在被占领土的处理问题上与伊朗意见相左，但整体与伊朗关系友好，该问题并没有为两国的领域合作造成重大阻碍。

同土耳其的关系

亚美尼亚同土耳其的关系较为复杂。土耳其承认亚美尼亚独立，但不久后又向亚美尼亚提出了诸多政治要求，包括要求亚美尼亚不再在 1915 年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大屠杀事件纠缠等。双方关系曾因 1992 年亚美尼亚副总统访问土耳其而得到短暂改善，但又因 1993 年纳卡地区局势升级而急剧恶化。土耳其在此之后公开支持阿塞拜疆并向其派遣军事顾问，并且因此封锁了同亚美尼亚的边境，禁止通过其领土向亚美尼亚运输物资，双方关系坠入冰点。

同美国的关系

独立初期，亚美尼亚同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亚美尼亚将对美关系发展的重点放在吸引经济援助与投资以复兴本国经济，利用其的先进技术来发展本国各个产业。同时，亚美尼亚也希望通过大力开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争取让这些国家参与到维护外高加索地区和平稳定的进程当中。

在 1991 年 11 月，彼得罗相总统访问美国。在 1992 年 1 月 7 日，两国建交。同年 2 月，美国国务卿贝克对亚美尼亚进行了工作访问，就纳卡地区局势与两国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3 月，亚美尼亚议长阿拉尔克强访问美国。同年 8 月，亚美尼亚总理阿鲁秋尼扬访问美国，讨论经济援助的相关事宜。

在 1995 年，双方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发展。1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致信彼得罗相，高度赞扬亚美尼亚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承诺将提供经济援助促进改革进行。同年 11 月，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代表团访亚。该年美国共向亚美尼亚提供了 75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²³²

综合来看，美国对独立后的亚美尼亚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不仅是亚美尼亚的重要伙伴与发展的一大国外支柱，同时美国还影响着独立后亚美尼亚的政治形势。独立之后，不少亚美尼亚侨民从美国移民回国，并且独立后的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231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 237 页。

232 同上，第 240 页。

（四）军事概况

独立前，亚美尼亚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属于苏联在西南部的重要军区——外高加索军区的组成部分。1991年，苏联在亚美尼亚部署了3个作战师共8.5万人，同时拥有战术核武器120枚，防空核导弹75枚。²³³其境内的武装力量全归苏联管辖，亚美尼亚仅控制少量的用于维护地区治安的警察部队。

独立后，亚美尼亚国防部于1991年11月成立，总统为部队总司令。由于当时纳卡局势紧张，国家成立初期又急需组建自己的军队，亚美尼亚通过了征兵法案，规定18-25岁的青年需要服兵役2年。亚美尼亚国内共分为三个军区，北方军区负责应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西南军区负责应对土耳其、伊朗与纳希切万共和国，而东方军区则直接应对来自阿塞拜疆的威胁。

1992年，亚美尼亚接管了前苏联留下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数百辆坦克、步兵战车、火炮等，但空军稀缺。同年5月，独联体内的六个国家（俄罗斯、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俄罗斯同年在亚美尼亚境内建立了两个军事基地并部署了部分机动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独立早期的军队构成较为复杂，主要有各党派自己组建的民兵武装力量还有诸多民众自发组织的小股志愿军。而亚美尼亚国防部直到1992年3月才正式设立了第一支军事单位：第1空降团。根据统计，早期参与纳卡冲突的亚美尼亚志愿军队有几十支，大部分部队人数都在300-400人左右，而也有部分部队例如国防部长瓦兹根·萨尔基相统帅的退伍军人联盟耶克拉帕志愿联盟（Yerkrapah）达到数千人之多。而这些部队与民兵组织在日后逐渐成为了亚美尼亚军队的主要力量。

根据1995亚美尼亚宪法与国防法相关规定，亚美尼亚总统为亚美尼亚境内部队最高统帅，国防部负责对全国部队进行领导与指挥。国防部同时下设总参谋部、后勤部、外事局等机构。国家部队由正规军（国民军）与准军事部队（内卫部队）组成，并且在纳卡地区还存在着一定量的亚美尼亚民兵。

233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181页。

三、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国，简称土耳其，是一个横跨亚欧大陆两洲的国家，国土面积约 78.3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5600 万人（1992 年）²³⁴。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历史上曾先后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统治。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风险。在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击退外国侵略者。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一）政治概况

1. 土耳其三权分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土耳其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总统任命总理统筹行使行政权。不过这一制度的建立可谓一波三折。在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事实上处于共和人民党一党专政状态，作为总统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几乎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直到其继任者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önü）结束任期，将权力移交给民主党之后，土耳其才真正成为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在土耳其三权分立与民主化的进程中，土耳其军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虽然土耳其军方曾在上世纪后半段数次发动政变，但是政变却并未产生军事独裁。相反，军方的政变在维护军方特殊地位的同时，也维系着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客观上成为民主政体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力。

1960 年，时任土耳其总统的拜亚尔（Mahmut Celal Bayar）试图加强民主党集权，推行专制统治，引发国内政局动荡，军方立即介入推翻了民主党政权，于 1961 年制定了新宪法，正式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新宪法规定：总统当选后必须脱离其党籍或军籍，不得连选连任；议会多数党领袖出任总理，总理组阁行使行政权；改原有的一院制大国民议会为两院制行使立法权；增设宪法法院行使司法权。这一制度实质上将土耳其确立为一个议会制国家，民主色彩十分浓厚。然而这一制度相比之前的半专制政体，稳定性较弱，加之 70-80 年代适逢第四次中东战争、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一系列事件，土耳其相继发生一系列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政局再次向右倾发展²³⁵。于是军方于 1980 年再度发起政变，并促成了 1982 年宪法的制定，这部宪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1982 年宪法与 1961 年宪法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如下几点：一，1982 年宪法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允许总统任命宪法法院法官、解散议会等等，事实上规定总统可以对行政、立法、司法施加较大影响²³⁶；第二，1982 年宪法对于公民的民主权利作出一定限制，从而限制政党的自由活动；第三，大国民议会被重新调整为一院制，事实上加强了土耳其的中央集权。在 1982 年宪法的保障下，凯南·艾弗伦（Kenan Evren）通过选举于 1982 年担任新宪法体制下的首任总统，1983 年，祖国党领袖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出任总理。厄扎尔出任总理后，在土耳其国内先后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让土耳其重回发展正轨，经济一度繁荣，厄扎尔也顺理成章地于 1989 年当选为土耳其的第八任总统。

234 资料来源：<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turkey/population>，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235 王伟、张伦阳：《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的库尔德问题及民主化与族群冲突探析》，《世界民族》，2019 年第 2 期，第 2 页。

236 同上，第 3 页。

2. 厄扎尔总统任期内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然而厄扎尔总统的任期却并不稳定，面临着民族与宗教两大问题的挑战。

民族问题主要是库尔德人问题。此问题由来已久，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南部历来是库尔德人的重要聚居区，一战后库尔德人谋求独立建国未果。而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一直贯彻强化土耳其民族意识，削弱库尔德民族特性的政策，拒绝、打压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二战后，随着世界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库尔德民族运动也是愈演愈烈，并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进程并行发展。有学者说，土耳其向多党制转变的过程，也是库尔德族裔意识由蛰伏向显现转化的过程²³⁷。此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在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新生的政党为了赢取政治资本，在竞选时都会争相对库尔德人示好，客观上为土耳其民族意识觉醒提供了温床。而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左翼政党不断发展，而由于左派的政治话语体系将库尔德人视作被压迫的民族，对库尔德人的权利诉求持有同情的态度，库尔德精英人士逐渐与工人党等左翼政党靠拢，并于1965年成立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走上了构建民族身份的道路。然而与许多政党对库尔德人同情相反的是，作为土耳其政治重要推力的军方并没有对于库尔德人的诉求提出合理的政治解决方案，而是将库尔德人问题视作国内政治局面混乱的重要因素，两次军人干政后都会通过取缔库尔德组织、逮捕库尔德精英等方法挤压库尔德人的政治空间。

军方的高压政策致使库尔德人开始寻求更激进化的方式争取权利。1978年，厄贾兰（Ernie Ocalan）成立了库尔德的民族主义政党——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该党认为“斗争的最可靠手段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上的”²³⁸，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通过武装斗争形式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而由于1982年颁布的宪法仍然对库尔德族裔的合法政治参与权予以否认，军方出身的埃夫伦总统更是以军方为主导打击库工党等组织，加强对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文化和政治镇压，这让激进的库尔德精英斗争意识更加强烈，他们或是出逃至其他国家，或是在国内制造暴力与国外的库尔德人相呼应。厄扎尔当选总统后，试图采用温和手段解决问题，但海湾战争的爆发却使得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海湾战争爆发后，近50万伊拉克的库尔德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²³⁹，这些难民大部分与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联合，并且得到西方势力以及伊朗、希腊、叙利亚等邻近国家的支持，引发了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土耳其政府最多曾投入近25万军队镇压库尔德人的反抗浪潮²⁴⁰，并且适当放宽对于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限制，但是直到1993年厄扎尔去世，库尔德问题仍然未能有效解决。

最大的宗教问题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虽然土耳其在建国之初，就标榜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但毫无疑问，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深厚历史传统难以动摇。而二战以后，由于土耳其多次面临政局更替与社会转型，各个政治派别为迎合民众，谋取政治利益，压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因而努力争取伊斯兰保守势力支持，对于他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放开限制，让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在土耳其日渐扩大。特别是冷战之后，随着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伊斯兰复兴势力在土耳其进一步发展。1991年议会选举中，以伊斯兰主义为旗号，反对政教分离的繁荣党异军突起，拿下了大约17%的选票，成为总统厄扎尔和总理德米雷尔执政的重大威胁，也推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向中东与伊斯兰世界倾斜。在厄扎尔去世后的几年内，繁荣党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拿下了安卡拉市市长等重要地方职务，并于1995年议会选举中成为全国第一大党²⁴¹。虽然繁荣党的执政时间不长，但它却开创了伊斯兰复兴势力进入政坛的先河，让土耳其的政教分离世俗化道路蒙上阴影。

237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

238 Paul J.White, William S.Logan,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Berg Publishers, 1997, p.227.

239 郭长刚：《列国志·土耳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240 同上，第41页。

241 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第40页。

3. 土耳其的政坛形势与主要政党

从1983年军政府还政于民直到厄扎尔去世的近十年间，被民间称为“厄扎尔王朝”时期，而“厄扎尔王朝”的政局形势，与政党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下面我将在本段对于土耳其的主要政党及其关系进行介绍。

总统厄扎尔出身的政党是**祖国党 (Motherland Party)**。这一政党的主要构成人员是技术人员和专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与宗教、军方等较敏感的政治势力联系不多，因此更有利于得到各阶层、派别的支持。故而在1983年的大选中取得胜利，成为执政党。在执政期间，祖国党开始推进自由市场改革，迈开私有化脚步，并曾经于1987年尝试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但在厄扎尔任期内，由于党禁逐渐开放，选举制度的成熟，祖国党开始面对更多对手的挑战。而由于祖国党在政党斗争经验和运作经验上较为欠缺，且厄扎尔在1989年继任总统之后，更倾向于作为一个超党派的总统行使政治职权而非继续高强度地控制政党，祖国党的政治竞争力被大幅削弱，使在1991年大选中只赢得115席，败于正确道路党，失去执政党地位。

祖国党的最大对手是苏莱曼·德米雷尔 (Süleyman Demirel) 领导的**正确道路党 (True Path Party)**。正确道路党是一个保守主义中右政党，该党重视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主张私有化和对农民采取倾斜政策，在广大农村地区拥有较高支持率，小型工商团体和富农是其主要是支持者。正确道路党的前身是土耳其正义党，德米雷尔于1964年首次出任正确道路党主席，并在1965年带领党派赢得大选首次组阁，之后分别于1965-1971年、1975-1977年、1977-1978年、1979-1980年出任总理，直到军方政变之后被处以政治禁令。1983年，正义党改名正确道路党，1987年解除德米雷尔的政治禁令。1991年，土耳其举行大选，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获得议会中的178席而成为第一大政党。

社会民主人民党 (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 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党，领导人是前总统伊诺努之子埃德尔·伊诺努 (Erdal İnönü)。社会民主人民党由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一定程度上部分继承了凯末尔的共和人民党，立场偏向中左，主张计划经济。1991年大选中赢得88席。

繁荣党 (Welfare Party) 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反对政教分离，主要基本盘为中东部内陆地区的农民、中小企业与宗教势力。繁荣党前身是1972年成立的救国党，曾在1973年和1977年两次大选中分获11.8%和8.5%的选票²⁴²。1980年秋，救国党曾举行示威，呼喊反对世俗主义、反对共和国的口号，要求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恢复伊斯兰教国、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法典。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救国党被取缔，党主席埃尔巴坎也被逮捕。埃尔巴坎获释后，成立了繁荣党重新进入政坛。繁荣党在1987年大选中，仅获得7.5%的选票，没有取得议会席位²⁴³。但该党于1991年选举中赢得62席，为国会第四大党。

1991年大选后，德米雷尔以议会中第一大政党领导人的身份与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人民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1993年4月17日，厄扎尔总统因心脏病突然逝世，5月16日，德米雷尔宣誓就职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九任总统。

242 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第40页。

243 土耳其宪法规定只有大选得票率大于10%的政党有资格赢得大国民议会席位。

政党名称	得票率	席位数量	与上次席位变化
正确道路党	27.0%	178	+119
祖国党	24.0%	115	-177
社会民主人民党	20.8%	88	-11
繁荣党	16.9%	62	+62
左翼民主党	10.7%	7	+7
社会主义党	0.4%	0	--

表 7: 1991 年土耳其大选后大国民议会构成²⁴⁴

(二) 经济概况

20 世纪 90 年代，是土耳其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阶段。从厄扎尔开始，土耳其经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注重经济的外向化与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是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厄扎尔就强调要建立一个自由定价、由市场确定资金投放的制度。自 1990 年起，私营企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受益者。1990-1995 年，投资于私营企业的固定资本分别占社会总资本的 69.2%、68.1%、67.7%、71.5%、79.7% 和 82.1%，国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传统地位也逐渐被私营企业取代，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交易额已不足 25%。²⁴⁵ 到 1992 年，土耳其已经有 55.7% 的企业属于私营企业²⁴⁶。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纺织与服装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钢铁、水泥、汽车、家电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土耳其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 1995 年土耳其的出口总额中，工业品所占的比例就由 1981 年的 52.8% 猛增至 87.5%。²⁴⁷

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看似风生水起，但在繁荣之下，一些经济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当其冲的是通货膨胀问题，1990-1993 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60.3%、66.0%、70.1% 和 66.1%，1994 年猛增至 106.3%，仅次于 1980 年的 107.2%²⁴⁸，为近年来的最高值。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引起的经济总量失衡，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的几年中，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飞速发展，都已超出了土耳其的承受范围。

除通货膨胀外，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化与私有化也都暴露出局限性。在外向化方面，由于土耳其的出口产品中技术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加之实行了进口自由化政策，因而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为平衡国际收支，土耳其积极吸引外资与举借外债；1990-2000 年，土耳其实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80.15 亿美元；而外债方面，债务总额持续增多，仅 1993 年一年就增加了 11764 亿美元，达到 67356 亿美元。²⁴⁹ 巨额的外债让土耳其陷入了较大的财政隐患，也影响了土耳其的国际声誉，1994 年，国际银行下调土耳其的信誉等级²⁵⁰。在私有化方面，由于国家财政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使得国营企业连年亏损，这导致土耳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1994 年，土耳其 368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中有 247 亿美元是国营企业亏损造成的。²⁵¹

244 表格基于“MİLLETVEKİLİ GENEL SEÇİMLERİ 1923 - 2011”提供的数据制作，文献由 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 于 2012 年出版。

245 郭长刚：《列国志·土耳其卷》，第 130 页。

246 Erik Jan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B.Tauris, 1998, p.283.

247 安维华：《土耳其结构性经济调整的成就与问题》，《西亚非洲》，1997 年第 4 期，第 19 页。

248 郭长刚：《列国志·土耳其卷》，第 131 页。

249 同上，第 132 页。

250 安维华：《土耳其结构性经济调整的成就与问题》，第 20 页。

251 郭长刚：《列国志·土耳其卷》，第 132 页。

于是，土耳其于 1994 年 11 月通过了全面私有化的法令，但法令效果极为有限，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制糖业、棉纺织业、化工、塑料等工业部门的国营企业改革仍未见成效。

不过，总的来说，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土耳其经济改革推进，土耳其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虽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年份	GDP (亿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GNI (亿美元)	人均 GNI (美元)
1991	1510.41	2750.64	1421.10	2590.00
1992	1590.95	2850.39	1642.42	2940.00
1993	1804.22	3181.32	1787.04	3150.00
1994	1306.90	2268.40	1543.78	2680.00
1995	1694.86	2896.09	1666.60	2850.00
1996	1814.76	3052.96	1734.74	2920.00
1997	1898.35	3144.39	1924.18	3190.00
1998	2692.87	4392.35	2089.80	3410.00
1999	2497.51	4012.47	2197.17	3530.00
2000	2665.68	4219.54	2649.21	4190.00

表 8：土耳其 1991-2000 年国民收入统计表²⁵²

（三）外交概况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后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建国初到二战结束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总体依据中立和非结盟的原则。冷战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改变，采取亲西方的政策，先后加入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西方势力在近东地区遏制苏联的桥头堡，并且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不断向欧洲一体化靠拢。冷战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在维持亲西方政策的同时调整外交路线：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提升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避免被美国过多干涉，并且谋求与苏联关系缓和。厄扎尔上台以后，结合国内经济自由化与伊斯兰温和化的形势，制定了积极主义的外交政策。²⁵³ 其具体表现为：维持亲西方的政策为基本，保持同欧美诸国的联盟关系，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中东或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将中东国家作为经贸关系的重要拓展点。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包括总理、外交部和军方，总理负责决定外交政策，外交部提出建议并推动政策的执行，军方则通过军事干预政治而影响外交。如前文所说，土耳其在上世纪 60-80 年代军事政变频发，而军方对于外交的影响也逐步扩大，80 年代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成立之后²⁵⁴，军方参与外交被制度化。而在厄扎尔时代，由于土耳其政局及外交环境均不甚稳定，土耳其内部关于外交政策的矛盾较为激烈，厄扎尔主张从经济视角解决地区冲突，但倾向于较强硬政策的军方对此并不认可，特别是随着库尔德问题的愈演愈烈，军方对于外交的干预日渐增强。而除了以上几股政治势力外，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还受到其他集团的影响，例如本国的阿塞拜疆、车臣等族裔集团先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曾向土耳其政府施压，而土耳其工商业联盟等大企业集团则积极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

252 郭长刚：《列国志·土耳其卷》，第 132 页。

253 巩立彬：《厄扎尔政府时期的土耳其社会转型研究》，硕士论文，辽宁大学世界史专业，2016 年 5 月，第 47 页。

254 孙源溪：《土耳其政军关系及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硕士论文，新疆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16 年 5 月，第 19 页。

土耳其与世界许多主要大国都有密切的外交关系。美国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友，虽然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土美两国共同敌人消失，但由于土耳其需要推行自由化市场经济政策，其仍需加强与西方国家联系，故而土美关系保持稳定的发展。除美国外，欧洲是土耳其外交活动的重点之一，土耳其一直积极申请加入欧共体及之后的欧盟，但并不顺利，土欧之间在塞浦路斯等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²⁵⁵，并且欧共体（欧盟）一直认为，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难以达到欧盟的标准。不过虽然并未成功入盟，但土欧之间一直保持了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1996年土耳其与欧盟达成了关税同盟协定。土俄之间的关系则兼具竞争、合作与对抗。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希望借助民族之间的血缘、宗教、文化联系向中亚和高加索的原苏联成员国进行渗透，而俄罗斯则不愿看到自身影响力被削弱，仍然将高加索和中亚看做自身势力范围。双方关系在90年代初期趋于紧张，但由于土俄双方都意识到，土耳其短期内无法消除俄罗斯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势力，长期的争斗并没什么意义，因而在竞争的同时开始加强合作：2001年签订的《欧亚合作行动计划》标志着俄土双方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地区大国地位²⁵⁶。

在纳卡冲突问题上，土耳其由于文化、语言、宗教等多方面的联系，因而态度倾向于支持阿塞拜疆。不过在分析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时，我们需要明确一点，阿塞拜疆从未正式要求土耳其干预冲突，而更多是希望土耳其利用其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为阿塞拜疆争取良好的国际声誉，土耳其的做法大体也是以此为基调的。土耳其在冲突之初采取了偏中立的政策，以各方之间公正调解人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过土耳其的中立姿态并未持续太久，1992年2月下旬，在哈加利镇爆发对阿塞拜疆平民进行的大屠杀后，土耳其举行了大规模的反亚美尼亚示威活动。随着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领土不断推进，以民众、媒体为代表的国内舆论压力迫使土耳其采取更亲阿塞拜疆的立场，而最大的在野党祖国党也进一步推波助澜。受此环境影响，土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对亚美尼亚采取经济封锁，并提出不排除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土耳其从未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1993年，阿塞拜疆发生政变，阿利耶夫（Geidar Aliyevich Aliyev）成为新的领导人。阿利耶夫对土耳其的外交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重申土阿友好关系的同时避免土耳其对阿塞拜疆主权进行干涉。这使得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的不信任程度增加，也让土耳其进一步打消直接军事介入纳卡冲突的念头。

总体来说，土耳其在本次纳卡冲突中的政策受到这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凯末尔主义原则，即尽量避免卷入任何外国之间的冲突，虽然土阿双方有诸多联系，但阿塞拜疆毕竟是一个独立国家，土耳其认为，对于两个独立国家的冲突不应过多干涉。二是西方盟友的态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倾向于在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几方之间制衡，尽可能远离冲突，故而美欧对土耳其施加了政治影响，让土耳其不要过于明显“站队”阿塞拜疆。²⁵⁷三是俄罗斯的重要影响，土耳其对俄罗斯的强大实力存在一定的畏惧，并且与俄罗斯存在诸多方面的政经合作空间，因而不愿在纳卡问题上彻底搞僵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四）军事概况

土耳其军队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包括正规军、预备役和准军事部队。其历史可上溯至奥斯曼帝国，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军队的前身是于1920年成立的大国民议会武装部队。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是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统通过国防部和总参谋长对全国武装力量实施领导和指挥。国防部部长是总理内阁的成员，负责执行具体的安全政策，总参谋长由总统任命，并向总理负责，职责是掌管武装部队、进行战争准备以及开展军事行动等。

255 Nasuh Uslu, *The Cyprus Question as an Issu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 (1959-2003)*,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2, p.185.

256 陈羽婵：《普京时期俄土关系影响因素分析》，硕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6月，第16页。

257 Svante E. Conell, *Turkey and the Conflict in Nagorno-Karabakh: A Delicate Balanc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January 1998, p.64.

部长理事会对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的国防事务进行负责，不过只有大国民议会有权宣战、向海外派兵或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土耳其。国防部是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总参谋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为武装力量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理、总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司令以及宪兵司令组成。最高军事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任务是讨论和决定土耳其武装部队各级军官的任免和调动、晋升和退休、国防费用的计划和分配、军队编制和军法军纪等问题。

土耳其军事体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最高国防决策机构，由总统任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国防问题进行讨论，基本任务是制订战争动员计划、国家军事政策和讨论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根据土耳其1982年宪法第118条，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目前成员包括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总理、总参谋长、副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员以及宪兵司令。总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由总统设定，总理和总参谋长的提议也可以在议程中予以采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呈送给总统和总理，并由部长理事会进行讨论。虽然听起来，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者，但事实上由于军方成员占据了委员会中的一半还多，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由多数票选出，这使得事实上军方才是国家委员会的真正“掌控者”。军方通过国家委员会可以对国家政局施加重要影响力，军队不仅可以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涉及安全防卫问题的决策，也可以影响国家的内政外交问题。

土耳其军队的总体安全观和安全政策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促进本地区及更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建国家战略安全观以影响周边国家，提升地区大国平衡能力，以及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推动地区合作进程等。而土耳其所开展的军事活动也是基于这一安全观制定的：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之后逐渐成为北约在东南欧的重要军事力量，积极支持北约的政策与扩大进程；1992年，土耳其成为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的准成员国，该组织后成为欧盟防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对于“欧洲安全防卫政策”的建构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土耳其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是如下几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述的库尔德人问题，其二是南北塞浦路斯的分裂问题，其三是土耳其与希腊在领海、大陆架、空域管辖权和岛屿军事化问题的争端。

苏联解体前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幻，土耳其的军队人数与军事开支也发生了波动。1985年，土耳其的军队人数为63万人²⁵⁸，而随着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问题的不断加剧与苏东地区的动荡，土耳其为加强安保，军队人数在接下来几年内有所增加，1989年达到78万人，1991年达到80万4千人。苏联解体后的两年，土耳其军队人数有所下降，1992年为70万4千人，1993年为68万6千人，但1994年，土耳其的军队人数又增至81万1千人，为近几年的峰值，这可以推测与纳卡等周边冲突与国内日渐激化的库尔德分离运动相关。相应地，土耳其的军费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1985年军费为23.7亿美元，1989年增长至33.7亿美元，1992年达到61.6亿美元，1993年达到70.8亿美元²⁵⁹；但由于土耳其的经济状况也较为良好，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也呈现上升趋势，这使得土耳其军费占GDP的百分比始终维持在3-4%左右。而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土耳其军费的最大开支主要是优质武器装备的购买，1992年，土耳其从美国购买了价值40多亿美元的各类武器及军用器材，力求维持本国在中东地区对他国的相对军事优势²⁶⁰。

258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TOTL.P1?locations=TR>，以下军队人数数据出处相同。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7日。

259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CD?locations=TR>，以下GDP百分比数据来源相同。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7日。

260 晓黄：《1992年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3期，第50页。

四、俄罗斯

（一）俄罗斯独立后的国情与外交政策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言确认了独联体的宗旨和五大原则、成员国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合作方式以及对前苏联成员国地位的态度。当然，《阿拉木图宣言》也宣判了苏联这一曾在世界舞台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消亡。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叶利钦，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政治动荡，这也导致了经济的大萧条。在叶利钦执政期间，由于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稳定性造成的极大影响，俄罗斯综合国力严重下降。首先是经济实力的下降，无论是1992年的“休克疗法”，还是后续的“稳定宏观经济”计划，都没能拯救俄罗斯经济的急速下坠。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总GDP几乎下降一半，人均GDP下降到3500美元，只相当于西方国家平均的1/5²⁶¹。俄罗斯在技术等关键行业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下降比较严重，1992年，仅占全球总额的1%左右；其次是军事实力的削弱，俄罗斯军队从建军时期的275万人逐渐下降到1994年的150万人，与苏联时期相比较，俄罗斯独立后，整体军事实力大幅度下降，经济下行导致军费开支减少、军事装备生产量由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离开也逐步下降、军事士气相当低落。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军费开支仅相当于上世纪同期的36.2%，生产装备开支仅相当于上世纪同期的25.1%。

基于混乱的国内情况，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俄罗斯也没有做好制定整体性外交政策的准备，当时，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观点认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依靠俄罗斯生存，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仅经济上是负担，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文化上、精神和政治上的异类疆域”²⁶²。许多学者和官员要求俄罗斯摆脱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社会 and 经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不要干涉后苏联空间区域的民族和地区冲突，并促使这些冲突国际化，同时，俄罗斯应当公开放弃在后苏联空间的任何特权。与此相对的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在脱离苏联后采取了亲西方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因此，俄罗斯奉行“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政策，希望为稳固政权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希望通过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实现经济复苏。因此，俄罗斯选择了亲欧洲的外交政策，希望欧洲国家能摆脱冷战中产生的偏见，在国际事务上与西方国家平等合作，并在希望经济上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以挽回国内经济的颓势。并且，俄罗斯也希望基于自己的欧洲国家认同和沙俄时期充分参与欧洲事务的历史，积极融入西方国家阵营，成为西方国家文明和文化的支柱。在政治上，俄罗斯加强民主化改革、积极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战略伙伴甚至是同盟关系；在军事上，俄罗斯与美国等国签署削减战略核武器的一系列协议和条约，在一些全球和地区问题上与美国等保持一致，疏远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推崇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制度。²⁶³但在实施亲西方政策期间，俄罗斯经济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国民经济水平下降，金融寡头和财阀控制经济，使得俄罗斯国内政治受到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给予俄罗斯援助，反而以冷战思维在军事上防范和遏制俄罗斯的发展，通过北约东扩、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以及积极发展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等措施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261 Vladimir Putin,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EB/OL]*, <https://anonimus.ro/2020/04/russia-at-the-turn-of-the-millennium-by-vladimir-putin/>,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26日。

262 E.B. Rume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fter the Soviet Collapse", in J. C. Snyder, ed., *After Empire*, Washington, 1995, p.49.

263 范建忠等：《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如上所述，俄罗斯在起初的对外政策中对西方国家政策是优先的，这使得俄罗斯忽略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国家“甩包袱”政策的形成。²⁶⁴以“纳卡冲突”当事国之一的阿塞拜疆为例，在政治上，俄罗斯独立之初并没有急于同阿塞拜疆建立外交关系，也并没有积极促成阿塞拜疆加入在后苏联空间区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安全一体化组织独联体；在经济上，“停止了财政补贴和按照苏联解体前的标准供应原材料及工、农业产品，追讨欠债”²⁶⁵。在阿塞拜疆尚在卢布区的情况下，俄罗斯没有与阿塞拜疆就实施单方面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进行任何的有效沟通。在其他方面，俄罗斯对阿塞拜疆政策也是消极和被动的。

随着俄罗斯和西方在波黑冲突、北约东扩等问题中的矛盾凸显，以及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区域的战略空间被压缩，后苏联空间地区的局势极其混乱，领土和民族矛盾不断，俄罗斯开始意识到了国家利益遭受的威胁。俄罗斯国内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也陷入“极端化自由”和民族主义的两种极端，俄罗斯政府和学界对于俄罗斯千年之交的发展方向 and 外交战略的制定产生极大分歧。俄罗斯“融入西方”政策的失败以及国内政治和经济转型以来遭遇的严重危机，使得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持保守主义的俄罗斯政府和学界的精英分子都主张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重建与前后苏联空间区域国家的关系，通过重塑“苏联式”的势力范围和国际影响力，独立自主的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²⁶⁶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自1993年开始逐步摒弃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转向以恢复大国地位和俄罗斯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外交战略，同时，俄罗斯逐步重视独联体的重要作用，也开始积极发展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关系。

同样以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为例：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的同时，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上台，在其上台后，阿塞拜疆也放弃了片面的“土耳其-西方”政策，并基于国内的发展状况，逐步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于是，在俄罗斯的极力邀请以及阿塞拜疆内部混乱的大背景下，阿塞拜疆于1993年加入独联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阿利耶夫曾表示，阿塞拜疆同意与独联体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发展相互合作关系，阿塞拜疆也希望独联体和俄罗斯能够在纳卡地区的领土争端上为阿塞拜疆“站台”。1993年4月，俄罗斯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构想中详细描述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及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未来关系构想和外交政策导向。随后的几年内，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方面的条约，以实现“后苏联空间”的外交战略，加强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1993年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访问俄罗斯，之后两国高层频频互访，两国还在经济、能源等一些领域上展开了一系列合作。²⁶⁷

264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45页。

265 胡曼·佩马尼：《虎视中亚》，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266 左凤荣：《重整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5页。

267 韩亚伟：《冷战后俄罗斯对阿塞拜疆政策研究》，研究生论文，兰州大学，2014年，第54页。

（二）俄罗斯对纳卡冲突的介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纳卡问题初现端倪后，也正值苏联末期，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比较复杂，应当维持现状和现行法律，以避免问题的扩大化。戈尔巴乔夫避重就轻的态度使纳卡问题就此搁置。苏联解体前，由于苏联政府无力应对纳卡问题，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希望在纳卡冲突的改善和解决中发挥作用，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政治目的：提出一个更好的管控纳卡冲突，解决苏联内部民族矛盾的方案，展示比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更高超”的领导能力，并通过对纳卡局势的成功调解来瓦解俄罗斯内部包括车臣、鞑靼斯坦等地方民族主义势力谋求脱离俄罗斯的企图。²⁶⁸1991 年 9 月，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俄罗斯城市热列兹诺夫茨克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指出：“联盟中央机构未能制定和实施使纳卡地区局势得以正常化的有效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行中间调解，其目的是展开谈判创造条件，并为局势的逐步正常化奠定基础”。²⁶⁹

俄罗斯始终将纳卡问题视为争夺阿塞拜疆，维护后苏联空间区域稳定的一个有分量的“筹码”。随着纳卡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俄罗斯领导人意识到，仅凭借设立观察员不足以推动冲突的解决，需尽快展开维和行动。1992 年 3 月 20 日，包括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内的独联体 11 个成员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签署了《关于军事观察组和独联体集体维和力量的协定》。²⁷⁰针对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纳卡”冲突未能得以解决的问题，1992 年 2 月，俄罗斯对“纳卡”问题做出公开表态，提出将独联体维和部队部署到“纳卡”地区，以对两国冲突进行干预，但阿塞拜疆方面未接受俄罗斯这一提议。²⁷¹1992 年 3 月 24 日，在俄罗斯的倡议下，由俄罗斯、美国和法国担任联合主席国的“明斯克小组”宣告成立，在此框架中，各方进行了多轮谈判与磋商。在俄罗斯的调停下，冲突双方政府与纳卡地区地方政权三方展开和平谈判，并签署《无限期停火协定》。此后，俄、美、法三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还提出一系列和平方案，包括分阶段和平方案、“一揽子解决方案”、“共同国家”方案等，均未能得到冲突当事方的认同。²⁷²1993 年 5 月 18 日，俄罗斯继续对“纳卡”冲突进行调解，在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共同参与下，俄罗斯提出了包括亚美尼亚部队从冲突地区撤军、双方立即停火等一揽子内容的和平协议，但这一调停行动受到同年 6 月阿塞拜疆国内暴乱的影响而被迫中断，亚美尼亚方面借机又向阿塞拜疆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进攻，加剧了局势的紧张。8 月底，冲突双方决定接受俄罗斯的建议，草签了停火协议。1994 年 2 月 18 日，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的国防部长共同签署了一份规定自 3 月 1 日起全面实现停火的备忘录。5 月 10 日，阿塞拜疆方面宣布接受俄罗斯的建议，首先在交战地区实现停火，并于 12 日签署了停火协议。1995 年，作为对《无限期停火协议》的补充，冲突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加强确保停战措施》的文件。²⁷³

随着俄罗斯的介入，虽然这次事关“纳卡”的阿亚冲突得到暂时平息，但该地区的归属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尽管阿亚两国总统之后又针对“纳卡”地区法律地位问题和自治权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但均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纳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68 С.И. 切尔年夫斯基：《纳尔戈诺 - 卡拉巴赫冲突：斡旋的现状与前景》，俄罗斯外交学院外交年鉴（2002 年），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出版社，2003 年，第 163-184 页。

269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ая миссия Ельцина и Назарбаева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Подписано пятистороннее коммюнике. <https://yeltsin.ru/day-by-day/1991/09/25/41003/> 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1 月 26 日。

270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тья 4, Т. А. Шакле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91–2002*, РОССПЭН, 2002, p.312.

271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орядке разрешения спор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http://www.arbitr.ru/_upimg/C97D53D6AFB4B4B504790EA006AF2CBC_co, 最后访问时间 2022 年 1 月 26 日。

272 蔡湫元：《俄罗斯应对后苏联空间武装冲突问题研究》，研究生论文，黑龙江大学，2021 年，第 27 页。

273 刘治东：《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冲突的干预问题研究》，研究生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5 年，第 33 页。

其他主要国家及组织态度概览

一、美国

苏联的解体使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现象，美国积极地参与进了填补真空的争夺之中。美国在 1991 年 12 月承认了亚美尼亚，直到 1992 年 2 月才正式承认阿塞拜疆。在美国的亚美尼亚人在纳卡问题上展开了大力游说，而阿塞拜疆当时在华盛顿甚至没有大使馆，在获取美国支持的问题上，阿塞拜疆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1992 年，美国国会含蓄地将阿塞拜疆定义为侵略者；在《自由支持法案》中，第 907 条禁止美国因“封锁亚美尼亚”而向阿塞拜疆提供一切援助，彼时阿塞拜疆正在纳卡地区进行大规模进攻。²⁷⁴ 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政府禁止与亚美尼亚贸易的行为进行处罚。与国会不同，国务院在冲突中一贯奉行中立政策。1992 年 5 月的一份声明称：“美国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的质量和性质将取决于他们对欧安会原则的承诺，包括和平解决争端”。²⁷⁵ 在 1993 年亚美尼亚的进攻之后，美国官员拒绝了亚美尼亚关于它没有参与战斗的说法。与此同时，他们指出，鉴于该问题对俄罗斯的敏感性，美国在卡拉巴赫的任何部署都是不可能的。²⁷⁶ 然而，美国的“中立”并不意味着其在纳卡事务上的完全放手。美国借由阿亚爆发冲突之际，向外高加索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积极参与纳卡冲突的调解。

二、法国

法国于 1991 年 12 月 31 日宣布承认阿塞拜疆，是第二个承认阿塞拜疆的国家。1992 年 2 月 24 日，法国与亚美尼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92 年，法国曾派遣国务秘书贝尔纳·库什纳尔率领代表团前往阿塞拜疆，但由于国内亚美尼亚侨民对政府的施压，该代表团于 1993 年底被召回。1993 年 12 月 20 日，法国批准了法阿两国缔结的《友好、谅解与合作条约》，规定双方每年召开外长会议，鼓励两国经济、军事、文化、机构合作。有关法案的信息报告全面阐释了这一条约为法国带来的经济效益。²⁷⁷ 法国在处理阿亚关系以及纳卡问题上，主要关注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法国并不愿意恶化与亚美尼亚的关系，纳卡战争使得法国与阿塞拜疆之间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努力受阻。²⁷⁸ 作为明斯克小组的共同主席之一，法国在处理纳卡冲突时主要坚持以下三项原则：

- (1) 防止这些冲突变成国家间的冲突是至关重要的；
- (2) 应尽力促进谈判解决；
- (3) 人道主义援助。

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法国始终坚持以多边手段进行对话和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并以双边手段有关各方施加起缓和作用的影响。²⁷⁹

274 Svante E. Cornell,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pp.97-110.

275 *Ibid.*

276 Carol Migdalowitz, *Armenia-Azerbaijan Conflic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ction on US policy.

277 André DULAIT Sénateur, *Traité d'amitié, d'entente et de coopération entre la France et l'Azerbaïdjan*, Rapport Législatif 420 - 1997/1998 -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http://www.senat.fr/rap/I97-420/I97-4202.html>, Dernière visite: 4 février 2022.

278 Par J.B. (lefigaro.fr) Avec AFP, "Accord historique entre la Turquie et l'Arménie", 10 octobre 2009, <https://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10/10/01003-20091010ARTFIG00606-accord-historique-entre-la-turquie-et-l-armenie-.php>, Dernière visite: 4 février 2022.

27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三二〇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S/PV.3205，1993年4月30日，第5-6页。

三、北约

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明显倾斜于亚美尼亚的态度促使阿塞拜疆进一步向北约靠拢，并使阿塞拜疆后积极与北约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合作。1992年，阿塞拜疆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1994年5月，时任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理事会会议，并签署关于阿塞拜疆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的一系列框架协议。²⁸⁰ 尽管阿塞拜疆与北约的关系不断密切，在纳卡冲突问题上，北约组织一直采取不干涉态度。北约组织始终强调，纳卡问题应当由欧安会调解，北约并不会对此进行干预。

四、伊朗

虽然伊朗并非明斯克小组成员国，1992-1993年间也并非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但伊朗作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重要国家之一，在调停纳卡冲突、缓和两国关系方面仍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成为了在解决纳卡冲突时不可被忽视的一支力量。

从1988年起，纳卡冲突就开始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挑战。因宗教同属什叶派的缘故，在伊朗国内，公众舆论的压力总会要求伊朗政府与什叶派穆斯林站在一条战线上。这种情况在1991年阿塞拜疆独立后变得愈发明显。但伊朗政府坚持以中立的角色在冲突双方中斡旋，强调公认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这与伊朗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外交战略息息相关：如果伊朗边境的冲突持续激化，俄罗斯将很有可能加强其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这与伊朗的国家安全政策是背道而驰的。²⁸¹

1992年2月，伊朗开始了调停冲突的实质性举措。伊朗的调停行动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巩固斡旋、穿梭外交和德黑兰会议。

第一阶段始于1992年2月，时任伊朗外交部长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代表团就和平解决纳卡争端进行了谈判，并宣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以缓和紧张局势。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双方同意伊朗特使马哈茂德·瓦伊齐随后访问巴库、斯捷帕纳克特和埃里温，并在这之后开放一切通讯，让欧安会观察员继续参与调解。²⁸² 3月15日，两国代表团签署了一份关于解决冲突的宣言，并宣布停火7天，迈出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一步。但停火协议很快被打破，双方又陷入了更激烈的对抗之中。

伊朗第二阶段的调解始于1992年3月，以瓦伊齐为首的伊朗代表团多次访问巴库、埃里温、斯捷潘科特和纳赫切万。在这些访问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大多数有关纳卡冲突的当局进行了密集的工作谈判，包括两国的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和议会议长等高级人士。这些谈判的目的是使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并为进一步改善纳卡争端有关各方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²⁸³

伊朗代表团也意识到了俄罗斯在和平解决纳卡争端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因此，伊朗代表团也访问了莫斯科，尽可能吸引俄罗斯的合作，以改进往后的行动。在伊朗代表团访问期间，俄罗斯官员了解了为调解纳卡争端所做出的尝试和未来的计划，并赞赏了伊朗为结束纳卡争端所作的努力。

280 道明：《阿塞拜疆在欧亚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研究》，第36-37页。

281 Abdollah Ramezanzadeh, "Iran's Role as Mediator in the Nagorno-Karabakh Crisis", 1996, pp.5-6.

282 Mahmood Vaezi, "Mediation in the Karabakh Dispute", Foreign Policy Department, Article Series (No.0),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22014529/http://www.csr.ir/departments.aspx?lng=en&abtid=07&depid=74&semid=989>,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11日。

283 Mahmood Vaezi, "Mediation in the Karabakh Dispute", Nameh-Ye-Mofid, SEPTEMBER 2007, Volume 13, p159-182.

伊朗在这一阶段的努力集中在降低战争强度和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在谈判中遇到的一大阻碍是确定纳卡地区的法律地位问题。阿塞拜疆不愿让纳卡的代表参加谈判，认为这是对纳卡地区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的含蓄承认。亚美尼亚则认为，如果没有纳卡领导人参加谈判，各项决定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而纳卡代表认为纳卡有权利以独立的身份参与谈判，而且不是以观察员或较低的政治级别参加会议。²⁸⁴ 这一问题在谈判和达成协议方面具有十足的挑战性。

伊朗第三阶段的调解始于1992年5月。在第二阶段的调解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伊朗再次拟订了一份临时停火协议，并于1992年5月再次访问了亚阿两国首脑。经过伊朗代表团的努力，两国总统同意访问德黑兰参加三边会谈。

1992年5月，应伊朗总统哈什米·拉夫桑贾尼 (Hashemi Rafsanjani) 的邀请，亚阿两国元首访问了德黑兰，参加了三边会议。在德黑兰举行的谈判持续了两天，三位总统于1992年5月7日签署了一项协定，称为《德黑兰公报》，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1) 赞赏伊朗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为建立和平所作的努力；
- (2) 三国高级军事官员之间应定期并且持续进行会议，以保证区域安全；
- (3) 强调根据国际法和欧安组织的原则解决所有双边问题；
- (4) 强调人权观察以及亚阿两国少数民族的权利；
- (5) 强调亚阿双方应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持续做出努力；
- (6) 亚阿两国领导人支持执行双方停火。²⁸⁵

这一协定的签订表明伊朗的调解作用到达了顶峰。但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天亚美尼亚部队就违反了停火协议，开始攻击并占领了阿塞拜疆的舒沙镇，迫使大量阿塞拜疆人离开，严重破坏了几个月以来和平努力的成果。

1992年6月，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政府成立。新成立的政府拒绝了伊朗继续调节的请求，并且考虑到土耳其对该集团的巨大影响，伊朗的调解代表团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继续活动的机会。伊朗接近半年的和平努力最终停止了。

五、中国

中国关于纳卡冲突的中立态度在与亚两国建交之初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鉴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将与两国的建交事宜一并考虑，防止造成支持某一方的印象。²⁸⁶ 在建交过程中，中方强调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提出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阐明了中国对地区争端一贯的原则立场。中国支持国际社会有利于解决该地区争端的努力，并且主张纳卡地区冲突的解决必须基于国际公认准则和原则。中国于1991年12月27日承认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独立，并于1992年4月6日与两国同时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国一直与亚阿两国保持着友好政治沟通与经济合作。1992年1月，中国与阿塞拜疆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1993年3月，双方再次签署政府间经贸协定，中国向阿塞拜疆提供经济贷款。²⁸⁷ 中国也与亚美尼亚签订经贸、技术、投资协定，在经济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1993年，两国贸易总额由建交第一年的108万美元猛增为2074万美元。²⁸⁸

284 Mahmood Vaezi, "Mediation in the Karabakh Dispute", p159-182.

285 *Ibid.*

286 周晓沛：《外交风云亲历记：别样风雨情缘》，五州传播出版社，2019年，第88页。

287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阿塞拜疆》，第249页。

288 施玉宇等编：《列国志：亚美尼亚》，第250-251页。

六、独联体

作为苏联解体后协调各主权国家之间事务、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政府间组织，独联体本应在解决纳卡冲突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因为独联体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独联体在上世纪 90 年代很大程度上处于瘫痪状态，并未能在协调区域事务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独联体的种种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事实上，独联体在成立之初就遇到了困难：一开始，仅有几个国家对独联体的建立表现出了较少的热情，还有很多国家对此甚至没有关注。例如乌克兰是独联体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其在统一货币、人民自由流动、集体防御和外交政策等许多问题上都增加了保留意见；阿塞拜疆曾在 1992 年退出独联体，但在第二年政变后又重新加入了独联体，成立了一个相较于之前更倾向于俄罗斯政府。²⁸⁹ 种种现象表明，在中亚和东欧地区，很多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主权国家对于成立独联体并不是抱有极大的热情，独联体的成员组成并不稳定。此外，许多国家对独联体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部分成员国没有批准独联体协议或选择不参与独联体结构。这导致独联体初期在处理地区冲突时既缺乏足够的主权国家的支持，又缺乏专业系统的行动体系和框架，在面对纳卡冲突这样的问题时会显得束手无策。

上述情况导致了独联体的政治合作很薄弱，在处理苏联解体后的问题和管理国家内部行为的方面找到共同基础是比较困难的。1993 年的《独联体宪章》最初曾提议建立超国家结构，然而这些条款遭到了部分国家的拒绝，甚至宪章的其他行动性条款也被淡化，导致对成员国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此外，包括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拒绝加入独联体的许多组织，导致独联体机构的运行和主权国家间通过机构的合作进展缓慢。²⁹⁰

在纳卡冲突爆发的时期，独联体迟迟未能完善其完整的运作机制，也缺乏规范化、具有强制性的文件支持独联体进行地区间行动，多种因素导致其面对纳卡战争时仿佛“隐身”一般，未能对和平解决纳卡战争产生积极的影响。

289 Paul Kubicek,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An Example of Failed Reg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2009, p.242.

290 *Ibid*, p.243.